

默克尔传

知名而又鲜为人知的女人

安格拉·默克尔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女人。在联邦德国的政治生活中没有一个人像她这样从“政治的零起点”开始，上升得这么快这么高。在正式从政后仅一年，时值转折期¹，她就已经成了联邦议员和联邦部长，后来又担任基民盟²总书记直至基民盟联邦主席，在德国大党的历史上她是第一位女主席。她的前任主席们都是政治重量级的历史人物：康拉德·阿登纳，路德维希·艾哈德，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赖纳·巴泽尔以及赫尔穆特·科尔。

“默克尔身上有多少民主德国的东西？”虽然她的知名度已经极高，始终处在媒体的密切关注之下，但无论是在德国东部还是西部，很多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都没有把握。她自己清楚这一遗憾，“老联邦州³的人们对我前35年的生活知之甚少，那一段生活是完全在职业政治生涯以外的日子，所以可以说我是地地道道半路出家的。这会引来好奇，我很理解。”出生于汉堡，在民主德国长大的默克尔对新联邦州的人们来说身上有种神秘莫测的东西，很多人觉得她是个谜。对传记作者讲起自己的生活时她也滔滔不绝，但到目前为止，她始终成功地保留了解释自己生平的权利，不让任何人窥见她的内心。只把那些在一个开放的时代里，在私人生活比政治更重要的某些时刻不可避免的内容公布于众。默克尔在民主德国时期的生活直至今日几乎无人知晓。

为一位在社会上已经非常知名，同时很多方面又鲜为人知的人撰写的这本传记希望能为“认识”这位不同寻常的人提供一些帮助。“我们为何对默克尔知之甚少？”《南德意志日报》1991年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某些媒体分析家为解释这个女政治家绞尽脑汁，不惜笔墨：在一份德国全国性报刊《世界报》早期的人物介绍中，她被称为持“保守价值观者”，《时代》报把她视为“科尔身边的小姑娘”；当她把名誉主席科尔和党主席朔伊布勒赶下台的时候，默克尔成了“铁石心肠的女人”或“敢于揭露真相的偶像”；她被描述为“不驯服的女人”，“长跑运动员”，“既有激情又冷酷的女人”。开始时有人说她是“带着面具的女人”，后来又成了“被低估者”，“孤独的女人”和“安格拉·怪博士”。

到2002年，给她贴上的种种标签仍然谈不上恭维中听，比如“怀疑者”，“权力中的数学家”。2003年她被刻画为“权力的经营者”，“新法宝”以及“铁娘子”。2004年《焦点》周刊在封面上说她是“狡黠者”，在里面的文章中说她是“权力的女王”，《明星》周刊把她解释为“权力中的物理学家”。无论各家报刊的标题和文章内容如何大相径庭，有一点常常是共同的：媒体的分析家当中很多人对德国政坛这位最具影响力的女人其实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为那些还未罩上历史的光环但由于现实政治斗争而备受争议的人物作传，对每一个作者和读者来说都是一种挑战。在历史学和政治科学里，这是一个久为人知的事实：个人的回忆总是会美化很多东西，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色彩，常常不真实不清晰。不仅主要人物是这样，统计学者亦如此，普通人也一样。此书的调查准备工作中，几乎没有已解密的档案资料可供参考，因此为介绍一个“完整的默克尔”所能做的主要是对众多人物的采访：县中学的教导主任、老师，小城市长，同学，学生时代的女朋友，大学同学，大学老师，转折时期的重要人物，联邦各部大量的工作人员，许多男女政治家，党内朋友和“党内敌人”，他们当中某些人愿意几小时几小时地讲述介绍。有些信息是在不能指明出处的约定下提供的。大约140位在我们这位“女英雄”的生活中出现过的人物愿意接受采访。说到“女英雄”，布莱希特在他的剧作《伽利略传》中说，“没有英雄的国家是不幸的……不，需要英雄的国家是不幸的。”

我们想搞清楚这个女人的动机，她为什么，并且是以什么方式来争取联邦德国最重要的政治职位——联邦总理——一职的。在此单听她自己说不行。出于人之常情，也出于现实的政治原因，政治家们会把自己的过去解释得符合自己的威望以及有助于今后的发展，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从她任民

主德国政府副发言人时起作者就认识的这位默克尔，只同意为本书有限地提供一些帮助，给了一些资料，接受了一次较全面的采访。德国政坛最有权势的女人很懂得如何使自己的私人生活和家庭不在公众面前亮相曝光。但是读者会发现，尽管如此还是暴露出来了一些：像一幅拼图，在这本书中渐渐现形的默克尔（她的娘家姓是卡斯纳）不像很多人，也许是绝大多数人所知道的那样。

第一章 安格拉·默克尔在民主德国的青年时代以及她的父母

安格拉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打上两德印迹：1954年7月17日她出生后的几周，安格拉·多罗特娅·卡斯纳就跟随父母“逆流而上”。她出生时，父母住在母亲的家乡汉堡。很多人在50年代离开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而来自柏林潘可区的父亲霍斯特·卡斯纳却决定回到民主德国去。那时他刚刚在汉堡完成神学专业的学习。当时的汉堡大主教汉斯·奥托·沃尔伯告诉他，教会需要他，让他到柏林-勃兰登堡州教区去当新教牧师。民主德国明显感到缺牧师。联邦德国的州教区想帮助改善这一状况。默克尔的父亲说，当时教会派他去任何地方他都会去，哪怕是非洲。默克尔的父亲乐意把自己看作是为教会无私奉献的使者，一生把很多很多东西都置于为耶稣基督的服务之下。

这位牧师的女儿会成为重新统一后德国最有权势的女人，这在1954年7月17日她出生这一天根本没有人会料想到。同一天，在西柏林举行的联邦大会把自民党1政治家特奥多尔·豪斯第二次选为联邦总统。安格拉出生不久就被“转移”到了民主德国，是由她时年26岁的母亲，女教师赫尔琳德·卡斯纳用一个手提大筐装着带到仅三百户人家的村子克维措的，这个小村子位于勃兰登堡的普里格尼茨。没有婴儿推车，生活条件极为简朴。教区的人们很高兴新牧师一家的到来，他们搬进了牧师住宅。

1954年的头五个月里，有18万德国人离开了这个社会主义的工农国家，到联邦德国定居。从1949年到1961年8月修建柏林墙时，出走的人总共有270万。在其他离开民主德国时，霍斯特·卡斯纳选择了相反的道路。决定生活于社会主义之下

霍斯特和他的夫人决定生活于社会主义之下的时候，正是冷战变得严峻危险的时刻。只有弄清当时民主德国的政治大环境，才能对默克尔及其一家的两德生活有所理解。默克尔出生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还不到十年，冷战把世界分成了两个阵营，把德国分成了两个国家。形式上四个主要战胜国（美、英、法、苏）完全掌握着对德国的领导权，然而随着苏联在1948年3月20日退出盟国监督委员会，这一四国共管机构就寿终正寝了。特别是柏林的紧张局势使得东西方冲突愈加凸显：1948年6月16日苏联城防司令终止了在柏林指挥部的工作，这是四国为划分成四个占领区的柏林设立的统一市政府。1948~49年间的第一次柏林危机激化了军事上的紧张局势：由于苏联军管当局封锁了西柏林的所有通道，几个月里对西柏林居民的供应只能通过空运实现。马歇尔计划，杜鲁门学说，封锁柏林以及基本法诞生，所有这一切在默克尔出生的那一年都已成为历史事实和结果，原因来自两种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一方是市场经济的自由民主，另一方是计划经济的苏联特色的共产主义，双方剑拔弩张的程度到了随时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的边缘。

1949年诞生在德国土地上的这两个局部国家分别代表着两大集团的势力范围。阿登纳1反对摇摆于东西方之间的“秋千政策”，推进与西方的一体化，1951年联邦德国加入了欧洲煤钢联营，在实现欧洲联盟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对年轻的联邦德国有了越来越强烈的军事要求。于是产生了建立欧洲防务集团的计划，但最终因1954年8月30日法国国民大会的反对而失败了。为了阻止欧洲防务集团的诞生，苏联在1952年3月提出了所谓“斯大林照会”，建议同整个德国签订和平条约。这一建议遭到所有西方政府首脑的拒绝，阿登纳是其中最为激烈的一个。虽然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去世，但东西方冲突因苏联在1953年8月20日进行的氢弹试验而继续升级，最终导致与美国的核对峙。

按照历史分析，卡斯纳一家从西边搬到东边去的时候，已经过了“民主德国斯大林主义的高峰期”。但很多教区里仍蔓延着对那些执著不屈的牧师和教友的敌视。越来越多的人屈服于高压退出了教会。按照统一社会党1的意识形态，只有战胜了资产阶级和宗教才能创造出新人。这种意识形

态对民主德国的改造日益不加掩饰，莫斯科监督下的东德共产党人的目的日趋明显，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越来越具体细致：管理体制、司法体制都按照苏联模式进行了改造，加强了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地位，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了农业集体化，优先扩大军事重工业，为未来重建武装力量做预先准备，以及负担向苏联提供修复和占领费用。最后这一项导致了经济危机的严重化。为了与德国联邦传统脱钩并将其以文件的形式固定化，1952年7月23日解散了民主德国境内原有的各州，作为替代模式成立了14个专区。统一社会党加大了在民主德国照搬苏联模式的力度。1949年10月7日开始实行的宪法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公民民主的性质，但实践中它却日益成了一纸空文。取消各州也没有经过本来必需的宪法修改。1952年5月29日民主德国部长会议决定关闭1383公里长、在西德被称作“分界线”的两德边界，包括西柏林的外圈。到1961年柏林墙建立以前，由于柏林在国际法上的特殊地位¹，东德人和西德人还可以在市内仍开放的各个占领区之间自由往来。西柏林成了社会主义民主德国境内的一个资本主义岛屿，民主德国党和国家领导时刻在提醒它注意他们有限的主权。

统一社会党政策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对资产阶级、首先是教会进行镇压。困难的经济状况，加上越来越严重的不自由使得内部政治局势变得一触即发，最终导致6月17日的工人起义，起义从柏林开始迅速扩大到全民主德国。事发前，新的苏联领导已经提出了放宽对资产阶级、教会和小工商业者政策的要求，民主德国也已经试着采取对策，缓解国内明显的不满情绪。据说也准备消除那些妨碍生产率提高的障碍。但调整没有涉及提高生产定额这一点，对工人来说这意味着降低工资，于是它成了导致1953年6月17日起义的直接原因之一。全世界都亲眼目睹了克里姆林宫和东柏林的当权者们是如何对待罢工权以及正式写在“斯大林照会”中的自由选举规定的：起义遭到苏联坦克的血腥镇压，“社会主义建设”要靠武力推行。

默克尔出生的那一年，1954年，德国分裂的现状在继续加深。四国外长会议在柏林失败后，1954年3月25日苏联至少在表面上移交了权力，民主德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对内外事务包括对西德的关系问题自行作出决定。1955年5月5日联邦德国也基本获得全部主权。1955年两个德国分别成为两大对立安全阵营的正式成员：1955年5月6日北大西洋条约在联邦德国生效。此外联邦德国还加入了西欧联盟。东部的进程是与之平行的：1955年5月14日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它是一个安全防务组织，其成员国包括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捷克和阿尔巴尼亚。至1990年民主德国一直是华沙条约组织成员。随着苏联解体这个组织也解散了。之后北约扩大，吸收了从前的华约组织成员。

克维措的牧师之家

在那个德国以及世界政治局势急剧动荡的年代，默克尔的父亲和他大多数在西德学习的同学不一样，他的脑子里是完全另外的计划：1926年8月6日出生的霍斯特·卡斯讷结束了在海德堡和汉堡的神学学习之后决定回到柏林—勃兰登堡州教会。他的女儿安格拉出生的那一年，1954年，他获得了他的第一个牧师职位，任职地点是勃兰登堡州普里格尼茨的小村克维措，如今那里的居民只有356人。“克维措”是作家冯塔纳在他的“勃兰登堡漫游记”中描写过的贵族家族之一。两德边界离这个小村子只有30公里。克维措周围地区人口密度很低，至今仍以农业为主。恰恰是在那几年里，这里需要一位牧师，几百年来一直耕田种地的农民也感受到压力。村里有一个名叫奥托的富农，他的400公顷土地被充了公。那里人们的生活水平非常低。

一般来说在这样战后有大量新村民涌来的村子里，教师和牧师的作用很重要。开头几年村里还有所小学，四个年级在一个班里上课。卡斯讷一家来到这里的时候，小学已经解散了，孩子们得到邻近的佩尔勒贝格去上学。新来的牧师对这里的居民来说是一位重要的联系人，上了年纪的人至今都还很怀念他。卡斯讷一家搬进去住的那个不起眼的牧师住宅，是个木框架建筑，地方不大。一进门就是牧师的办公室，底层还有三个私用房间，后来又扩建了几个小房间。当时教区家庭护士的办公室也在这里，现在它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教友做礼拜用的地方。离牧师住宅不远那个优美的乡村小教堂只在圣诞节时才使用。教区有一些所谓的“教地”，租给他人耕种以维持教职的开销。牧师

家里也饲养牲畜、种植蔬菜，这样就可以不依赖国家的食品供应。卡斯讷任职时有一个名叫波尔曼的教堂司事，在牧师住宅院子里养了两只羊。据老住户们回忆，牧师本人没有从事过农业劳动。默克尔自己说到过二战结束后不久民主德国的基督教牧师家庭生活之艰辛：“我父亲不得不学习挤羊奶，我妈妈跟一位老妇人学会了做荨麻菜。交通工具是一辆有点奇怪的轻便摩托和自行车。”

卡斯讷到克维措来当牧师，上任时就清楚民主德国对教会的迫害。1952~53年间以极其残酷的方式所进行的斗争主要矛头是指向两个教会的青年工作。对此卡斯讷肯定从一开始就感觉到了，因为他在克维措当牧师时同时也负责青年工作。国家对基督教会的侵犯尤其严重。不光牧师，不少基督徒被判了多年监禁。卡斯讷一定知道，1952年6月14~15日准备在吕本瑙举行的青年会宗教节尽管开始得到了批准，后来还是遭到禁止，理由是教会青年会是个非法组织。当时形式上仍统一的全德基督教会对迫害教会青年会的做法提出了抗议。但是到1953年的“圣灵降临节”，还是大约有3000名倾向教会的学生被开除了学籍。

牧师家庭是受压制的，受了很多委屈，吃了不少亏。别的不说，东部神职人员的收入就远比西部的同行少得多。面对以无神论为主导，视宗教为不受欢迎的“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的社会主义国家，卡斯讷做出回到他的州教区去的决定，肯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有那么一些在西德受完神学教育的人到民主德国去做了牧师，其中也有在西德出生，与民主德国没有祖籍关系的人。他们是应缺乏牧师的东部教会的召唤而去的。他们很清楚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困难关系，但还是要与乌布利希¹和他的同志们对教会进行的迫害作斗争。肯定也有一些神学家去民主德国是因为他们认为基督教和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也许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在原则上是更公正的社会制度。还有一些人两种原因都有一点。卡斯讷移居时的真正动机是什么，至今无法查证。他本人说是沃尔伯主教鼓励他去的，这可以理解为，卡斯讷不是出于对民主德国的政治同情而回去的。但据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看出，在教会内部他是属于赞同民主德国国家政权那一派的。至少六十年代以后的情形确是如此。默克尔这样评价她的父亲：“他希望教会能面对现实，而不总是远离生活。”此话谨慎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她父亲向民主德国国家政权做出的不仅是内心的某些妥协。对此后面还要细谈。

滕普林的瓦尔德霍夫

在小村克维措，教会始终是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一个中心，卡斯讷在这里只呆了三年就被调到滕普林去了。安格拉和她的弟弟、妹妹在滕普林度过了他们的青年时代。卡斯讷在教会里的第二个职位与传统的心灵关怀工作关系不大，主要是培养教会的工作人员。1957年迁居到滕普林之后，他开始着手建立一个教会工作人员培训班，即后来的“牧师学院”。把卡斯讷召到滕普林去的是1972至1981年间柏林一勃兰登堡的大主教阿尔布雷希特·舍恩黑尔，他认为卡斯讷具备担任这个职务的前提条件，有能力做教育工作。培训班设在教会的一个名为“瓦尔德霍夫”的慈善机构内。这个慈善机构不属卡斯讷领导，据说这带来了一些问题。瓦尔德霍夫地处滕普林城墙以外，为田野、草场、森林和湖泊所环绕，是一大片散落的石头建筑，安格拉·卡斯讷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时代的大部分时光。滕普林本身具有“下勃兰登堡明珠”的美称，距离柏林约80公里，人口1.4万。小城保留着中世纪留下来的城墙，默克尔说它几乎可以和罗滕堡相媲美。如今市内可见修缮一新的大量木框架房屋，哥特式的圣·格奥尔格教堂和巴洛克式的玛丽亚教堂，卡斯讷牧师有时还在里面主持弥撒。流连于小城之内，不时竟会让人觉得时光倒转，像回到了过去。现任市长乌尔里希·舍恩纳希很高兴人们对他的故乡有这么浓厚的兴趣，很多人都想知道一下默克尔长大的地方。霍斯特·卡斯讷和他小两岁的妻子（她1928年7月8日出生于格但斯克）至今仍居住在那里。

瓦尔德霍夫已有150年的历史，它是从1852年在滕普林成立“流浪男童教育协会”开始的。十九世纪不少教会团体和个人纷纷建立了一些所谓“救济站”，以救助工业化进程中生活困难的儿童和青少年。在这里孩子们可以得到在他们生活中缺少的东西：关心、培训和教育。1854年1月25日第一次有两个男孩搬进了这样一个机构，即后来的“吉石之家”。1888年“流浪男童教育协会”买下了现在瓦尔德霍夫那片地，之后不仅建了住房，还修了农田、园林和建了一所寄宿学校。卡斯讷到瓦尔德霍夫来任职的时候，这里正面临着剧烈的动荡。1958年国家强迫关闭这所学校，

把孩子都转到国家统一设立的青少年工作站去了。同一年，让有智力和精神障碍的残疾人搬进了瓦尔德霍夫。民主德国对残疾人不感兴趣，所以教会在这方面有一点可以利用的空间。残疾人不只是一要“看护”起来，而且要给他们创造一个有尊严的生活环境。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可以从事农业、园艺、打铁或制鞋的劳动，虽然是在极为简陋的环境下，但至少是有了有益的工作。另外这些残疾人也没有被隔绝在社会之外，比如他们也帮着卡斯讷一家做家务、整园子，参加他们的家庭聚会，可以在滕普林自由活动。默克尔如今描述说，那时她与残疾人有着完全正常的交往，从中她学到了，健康并不是愉快的标尺。后来某个时候她才知道，别的人对跟瓦尔德霍夫的居民直接接触感到难堪，她的同学来访时见到残疾人会觉得紧张害怕。她家当年的邻居里塔·科珊是个护士，她说得更明确：“当地的父母都不愿意让孩子到瓦尔德霍夫来跟那些‘有毛病的’一起玩。”

在瓦尔德霍夫的幸福童年

学会走路以后的孩子常常会不停地走来走去，在他们幼小的眼中，这个博大的世界里有太多的东西等着去发现。一旦他们知道可以通过两条腿去探知世界，就只有父母可以阻止他们，不能自作主张跑得太远。安格拉这孩子却不是这样。她的语言能力很强，三岁时到汉堡姥姥家住了10个星期后就带回了一口的汉堡腔。她甚至能用地道的汉堡口音求妈妈帮她下楼梯。她在运动机能方面发育有些迟缓，这孩子就是不肯好好走路。最后总算能站直了走之后又过了好几年，她才敢下山或下楼梯。回忆起来她说自己在运动方面是个“小笨蛋”。与绝大多数人不同，据她自己说，她需要先思考清楚下山的整个过程是个什么样，然后再实际尝试和学习。她在这方面的困难使得她常常派比她小三岁的弟弟去拿想要的东西，而自己则站在学步筐里等着。到了12岁，为了下台阶时不至于有时迈得太多或高度不当，她每一次都得把要走的路预先周密思考。

谈到父女之间的个人关系，女政治家回忆说，童年时父亲因为教会的工作而不在家她会不高兴。由于在教会内担任的领导工作，卡斯讷必须也可以在瓦尔德霍夫以外的地方活动。每当安格拉认为爸爸该回来的时候，她就试着跑出去迎他。但是她又不敢走得离她熟悉的地方太远。对一个爱她的父亲又惧怕陌生环境的小姑娘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难题。如果吃晚饭的时候爸爸在家就万事大吉了。她对女摄影师赫尔琳德·克贝尔说过童年时曾非常爱经常不在家的父亲以及对他的看法：“他总是工作，他的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混在一起的，有时为了工作就牺牲了照顾家庭。他非常勤奋和认真。什么都要求十全十美，这对一个孩子来说很难。他主动与人接触，与人交谈。小的时候，有时让我恼火的是他的那种方式，对谁都那么善解人意，可如果是我们做错了什么，他就完全是另外一种反应。”这是了解今天的默克尔很关键的一句话，政治上她要求十全十美的解决办法，用的却常常是一种看似不近人情的方式。

教会是与社会主义共存、共处还是对抗、对立？

年幼的安格拉一定很早就察觉到，父亲的职业与政治环境密切相关。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柏林最后通牒，要求把柏林西部的几部分变成一个独立、中立的整体。1961年8月13日建立了柏林墙，至此东西方冲突在德国达到高峰。对默克尔和所有德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今天的基民盟主席在讲话中有时会提到建墙给她的家庭带来的巨大影响。民族分裂在那个8月的日子里真是一字不差地被水泥砌住而固定下来了。直到多年后勃兰特领导下的社民党和自民党联合执政时，两德关系才在“交往促转变”的口号下有了最初的实质性好转。影响卡斯讷一家生活的，不光是国家的分裂，还有教会的分裂。而卡斯讷本人，不光是教会分裂的受害者，同时也是肇事者。

在民主德国，很多牧师的孩子都受到压制和歧视。尤其是在民主德国建国后头几年里，他们不能上大学，不能从事想要从事的职业。统一社会党所号召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强迫教会退回到纯粹“装饰摆设”的地位。措施包括：国家提供给教会的费用消减一半；禁止在火车站活动；对教会青年工作的压制不断升级；严格限制教会慈善机构的活动以及关押教会神职人员和工作人员。在当权者眼中，新教教会尤其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温床。

民主德国人绝大部分是信仰基督教的。除了某些个别偏远地区以外，比如图林根州的艾希菲尔德，天主教会的影响相对来说很小。因此基督教会和它的代表人物就成了阶级敌人的象征，他们反对工农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必须打击。统一社会党的长远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员有义务用阶级分析的眼光来分析所有社会现象，为消灭阶级剥削而努力。

1953 年斯大林去世后，神职人员及其家属的境遇有所好转。但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又不断爆发了宗教和世俗权威之间的冲突。哪个牧师如果以明确的方式对统一社会党当局表示拒绝，他本人和他的家庭便会受到严重的迫害。1957 年全德基督教会与联邦政府在波恩签订的“军中精神关怀协议”受到民主德国领导的激烈批评。老主教舍恩黑尔回忆说，那个协议之后政府和基督教会断了交，从此国家自己挑它喜欢的联系对象。柏林墙的建立使全德基督教会的统一变得更加困难。无论是教会方面还是国家方面都试图建立某种教会与社会主义共存的方式。1969 年成立的民主德国基督教会联盟提出的格言即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们要成为与社会主义共存共处的教会而不是与之对抗对立。”舍恩黑尔说：“我们要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正的社会主义。当时我们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

基督教的社会伦理为某些神学家建立了一条通往社会主义思想的桥梁，一些人把民主德国视为区别于资本主义联邦德国的另一种选择。1969 年 9 月在埃森纳赫举行的民主德国基督教会联盟首届代表会议上对联盟章程中第四款第四条的表述发生了激烈争论，这一条事关与西部全德基督教会的最后一点联系，它是这么写的：“联盟把自己视为德国全体基督徒中一个特殊的团体。”教会内部的某些机会主义分子企图删掉这一节，其实统一社会党当局也并没有特别反对西德各州教会以及全德基督教会给予东德地区的教会联盟大笔财力支持。另外通过教会调解而成的联邦德国购买政治犯一事也为民主德国政府带来可观的收入。

1969 年民主德国基督教会联盟成立之前的那些年里，东部教会内部经历了异常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就是民主德国的基督徒与全德基督教会的统一问题。1967 年在施普雷河畔菲斯滕瓦尔德开会的全德基督教会代表们还都坚持统一性。但是教会内，包括勃兰登堡州教会内，主张打破统一的人逐渐增多，他们甚至连州教会的统一都不想要，因为州主教府设在西柏林。民主德国教会领导联席会议在 1961 年秋委托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制定民主德国教会活动准则。1963 年 3 月 8 日联席会议公布了《关于宗教自由及教会工作的十条准则》，这份以 1934 年基督教会巴尔梅声明 1 为榜样制定的文件坚持了宗教立场，它无疑成了统一社会党领导的一个眼中钉。《十条》中说，教会不能躲在教堂的高墙后面；不能对滥用权力保持沉默；基督徒不应服从于某一种意识形态的独裁；世界革命不是最后的决定；新社会里的新人不是历史的终结。《十条》中的这些和其他的某些说法在教会内部也是不无争论的。

1958 年 1 月 17 日成立了白湖工作小组，卡斯讷也是成员之一。关于这个小组后面还会细说。小组“受统一社会党委托”（这是民主德国反对派研究学者诺伊伯特的说法），在柏林神学教授汉弗里德·米勒的指导下起草《关于教会自由与活动的七条纲要》。和《十条》一样，这两个文件都继承了基督教会和抵抗人士迪特里希·邦赫菲尔的精神，但《十条》继承这个传统是作为对独裁主义的批评，而《七条》则利用反法西斯主义使教会与自称反法西斯的统一社会党领导的国家一致起来。统一社会党宣传的反法西斯主义在白湖工作小组的帮助下披上了美丽的宗教外衣。教会与统一社会党合作最具象征性的高潮是 1978 年 3 月 6 日民主德国基督教会联盟理事会与国务委员会主席昂纳克的会晤。据舍恩黑尔回忆，昂纳克先就宗教自由的问题谈了一个半小时。谈话结束送舍恩黑尔出来时，昂纳克说：“要做到这些，我们俩都会在自己人那里遇到很大的阻力”。1982 年时舍恩黑尔说“国家与教会的关系不错”，可以看出，在民主德国存在着“两个基督教会”，他们各自的代表人物之间进行着几乎你死我活的斗争。一方向国家要求尽可能多的独立性，另一方，无论出自何种原因，愿意妥协合作。

教会内部舍恩黑尔路线的对立面是后来尖锐批评民主德国的柏林大教长西格弗里特·林哈德，他周围吸引了众多基督徒。舍恩黑尔当年的宗教政策至今仍在受到某些神学家的批评，比如柏林

的牧师鲁迪·潘科。他谴责教会在 1976 年 8 月奥斯卡·布吕泽维茨牧师自焚事件上表现出的背叛。直到统一社会党党报《新德意志报》把布吕泽维茨说成“精神分裂”，教会才做出反应。舍恩黑尔曾拒绝打开潘科转交给他的持批评意见的年轻人写的信。潘科 1943 年出生于柏林，1965~70 年在洪堡大学学习神学，始终对国家和教会持批评态度，与其保持距离。

“红色”卡斯讷

由于卡斯讷对年轻神职人员的影响，他在柏林-勃兰登堡州教会内起着核心作用。他建立并领导的牧师学院在柏林墙修建之前一直是由西部教会资助的，这是一个培养助理牧师和培训牧师的重要机构。它可以说是州教会的精神中心。此外卡斯讷在教会内部有很好的关系网，虽然他的观点有时在教会里不能赢得共识，甚至还得了个“红色卡斯讷”的绰号。他与舍恩黑尔大主教关系非同一般，大主教始终支持他。1974 年 9 月 27 日至 10 月 1 日在波茨坦举行的民主德国基督教会联盟代表大会上，舍恩黑尔做了一个题为“教会作为学习者的共同体”的报告，而卡斯讷做了补充报告，由此他的影响力可略见一斑。潘科说“卡斯讷在教会内部掌握着人事权”。他连续 30 年一直担任牧师学院院长的事实说明，在国家面前始终表现谨小慎微的教会上层无意对这个领导职务作人事变动。他多年一直是白湖工作小组成员，有几年甚至在核心圈子里。

这个工作小组的成员中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他们都是教会内部奥托·迪贝利乌斯的反对派。迪贝利乌斯是柏林-勃兰登堡州教会的大主教，主教府在西柏林，由于他始终如一地拒绝承认民主德国政府而被禁止入境。迪贝利乌斯在其著名的论权威的文章中表示只承认一个权威，就是基督的权威。对统一社会党采取如此强硬的态度不是所有教会人士都愿意的，舍恩黑尔尤其不愿意。担任大主教以前他一直参加白湖工作组的工作。在教会内部舍恩黑尔有反法西斯“特殊背景”，他是邦赫费尔的战友。1958 年 1 月 17 日在柏林白湖举行的一次牧师大会上成立了白湖工作小组。最初的小组成员当中有一些牧师是因为不同意迪贝利乌斯大主教的宗教政策，（迪贝利乌斯由于其明确的反共立场而为统一社会党所痛恨），但绝不是统一社会党的追随者，例如大教长林哈德开始也曾是白湖小组成员，后来成为著名的正直而勇敢的异见人士。但是白湖小组里也确有一些神学家，作为教会边缘的“进步势力”，在宗教如何适应新的独裁政权方面被人利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特色社会主义的亲密接触。白湖工作小组逐渐变成了一个组织，用民主德国反对派研究专家诺伊伯特的话说“是统一社会党在教会中一支延长的手臂”。白湖小组日益严重地受到柏林神学教授汉弗里德·米勒和他同是大学老师的妻子罗泽玛丽·米勒-施特莱桑德的影响。经人说情，米勒得以在没有通行书号的情况下出版至今仍在发行的《白湖杂志》，连玛戈特·昂纳克 1 都为它写过文章。在国家安全部的文件中，白湖小组被算作“教会内的进步团体”，直到 1989 年还想把它更多地拉入同“敌对的反对派势力所做的政治斗争中去”。米勒从没对国家安全部批评过半句。

对卡斯讷来说，在宗教权威和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权威之间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关系是可以想像而且是所希望的。他认为教会里不应有从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政府的反对派，或者说不应是个独立王国。他的女儿默克尔现在说，有几年他曾深受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的影响，那个学说要求基本财产社会化。另外他也不喜欢具有联邦德国特色的官方教会结构，更主张美国为榜样的那种基层教会，每个教区供奉他们的牧师。“他对民主德国的评价也比我温和，并不是绝对否定。”默克尔如是说。

颇具影响力的教会人士

卡斯讷在教会内强有力的地位要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瓦尔德霍夫在柏林-勃兰登堡教区闻名遐迩。多数神学家无论是进修，还是在第二次国家神学考试前、当助理牧师的学习期间，都得到滕普林来。勃兰登堡的每一个牧师在学习期间或长或短都至少在瓦尔德霍夫呆过一次，他们在这里跟默克尔的父亲学讲道。可以说卡斯讷一家在民主德国时期是小有知名度的。牧师学院的教师和学员在滕普林逗留期间住在瓦尔德霍夫，他们当中就有柏林的牧师赖讷·埃佩尔曼，转折时期他曾是媒体关注的风云人物。当时的住宿条件极为简朴，在那里逗留过的潘科牧师说，他感觉就像青年旅馆，所有学员都睡在一个大厅里。他们可以使用卡斯讷就当地条件来说藏书丰富、包括西方神学著作的

图书馆。培训班和研讨会的题目囊括了教会工作的方方面面：布道静思、讲解圣经、心灵关怀、青年工作方针以及弥撒安排等。此外也经常讨论民主德国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困难关系。

后来的民权人士埃佩尔曼在回顾往事时，对滕普林这位牧师培训导师颇有微词。在任助理牧师期间，埃佩尔曼和其他同行一起到滕普林参加了几周的布道培训班，一边准备他的第二次国家考试。他回忆说：“有一天晚上，我们和卡斯纳牧师坐在一起喝葡萄酒聊天。他给我们讲起了如何从西边来到民主德国，现在在这里为教会辛苦工作。他估计，在他有生之年这里的基督教会会继续缩小，大多数教区都将无力负担一位专职牧师。只有学得特别出色的，才能留任。他自己属于幸运的，很多人不得不从事另一种职业谋生，下了班当牧师，成了业余布道者。”“幸亏卡斯纳兄弟的这个预感没有实现”这是埃佩尔曼今天的话。他对卡斯纳激励年轻神学家当牧师的能力深表怀疑。拒服兵役的埃佩尔曼后来在柏林的萨马利特教堂组织“蓝调弥撒”，成立和平小组，给官方教会出了不少难题。他属于有勇气的教会人士，反对把教会作为与社会主义共存的工具。

从另一方面来说，卡斯纳也不时对所谓更好的社会制度中现实存在的状况提出批评。在讨论中他表现得很开放，虽然坚持自己的主张，但绝不搞什么思想改造。卡斯纳对政治问题的立场虽不无争议（至今如此，后面还会讲到），但瓦尔德霍夫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远离民主德国日常统治的一块地方，这里可以进行相对自由的讨论，可以与自由世界建立联系。据说默克尔后来也参加过这类讨论。民权人士、物理学家京特·诺克回忆说，一个由他和马库斯·卡斯纳发起的“家庭小组”，现在他把它叫做“哲学家俱乐部”，从1986年开始每年在瓦尔德霍夫召开年会。诺克本人1990年是科特布斯专区“联盟90”1竞选名单上的无党派人士，后当选为民主德国第一届自由选举产生、同时也是最后一届人民议院议员。“家庭小组”以往是在莱比锡开会，它的成员主要是些对当时的体制持批评态度的物理学家、医生和化学家。在瓦尔德霍夫举行的会议上还有另外一些人参加，比如来自波鸿的西德神学家克里斯多夫·弗莱尔。参加会议的人也都可以使用牧师学院的图书馆。那里有一样民主德国少有的东西：复印机。如今已是基民盟联邦议员的诺克谈到1989年9月23日晚上的一次会议，教会方面应邀出席的人当中有牧师卡斯纳以及诺克、如今的党主席默克尔，那天他是第一次见到她。参加会议的总共大约35人。柏林墙开放前不久的这次会议，默克尔在场，她强调了民主德国改革的必要性，而其父则更多地指出了局势失控的危险。

瓦尔德霍夫从前的行政院长，现任滕普林市长的舍恩纳希，多年一直与卡斯纳有矛盾。因为卡斯纳和他的副手需要的房间越来越多而残疾人被挤得没了地方，两人发生过激烈争吵。舍恩纳希说卡斯纳借残疾人名义扩大牧师学院。他给教会写过很多抗议信，但杳无回音。不知要求了多少回之后，总算与大教长谈了一次话，教会法学家曼弗雷特·施托尔帕也与舍恩纳希见了面，一个小时的谈话结束时，施托尔帕说，“假如问题不见解决，你再来报告。”但是施托尔帕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解决。瓦尔德霍夫的工人们也都不喜欢卡斯纳，舍恩纳希说他对他们总是一副居高临下的态度。

党和国家政权，尤其是国家安全部，几乎控制着全部舆论和公共生活以及直接涉及私人领域的教会活动。而只要愿意与国家政权合作，虽然也受到很多限制和安全部门的监视，但教会的头面人物还是享有某些特权的。比如卡斯纳一家有两辆汽车，一辆是通过Genex公司买的私车，另一辆是公车。这在民主德国时期是绝对少有的。通过Genex公司礼品服务部，民主德国人可以支付东马克而得到西方外国的馈赠，这一方式给民主德国带来了大量资金。统一社会党领导给予部分牧师这种特权，目的在于挑拨牧师和普通民众的关系。虽说在民主德国牧师的收入比工人的收入低，但一个普通的民主德国公民想买一辆国产的“特拉班德”或“瓦德堡”牌汽车需要等10到15年，而牧师通过Genex公司只要四个星期。卡斯纳牧师享有的特权中还包括可以出国到西方去，这使他有资本可以在同行面前显得见过世面。

牧师为了子女而妥协吗？

卡斯纳与国家安全部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一方面，安全部的档案中有这样的记录：“卡斯纳，1954年来自汉堡/西德，是我们工农国家的反对者。”另一方面，有一个女记者报道过，据当年的民权运动人士，如今默克尔的党内朋友说，默克尔的父亲为安全部工作过，尽管时间

极短。要指出的是，所涉及的档案是一份“兼职安全人员的受害者档案”。有一份出于 1972 年的预备档案，记录的是安全部试图胁迫卡斯讷牧师与其合作。卡斯讷手中握有一份苏联异见作家萨哈洛夫的手稿，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不希望看到的东西，于是这份手稿成了要挟他的武器。安全部企图利用卡斯讷的不利处境动员他合作。据说卡斯讷答应交出手稿，也同意就某些问题交换意见，但必须在他的办公室里公开进行。这意味着，与安全部的这次谈话是在教堂以外的地方、没有证人的情形下进行的，这就违反了教会的规定。后来安全部以“暴露”为由停止了这一活动。“暴露”这个词是安全部用来专指准备开始或已经约定的秘密合作因通知第三者（例如牧师通知了自己的主教）而停止的情形。默克尔自己说，父母告诉过她和她的兄弟姐妹如何同安全部的人打交道，他们都知道什么地方该说什么话。

一位民主德国牧师所面临的根本性决定，主要涉及以下四个原则问题，对于愿意妥协的牧师来说，在实践中如何决定很不容易。必须考虑的因素是，一位牧师不仅对宗教和教会负有责任，而且对家庭负有责任，有时妥协就是因此而做出的。

四个根本决定：

1. 是否参加民主德国的选举？某些牧师是坚决拒绝参加选举的，理由是他们不愿使一个不信基督的国家政权合法化。另外一些有时去参加，但都去投票室投票。这样做是为了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因绝大多数选民为了表示对国家的忠诚都是当众把选票折好丢进票箱。教会内的人估计卡斯讷是去参加选举的。从安全部的材料上看，至少到 1962 年他从未参加过。估计后来去过。他本人拒绝对此做任何说明。

2. 收到全国阵线“教会小组”的邀请怎么办？统一社会党把“全国阵线”建成为一个把所有政党和社会团体都包括在内的组织。基督教会是惟一没有加入全国阵线而又被允许存在的组织。全国阵线内有一个教会工作小组，牧师常会受到这个小组的邀请。很多牧师不应邀，另一些牧师愿意利用国家提供的这个讨论机会。凡是应邀的，都被视为愿意妥协。1975 年 12 月卡斯讷在全国阵线安排的活动中报告了他 1974~75 年访问意大利的印象，他认为只有意大利共产党联合其他进步力量才能带领这个国家脱离贫困。绝大部分牧师是不应邀的。卡斯讷拒绝对他的决定做任何说明。

3. 牧师子女是否参加成人节？1954 年民主德国根据自由宗教运动和十九世纪工人政党的反教会传统设立了青年成人节仪式。主要是要与基督教青年会及其举行的坚信礼作斗争，战后时期青年会曾吸引了不少人。成人节变成了坚信礼的竞争者，对教会神职人员来说，让自己的孩子去参加成人节显然不合适。有报道说，安格拉参加了成人节的准备活动，但没有参加仪式。安格拉同学们的成人节仪式是 1969 年 4 月 19 日在以建筑工人埃利希·维纳特命名的文化宫举行的。通过这个仪式，安格拉的同龄人就算步入了劳动人民的大家庭，这个大家庭在工人阶级及其革命政党的领导下，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在民主德国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安格拉于 1970 年 5 月 3 日在滕普林的圣玛丽亚教堂接受了坚信礼。为她主持坚信礼的是大教长汉斯-格奥尔格·施拉姆。有趣的是，她的弟弟马库斯参加了成人节仪式这一点，至今不为人知。

4. 牧师子女是否应该或可以加入少先队和青年团？很多牧师禁止他们的孩子加入少先队和青年团，另一些让孩子们自己决定。卡斯讷夫妇就是这么做的。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在学校以及以后的工作中受到歧视。曾为民权人士的绿党联邦议员维尔纳·舒尔茨解释说，绝大多数人把青年团当作一个“面具”，很多人逃避入团，不少人入团是因为不想被排斥在集体之外。安格拉·卡斯讷在她的学校不光是个普通团员，她的同学回忆说，她当过团小组的干部，当时她已显露出了组织天才。

总而言之，卡斯讷的立场很难按照固定模式用几句话描述清楚，他是主张教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共存的牧师，是坚持民主德国国家政权、受国家影响的白湖工作小组的领导成员。卡斯讷对国家的要求，用谨慎一点的语言说，是采取妥协态度的。要是能弄清楚国家安全部设计的化名为“瓦尔德霍夫”的长远发展计划最终是怎么失败的，一定很有意思。

卡斯讷维护的是舍恩黑尔的路线，想在不与国家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尽可能保证教会的自主自治。大家都知道他对西德基民盟政策蔑视批评的言论，说他们 1966 年就已经经营不下去了。有报

道说他在教堂布道台上连读一下对捷克问题的声明都不敢。他的很多同行，包括舍恩黑尔，都比他勇敢。另一方面，他是个知识渊博的牧师。比如安格拉九、十年级的班主任、数学老师，县督学沃尔夫·多纳特谈到过一次家访。至今他还能回忆起摆满书籍的客厅，包括教学法方面的书。他所结识的牧师是一股“知识的力量”，认真研究国家体制；对教学法很有造诣，并且能认真地听别人讲话。

对卡斯讷的评价时至今日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安格拉的同学哈拉尔特·洛什克认识她的父亲，他回忆说：“卡斯讷是一个特别的人，只要他一说话，别人就只有听的份儿。他有权威，看人准，懂的多。”“卡斯讷是个特别的人”，这也是市长舍恩纳希对牧师学院多年院长的评价。同样是在牧师学院认识卡斯讷的潘科如今回忆说：“从精神上来说他不赞成民主德国那一套。在瓦尔德霍夫的讨论中，他总是试着从精神层面来进行批评。他是个小屋里的闭门思索者。他可以启发别人。但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批评者。他找到了自己的小屋，知道避免与国家冲突的界限在哪里。”他没有试着反对国家。“他不是随时说顺从话的人。理论起来他像个务实的批评家，外表像个普鲁士军官。”“他是新教的典型代表。”他很自律，也要求别人守纪律。

母亲被禁止工作

安格拉的母亲肯定是更愿意留在西部的。作为教师她本想教英语和拉丁文，但因为是牧师的妻子不允许在国立学校工作。她申请了多次，都被当时的县督学克劳斯·弗莱明拒绝了。移居到民主德国来之前她肯定也是知道其后果的，她的大女儿安格拉后来说过，妈妈是出于对父亲的爱情跟着来的。所以母亲就没有工作，而主要照顾孩子：大女儿安格拉，年幼三岁的弟弟马库斯，1957年7月17日出生；以及1964年8月19日出生，比安格拉小10岁的妹妹伊蕾娜。卡斯讷家的孩子不用依赖国家托儿所、幼儿园的教育。后来卡斯讷夫人在各种教会机构工作过，在那里教“教会英语”。添上“教会”这个词是为了让国家的所有检察机关都清楚，这里的教学属于教会工作。东德的很多神学家都很愿意学英语，因为在国际交往中，与有更多英语实践机会的西德同行相比，他们显得落后。卡斯讷夫人和她的先生一样，可以出国旅行，甚至去过美国。

由于被禁止工作，卡斯讷夫人来到社会主义新家乡以后的最初岁月里只管教育孩子。女儿安格拉如今回忆说，她和兄弟姐妹有什么话都对妈妈说，家里的日常事情都是妈妈管。她启发孩子回家讲学校发生的事情，高兴的，不高兴的都说。2004年12月6日基民盟联邦党代会上，默克尔说：“每天放学后我都和母亲聊一到两个小时，把什么都倒给她。我至今感谢我的父母，使我们在家里能有这种机会。”卡斯讷夫人非常重视孩子们的教育，由于家庭这个背景，孩子们在学校肯定会比那些工人家庭的孩子遇到更多的困难，因此母亲有意识地鼓励她的三个孩子积极争取好的学习成绩。每天早上孩子去上学时，细致、乐观、坦诚的母亲都嘱咐他们，身为牧师的子女要比别人表现得好，否则在这个信仰无神论的劳动人民的国家不能上大学。虽然她总是在鼓励别人树立信心，但孩子们在学校里的竞争的确是她的一块“心病”。让她心痛的还不止这一件事，1961年柏林墙建起来之后，她常常哭泣。

问到父亲和母亲谁更重要时，默克尔回答得很外交，“这不好说”。父母有着传统的分工：遇到特别麻烦的事情时父亲才出面。此外从父亲那里学到了严谨的逻辑思维和清晰的论证。梅尔克说自己 and 弟弟妹妹受到的教育是很严格的。虽不是经常有的事，但只要是必须，父母一定会惩罚：扣除零花钱啊，关禁闭啊，极少有的时候也会打一巴掌。哪个孩子病了，发烧，退烧后还得在床上躺三天，至少不能出家门。说到孩子之间的关系，默克尔认为自己承担了传统意义上大姐的角色，起到了平衡作用。父亲在回忆时证实了这点，说自己的大女儿从性格上看是追求和谐的。每个孩子都有各自的长处和弱点：安格拉的语言能力发展得很早，比其他两个都好，但曾和她非常要好的弟弟很快就在运动方面超过了她。据说他还能背出所有教皇的名字。妹妹伊蕾娜的动手能力很强，所以后来也没有像哥哥姐姐那样上大学。

1961年8月13日，最初的政治记忆

德国的分裂始终是卡斯讷家庭生活中的一部分。两德边界横亘，来往不便。西边的亲戚过来也很麻烦。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建立之日，安格拉刚满七周岁。建墙之前和之后卡斯讷一家和母亲方面的亲戚始终有密切的联系。外祖母、姨妈和表姐妹们不时会来滕普林，和孩子们建立起了感情。这也导致安格拉有时会与表姐妹们攀比，比较的结果是，西边的生活也不是没有烦恼的。“这增强了我的自信。”后来她不无自豪地评论了当年的心理活动。

默克尔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1961年8月13日被统一社会党称之为“反法西斯保护墙”的柏林墙建立之日，父亲在滕普林讲道，母亲坐在教堂里哭泣。这是安格拉对政治事件最初的记忆。建墙后的23年里母亲不能去西边，直到外祖母去世去参加葬礼。建墙后卡斯讷家里有个充满希望的口号，只要墙一拆，就去西柏林凯宾斯基饭店吃鲜蚝。自愿从西边来到东边的牧师和夫人所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理论上一直存在的返回到西边去的可能这一来不说彻底，至少是长时间内破灭了。不久前全家刚从西边度假归来，他们和住在汉堡的外祖母一起，开着一辆大众牌甲壳虫汽车去了巴伐利亚。虽然不说，他们还是受到迫害的。尤其对卡斯讷夫人来说，承受住这些不容易。随着建墙而急剧激化起来的形势对于原则上肯定民主德国国家政权的牧师来说，只有两种选择的可能：或者是潜在的反对禁锢的抵抗意识被唤醒；或者鉴于无法改变的政治现状而内心开始加紧接受民主德国当局。在政治心理学中时有谈到某种“斯德哥尔摩情结”，比如被恐怖分子劫持的人质，在毫无防卫能力的情形下，就会屈服于绑架者的保护。民主德国国家政权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假如能够知道原则上赞同民主德国国家的那些东部神学家们当时脑子里是怎么想的，一定挺有意思。在很多人看来，建墙改变了框架条件。这话听起来一定很荒唐：建墙对某些人来说有“解脱”的一面，它改变了选择方式，虽然把人“关住了”，同时也解放了。因为出走的可能性彻底消失了。

从前汉堡的亲戚除了来访还能不时瞒过边防军带进些西方的书籍，1961年8月13日突击建墙之后来访不得不中断，但他们还是常往东边寄包裹，传送一点市场经济的生活方式。汤料、香皂、牛仔裤以及许许多多让牧师全家高兴和喜欢的东西。卡斯讷家不知有“检查”二字，寄给他家的西方书籍也全部如数收到。如果某一次有什么被没收了，负责卡斯讷的国家有关部门也会安排把包裹转过来。

整牙支架与艺术明信片

由于有西边寄来的包裹，也因为父亲当牧师的收入不够给三个孩子买衣服，默克尔说，她从没穿过典型的民主德国服装。选衣服的标准首先是看钱够不够，其次才是是否时髦。十几岁时她参加聚会穿的是西边的牛仔裤，而她的女朋友们都喜欢穿迷你裙。卡斯讷家的一个女邻居还能回忆起，牧师的大女儿总是戴着一顶宽沿的帽子，看着像个“小太阳”。然而不光是在装束上牧师女儿与她的朋友和同学们不同，她的同龄人中有一大批都喜欢听滚石乐队的音乐，默克尔喜欢跟着披头士乐队的音乐跳舞，尤其喜欢 Paul Mc Cartney。此外妹妹出生后，年仅13岁的她就已经有了自己单独的房间，而且是和父母的住宅分开的。对于处于青春期的年轻人来说，这无疑是个美事儿。哪个年轻人不梦想着尽可能独立和不受监视呢？默克尔这间陈设简单、墙上只有一幅印象派画家塞尚的印刷画（从汉堡的外祖母处得来）的房间立即成了她和朋友们理想的聚会点，这里可以不受干扰地举行各种活动。

果然，从一年级开始直到高中毕业一直和后来的基民盟主席同班、现任巴尼姆县议会社民党议员的博多·伊尔克回忆说，在那里很少见到默克尔的家人，既见不到严肃而让人难以接近的父亲，也没有见到马库斯和伊蕾娜。惟一有时来和客人们一起聊天的，是和气的母亲。从没有提到过安格拉的初恋。默克尔自己间接地证实了这点，她说自己第一次爱上的人是在大学期间遇到的：“中学时偶尔有过一点恋爱的感觉，主要是柏拉图式的。那时候不像现在这么快就走到行动这一步了，这方面我无论如何不是一个早熟的人。”她对当时的那些男同学也没有什么吸引力，上学时的安格拉没有吸引过男生的眼球，当年的物理老师西格弗里特·金策尔如是说。

她的爱好也与同龄人大相径庭。安格拉痴迷地收藏艺术明信片，很喜欢到柏林去看话剧和参观博物馆，在那里她认识了各国各民族的人，主要是保加利亚人、美国人和英国人。15岁时她就和

美国人一起去吃饭，给他们讲民主德国的经历。她的奶奶住在东柏林，让孙女看电视看到晚上 10 点。奶奶是安格拉随时离开小城、到大城市来的又一个理由，否则父母不是总能允许的。还有她对联邦德国政治很感兴趣。她说上中学时就已经能背出联邦政府内阁全体成员的名字。1994 年她对《明镜》周刊记者于尔根·莱讷曼说，古斯塔夫·海讷曼当选联邦总统的消息她是在学校厕所偷偷听到的。一个女同学说默克尔当时最喜欢的是赫尔姆特·施密特，敬佩他的自信。联邦德国的最新发展她是通过看西德电视节目“瞭望”和传奇记者格哈德·洛文塔尔主持的“二台报道”来了解的。

除此以外她是个普通、正常的孩子，东德的一个普通、正常的年轻人，戴着整牙支架和矫形鞋垫，有担心害怕，也有希望和影响至深的经历。《星期日图片报》的一次采访中，记者请她即兴说出所能回忆起的童年经历，她说是圣诞节前和父亲一起到森林里去伐圣诞树。很小的时候她最怕大马和炸毛的火鸡。奢侈的事情是能尽情地喝苹果水，因为她家没有自己的苹果树。“能有苹果水和两个炸肉饼是小时候感觉很幸福的事情了。”别忘了还有带畦的小园子，她种了紫菀，金盏和蔬菜。她自己说胡萝卜长得最好，而菜花和小萝卜总是不尽人意。青年时代后期她很愿意骑轻骑摩托车，但父母不允许，晚上外出也不能超过规定的回家时间。社会主义的优等生

“她是班上最好的学生，别人跟她差一大截。”伊尔克这样说。多莉斯·伯克，现滕普林“黑乌鸦”酒馆的女老板说：“安格拉是个不起眼的人，别人不好好学习的时候，她总是认认真真地作笔记。”除了当年的同学，安格拉的老师们都说她是个勤奋而有天赋的姑娘。当年的数学老师、后任滕普林歌德中学校长的汉斯-乌尔里希·贝斯科说她在一般情况下总是觉得要求太低，吃不饱。她的成绩始终很突出，她很勤奋，也很认真，尽管不是特别要强。但没有看出来有领导能力。老师还指出，安格拉虽然因为是牧师的女儿而“受苦”，但她在班上并不孤立。从九年级到高中毕业，教过她四年的物理老师金策尔也证实了安格拉和班集体很融洽。大家都知道，她的父母不愿意有什么冲突，而希望他们的孩子在班上能得到承认。他也证实了安格拉的语言天赋。说她没有气过老师，也从不挑衅，不是只顾自己争第一，文静、自信，是个最理想的好学生。但又补充说，安格拉一方面自信，另一方面还是紧张的，她没有放松和放开的时候，从没有当过一个捣蛋的女孩儿，她是一个时刻自制的典型化身。现在，每当他在电视里看到从前的学生时，总在问自己，一个政治家必得怎样纵横捭阖才能行得通。只有当年的班主任查理·霍恩似乎没什么好话，请他说说从前的学生安格拉·卡斯纳，总遭愤懑地拒绝。这和一件事情有关，父亲认为那是她女儿惟一的一次“青春期发作”，以“反社会主义文化活动”载入她的生平。

默克尔是 1961 年上的学，先是在歌德学校，后改名为赫尔曼·马腾尔中学，这是统一社会党一个领导干部的名字。那是 1972 年 5 月 25 日，县督学弗莱明在校庆周上宣布，这所学校成功地赢得了赫尔曼·马腾尔的命名。之后是列队行进到操场，县委书记讲话后为校牌揭幕。报上的一篇文章报道说，弗莱明和四个学生代表大家宣誓，要做出更大的成绩，不仅有很好的学习成绩，而且做好社会工作，不辜负这个校名的荣誉。1989 年政治变革后，这所学校改成了小学。2006 年它将庆祝建校 100 周年，1906 年建的这座三层的砂石建筑，1943 年之前一直是一所私立林业学校。

70 年代中期开始，每一届学生中只有大约 10% 能上高中。八年级的成绩是高中录取的基础。从九年级开始挑选最好的学生。一个由县督学和中学校长组成的委员会决定录取谁。当时的县督学，后来在昂纳克夫人领导的教育部任司长的弗莱明说，当时在学校虽然优先照顾工农子弟，但绝没有歧视牧师子女。在一个像民主德国这样计划周密的教育制度中，高中毕业生一般来说肯定是能上大学的。十一年级的成绩是上大学的基础，最终的录取要等到毕业之后。

统一社会党极为重视学校、尤其是高校的意识形态教育，因此高中的各门功课里马列主义学习是一门重点。安格拉平行班的同学哈拉尔德·洛什克说，我们老师说过，我们学校是干部铸造基地，谁不接受铸造就被淘汰。据说校长加布里埃尔在学校宣布过多次，假如他弟弟从西边寄包裹来，他拒收。另外他还威胁说，假如伊尔克不改正把从西德青年杂志《Bravo》上的照片翻拍下来卖给同学的错误，就要开除他。拎着西德百货商店购物袋来上课的学生都会被赶回家，在一个忠实执行党的路线的学校内没有西方广告的地方。主要靠学习成绩出色，默克尔多次逃过了教师的打击压制。一个同学给她出主意，被问到父亲的职业时，含糊不清地回答，使得“牧师”听起来像“司机”¹。

青年团员的蓝衬衫

不是到了上高中，而是从一年级开始默克尔就是最好的学生。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学生会因出色的成绩获得奖章。但当时七岁的安格拉却没得到。因为是牧师的女儿，一开始也不让她加入少先队。一年级时，父母不让她加入这个青年团的预备组织，而青年团是党的后备军。父母说，每个人都得上学，但不是每个人都得成为少先队员。也许是他们的这个决定使她失去了好学生奖章。奖章给了她多年的同学伊尔克。就是这个伊尔克，向班主任老师指出，安格拉的成绩和自己一样好，老师简单明确地回答道：“可你是最优秀的少先队员。”

一年级结束时，加入青年组织的话题又重新议论了一次。父母让孩子们自己决定是否入队、入团。默克尔是个向往集体的人，第一个决定了入队，后来也入了团。贝斯科说见过她穿着青年团的蓝衬衫在大礼堂里。同学们回忆说，安格拉在各方面都是领先的，在青年团里也同样。很多人觉得当个普通团员躲不开，但是，在青年团里再担任额外的工作是否有必要呢？这正涉及默克尔后来的一段生活。

表面上的圈外人，又始终是最优秀的，这一要求，默克尔在学校基本上成功做到了。她最喜欢的课程包括俄语，“美丽的语言，富于感情，像音乐，又伤感”，通过实际运用掌握得比俄语还好的英语以及各门自然科学，物理是她惟一得过不及格的课程，其余成绩都很好。要求实际操作的功课如绘画、手工和体育她都不太行，想达到平均水平都费劲。体育是她的弱项，再努力也拔不了尖。如今拜罗伊特¹的常年观众默克尔在德国电视二台组织的一次“班级聚会”上说，她的音乐不怎么样，“唱歌还勉强，别的都不行”。其他课达到要求都很轻松，她甚至学得很有乐趣。她的短期记忆力很强，应付学校考试很占便宜。好多同班同学都说默克尔同意让别人抄作业，也愿意把自己会的告诉别人。这让她在班里有威信。安格拉的数学老师和一段时间里的班主任多纳特（后来晋升为校长，到转折前任滕普林县学督）如今谈到从前的好学生时极为兴奋，说她棒极了、文静、逻辑性强、主动，让当老师的有乐趣。多纳特虽是统一社会党党员，但安格拉的同班同学们都说，他是个得到学生认可和受欢迎的老师。

除了学习成绩出色，安格拉在其他方面的准则是尽量不引人注目。因出色的社会表现和学习成绩，十年级结业时安格拉从县督学弗莱明和校长加布里艾尔手中接过了莱辛银质奖章（同时获奖的还有同班的哈特穆特·霍恩泽）。和其他自然科学一样，数学在民主德国特别受重视。安格拉是校青年数学家俱乐部成员。在数学奥林匹克比赛中她一直赛到国家级。数学奥赛获奖后，九年级时，1970年她又在俄语奥林匹克比赛中获胜。她跟专区的代表队一起到柏林参加比赛。那天正巧是列宁诞辰100周年。后来默克尔把自己能娴熟地掌握“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语言归功于小时候常和驻扎在滕普林及其附近的苏军战士聊天。尤其令她记忆深刻的是，有些苏军战士当时就说过德国的分裂是不正常的状态，统一只是个时间问题。默克尔的俄语老师艾里卡·本对她有关学好俄语的说法觉得有点失望，“这么说可不好，她的俄语肯定不是跟他们学来的。”说到从前自己这个学生的学习劲头，本老师至今仍赞不绝口：“安格拉特别勤奋，能自学成才，在汽车站等车时还背单词，从不犯错误，内向，但不胆怯。后来我再也没遇到过这么聪明的学生。”本老师觉得她在教育工作中对有天赋的学生给予的特别培养没有得到默克尔的承认。卡斯讷曾把一篇带照片的报上文章剪下来寄给本，照片上是她从前的学生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会晤，文章中说，普京非常钦佩基民盟主席能对他的母语掌握得这么熟练。本说：“这表明，父亲是承认我为他女儿所付出的心血的，可惜安格拉没有这样做。”不管怎么说，当时15岁的安格拉，从学校、县、专区一直到全国一路过关斩将赢得了最终胜利，获得去莫斯科参加世界俄语奥林匹克的殊荣。此行因为两件事留在了她的记忆中：一是在那儿又有人对她谈到了重新统一；二是在世界共产主义中心买到了她的第一张披头士乐队的唱片。“我们都生活在一艘黄色的潜艇上”从此响彻在瓦尔德霍夫。

民主德国的“68年”¹

按照默克尔的说法，不仅在 1961 年，而且在 1968 年，发生了对牧师及其一家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68 年”对东德人来的秘密含义和对西德人完全不同。默克尔说，“布拉格之春”事件后她父亲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民主德国没希望了。这就意味着，父亲卡斯讷以及其他许许多多东部和西部的人都曾抱有希望，布拉格发生的事情能给华沙条约国家带来“人性化的社会主义”。安格拉也知道，家里发生的事情，比如汉堡的亲戚来访，父母发表的政治见解等不是样样都可以拿到课堂上去讲给老师听的。有一件 1968 年的轶事留在了她的记忆中：（那段时间正是卡斯讷担任白湖工作小组领导成员的时候）全家正好在捷克巨人山脉一个叫佩克泊斯内茨克的地方度假。父母租了一家捷克人的度假屋，安格拉当时 14 岁。看到这家的男孩把印有捷克共产党第一书记诺瓦特涅头像的邮票撕得粉碎，“我跑过去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现在杜布切克才是真正的英雄，所以印着诺瓦特涅头像的邮票应该扔到厕所里去。”这是默克尔讲的她所经历的“布拉格之春”。为了亲历起义的气氛，父母到布拉格去了两天，孩子们留在度假地。众所周知，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持续的时间很短，1968 年 8 月 20 日夜里华约国军队开进了捷克。默克尔还记得，8 月 21 日早上她在厨房吃早饭时听收音机里广播着军事行动升级的不幸消息。回到学校，老师让孩子们讲假期经历，安格拉举手说要讲在捷克的伤心经历和邮票的故事，“从老师的眼神里我看出这事危险”于是改变了原来要讲的内容。

校长加布里艾尔没教过安格拉，但显然也可以对她做出评价。根据他的印象，她并没有显出突出的领导能力，但在班上说话还是有分量的。对弟弟马库斯了解得多一些，教过他四年物理。弟弟非常有天赋，尤其是在自然科学方面，另外不光聪明，而且谦虚、文静。校长当然也认识学生的家长，认识安格拉是因为她出色的数学和俄语成绩而获得的奖项。安格拉对民主德国是持批评态度的，像所有年轻人一样，但尊敬师长，甚至可以说很听话。加布里艾尔的夫人赫尔佳是学校的音乐老师，她回忆说，安格拉歌唱得不坏，总让别人在叫她的名字时把重音放在字母 E 上。加布里艾尔夫人及别的老师都觉得奇怪，他们从前的这个学生怎么恰恰参加了基民盟。转折以后他们都猜想她会成为绿党成员。

毕业前夕的轰动事件

牧师女儿参与的一件名副其实的轰动事件，发生在 1973 年 4 月 17 日，高中就要结业的时候，她和同学们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艺会演。那时候西德的大部分大、中学生由于 1968 年学潮的影响还在声援越南的越共。这就与联邦德国不愿因过多批评美国而影响北约关系的政策有冲突。在东部正相反，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统一社会党是跟同帝国主义作战的越南人民站在一起的。当学校要求安格拉的班级为声援在亚洲作战的社会主义兄弟举行一场文艺会演时，全班对老师抗议，事情闹成了丑闻。这是加布里艾尔的回忆。学生们已经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自我意识强烈，对文艺会演毫无兴趣。加上班主任霍恩也没好好组织，因此十二年级二班开始根本不想参加这个活动。卡斯讷警告女儿，学生们这样做有可能前功尽弃。直到在学校广播里被公开批评了之后，安格拉的班级才决定，还是排一个节目。结果却越弄越糟：他们决定朗诵克里斯蒂安·莫根施特恩的诗歌“哈巴狗的日子”，其中有这样的字句：“人啊，好好守护住你自己吧，否则你也就成了墙头的哈巴狗。哈巴狗，坐墙台，朝外看，不下来”，此外用英语——“阶级敌人”的语言——唱国际歌，而不像所要求的那样为越南和莫桑比克的解放运动募捐。当时统一社会党的观点是：越南比什么都要紧。这是后来领导事件调查的弗莱明说的。跟安格拉很要好的一个女同学说，当时学生们对这种形式当中包含的内容问题没有意识。这不光是对校长的挑衅，而且也是对上任不久的县督学弗莱明的挑衅，他的第一位夫人在这个学校教德语。“墙”这个词在特定的政治环境里显得格外可疑。等到弄清楚了莫根施特恩是个资产阶级作家之后，演出引起的轩然大波竟导致国家安全部出面来调查了。这一点，弗莱明现在否认。

加布里艾尔证实说，当时的形势对年轻的安格拉之所以很严重，是因为一个牧师的女儿很容易被当作事件的策划者。后来的调查中显然想证明她是头目，但与班上同学的谈话却没有得到预期的

结果。十二年级二班其他的参与者都是党的高级干部子女，是同志们孩子。有一个学生的父亲是滕普林教师进修学院的党员。全班同学高度团结，没有一个人想摘清自己，全体一起承认所作所为。

家长会上事件接着升级，这次是发生在教师与家长之间。有几个教师代表想算总账，比如提出了不少学生总穿着西方的服装来上学等。这就引起了不少家长的强烈抗议，要给孩子们穿得像样毕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结果一批家长集体起立离开了会场。老师们记得，当时父亲卡斯讷非常担心，怕女儿上不了大学了。卡斯讷自己回忆说，“到 1989 年秋我再也没有经历过这样大胆的抗议事件，我有个内线，告诉我说，这次恐怕得找找上边的人了。”要是能知道那个内线是谁就有意思了。总之牧师卡斯讷极为担心女儿上大学的事。

默克尔回忆起这件事情时总结说，统一社会党领导的国家内就是这样，“如果在某一个层面上事情办不通了，就得去找上一级告状，求得客观一点的解决。”卡斯讷找的是大主教舍恩黑尔，大主教向统一社会党中央负责宗教事务的书记汇报了此事。同时卡斯讷还给统一社会党专区领导写了一封请求信，由安格拉负荆请罪似地带到柏林交给民主德国教会最高法律专家，当时的教会监理会成员，现今负责东部建设的联邦交通部长施托尔帕。

所有参与的学生都收到了一封学校教育委员会 1973 年 5 月 8 日发出的警告信。信中批评他们政治挑衅和违反学校规定的行为，按照规定，每个学生都有义务在青年团的带领下积极参加学校和社会的政治文化活动。十二年级二班的节目损害了全校同学的公众形象，违反了纪律。受到斥责的这些人辜负了社会对即将毕业的高中生给予的信任。对当事学生来说，校长这封信中最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学校的处分不记入操行评语”。最后没有一个学生因此被开除，他们都毕业了，上了大学。但是这段插曲也不是全无后果。班主任霍恩不久便被调走了，原因是指责他没有及时组织文艺会演的活动，关心指导得不够，是所有麻烦的根源。因为这件事，当年的老师不愿对如今的基民盟主席发表任何评论：“不谈默克尔！”

加布里艾尔当时也属于“强硬派”，至今还有人说他是共产党。当年的学生们对他看法比较全面。安格拉的同学霍恩泽会演那天正好缺席，所以没受批评，他说，加布里艾尔很机智，在与魔鬼打交道时能看透魔鬼的诡计。警告不记入毕业操行评语这一点恐怕也是他的功劳。加布里艾尔今天的看法是，那件事处理得过于生硬，不符合教育学思想，但当时根本不给学校时间，从教育学角度来考虑解决办法。愚蠢之处在于，把整个事情从政治角度上纲上线，事件是个挑衅，但不是政治挑衅。民主德国时期，人们对凡是与官方政治不符的东西都很害怕，出于过分的安全考虑，几乎无法处理抗议行为，可以说不具备正确对待抗议行为的能力。加布里艾尔接着问道：“假如没有这件事，如今默克尔又如何证明她曾反对过那个国家呢？”这件事是她求之不得的命运的馈赠。加布里艾尔还指出，那所高中的确是“干部铸造厂”，学生很难被录取。因此教师们也都觉得有义务帮助学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假如在毕业考试前已经分配下来的大学名额再被取消，对学校来说也是很难堪的事。加布里艾尔因肌无力症已坐轮椅多年。他和安格拉当年的数学老师，现任歌德学校校长贝斯科一起住在滕普林一所名为“乐天”的木框架房子里。因为是基督徒，贝斯科在民主德国时期生活得比某些同事艰难。这两个人，据他们自己说，虽然政治观点极为不同，但相互尊敬。《明镜》周刊记者亚历山大·欧桑把他俩比作 **Don Camillo und Peppone**1。

据说默克尔谈到过后来她和她的同学们遭受众人嘲笑蔑视的事情，有人公开鼓励欺负他们，在校墙报上刊登贬低谩骂的文章。另外这些被看作背离社会主义、假革命的学生被剥夺了和全校师生一起参加早点名的权利。早点名仪式上，全体同学要象征性地高呼“友谊”以表示团结，他们被排除在外了。这些对安格拉的打击一定很大，因为她的一贯宗旨是不要出圈儿。当问到她当年是否为此很伤心时，她说：“如果当年伤心过，现在也忘了。”

安格拉和她的同班同学

虽然在某些方面安格拉与滕普林的其他年轻人有所区别，但这决不意味着，在她的青少年时代，她是个不合群的人。各种聚会她都参加。八年级时，有一次她和同学在森林里吸烟被县农机企业的

师傅当场抓获，差点受到警告处分，烟是伊尔克搞来的。后来她也继续吸，某些同学至今觉得不可理解，“她不是道德的化身吗？”

她很喜欢组织人多的大活动，这是个例子，说明安格拉具有与其他人共同行动的能力。谈到学生时代她认为自己是个“头头”。有什么活动，总是由她来组织，做作业时总帮助别人。聚会上，无论什么题目都讨论得很坦率。另外她还和几个同学一起用帆船协会的一艘独桅纵帆船组织过几次去下勃兰登堡游湖，毕业后甚至去了整整一个星期。十年级以后她常出门旅行，背着行囊、帐篷，乘火车去过布拉格，布达佩斯，布加勒斯特，索非亚等地。成年后去过的地方更多，搭车去过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

在学校认识默克尔的人当中，没看出这个当时绰号叫“卡西”的她具有领导能力的大有人在。贝斯科就回忆不起她有特别的领导水平。默克尔后来的从政令滕普林的很多人大吃一惊。洛什克也是这么说的，“安格拉是个诚实的人，而政治遵循的是另外的规则。”安格拉乐于助人，谁学习上有问题，都可以去找她。她是个有头脑的人，学习上有了漏洞，马上会尽全力补上。她的宗旨是“什么都行！”她独立思考，但并不反叛，她虽不拘谨，但也不随便。她很少或几乎没有参加过学校以外的娱乐活动，没听说有过“夜间的冒险越轨行为”，她和另外三个女孩儿很要好，总在一起。

在学校同样成绩很好，而上大学后显然出于政治原因遇到困难。霍恩泽谈到默克尔时，说她一方面是个“乖女孩儿”，另一方面学习能力极强，老师教的根本满足不了她。伊尔克也强调，她从不出风头，她的领导能力是通过成绩、坦诚和乐于助人来体现的，以此团结了全班。他记得十二年级二班是个成绩很好的班，有三、四个学生以超优的成绩毕业，五到六个优秀。班里的气氛是很团结互助的。伊尔克这样分析自己的学生时代，在民主德国，人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点没有问题，老师来家访了，马上把电视从七台（西德电视台）换到五台（民主德国台）。宣传口号有口无心照着背，就像今天引用那些广告词。班上大多数同学都对民主德国的政治制度相当有看法。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矛盾、荒谬之中：某个德语老师说歌德的“浮士德”里面已经可以看到乌托邦社会主义了，遭到了学生们的反对。伊尔克还记得，安格拉有西边的亲戚，因此总穿着滑雪衫和牛仔裤，为此受到某些同学的嫉妒。对安格拉的努力精神，伊尔克至今很佩服：“不管把安格拉放在哪儿，她总要当第一名。如果是物理学家，她会争取拿诺贝尔奖。”但她还是比较内向的。安格拉的合作精神给伊尔克帮了很大的忙。例如他俩的比赛项目俄语，事先他们总是一起考虑下一节课会考那些知识，安格拉列出来，他背熟，果然就通过了，说起来伊尔克至今还很激动。他把他的这位女同学称为“尖子”，但没有架子。讨论时，她很重视让每个人都能把话说完，这样大家都有收获。伊尔克觉得，现在她的性格有变化，和老同学保持一定距离了。他记得转折之后的一次私人聚会上，有人讲科尔（总理）的笑话，她的反应就不太对头。默克尔从来都不愿多暴露自己，她加入基民盟是他没想到的。“我觉得她应该比我左一点。”现任社民党县长如是说。另一个同学贝恩特·比尔鲍姆说，任何时候她都以长远眼光分析政治形势，在班上她很积极，想改变些什么。她很乐意和人讨论问题。特别是在国民教育课上，这是教育青年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课程，她能表明自己的立场，比别人敢说。

看来对默克尔的社会形象和在学校时表现出的领导能力说法不一。也许这和她一个特点有关，据她自己说，她从小就是这样，“用脑子指挥”。上学时，要从三米跳台跳到水里，她需要 45 分钟的准备时间，铃声响了她才跳。“我想，在决定性的时刻我还是勇敢的，但我需要较长时间的准备，总是尽可能事先考虑周全。即兴的勇敢我没有。”这是她自己说的。她总是要事先知道，等待着她的是什么。生活有序，避免混乱对她很重要，一旦决定，决不反悔。这故事不是很有趣吗？铃一响，默克尔就跳，可事先犹豫了很久，换句话说，她是该出手时就出手。

保持距离的父亲

“我坦率地告诉大家，假如没有我的父母和在滕普林的家，我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不会这么顺利。一方面是像章鱼一样想彻底吞噬我们的民主德国制度，另一方面有自己的父母家。”虽然默克尔在公开讲话中对父母表示着感激之情，但她和父亲的关系还要全面来看。与这位对她要求极高

的父亲相处不容易。他的基本政治观点与基民盟联邦主席的观点相去甚远。卡斯讷属于推动统一社会党领导的国家垮台的人吗？埃佩尔曼认为，促使那个国家垮台的教会人士不到 100 个，卡斯讷不在其中。而理查德·施罗德则认为没有理由对此表示怀疑，施罗德是反对民主德国当局的牧师，当过最后一届人民议院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现任柏林洪堡大学神学教授。他说：“对我来说卡斯讷先生始终是个值得信任的人，他绝不是趋炎附势者。通过西方来的报告人和西方书籍，滕普林的牧师学院是我们了解西方的一个窗口。宗教神学报告也不是党的路线的翻版。”可以看出，对卡斯讷的评价褒贬不一。默克尔本人几乎不提及父亲而只谈母亲，总是有其原因的。原因大概在于，默克尔无意让卡斯讷在社会主义民主德国的真实作用大白于天下。对父亲的政治观点，如今她描述得比较缓和：“我父亲不是不欢迎德国的统一，但他觉得西部的制度也不是完全理想的。他对民主德国的看法比较平缓，不像我那样全部否定。”卡斯讷本人对采访中涉及父亲和牧师角色的问题几乎闭口不谈。

默克尔所说的父亲对民主德国的看法比较平缓，可以理解为，父亲曾经，至少是有时，表现得非常拥护民主德国，一段时间里甚至与国家安全部门有接触。不管怎么说，父亲卡斯讷与民主德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远比人们知道的密切。他不光是安全部门支持的白湖工作小组的普通成员，而且属于其领导圈子。1966 年 6 月 13 日卡斯讷写信给柏林-勃兰登堡州教会领导，对西柏林大主教库尔特·沙夫“致各位牧师、教会工作人员和教区委员会、教会组织的信”提出抗议。卡斯讷和另外两个署名者对大主教的信表示震惊，要求教会领导寻找今后阻止此类行为的可能性，要求把民主德国放到主教的管辖之外，反对大主教从西柏林对这里的教会指手画脚。这封信的真正背景是，民主德国当局没有能阻止沙夫的当选。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 1966 年 1 月 18 日有个决议，要与州教会的代表进行个别谈话，说服他们，在 2 月举行的柏林-勃兰登堡州教会代表大会上选雅可布当大主教。谈话显然对卡斯讷起了作用。雅可布是民主德国人。根据预先已知的人数分配情况，雅可布在 1966 年 2 月 13 至 17 日在东、西柏林分片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根本就没成为候选人，沙夫顺利当选。这成了 60 年代后期统一社会党教会政策最大的败笔。民主德国拒绝沙夫移居东柏林。卡斯讷和他宗教界的志同道合者在那次会议上是如何活动的，有统一社会党的记录为证。首先是洪堡大学神学教授、白湖小组领导米勒，“他在会上始终坚持国家的政策，协调为数不多的进步力量，反对大会领导压制讨论。教会律师克莱门斯·德梅齐埃和牧师卡斯讷也按照我们的方案行动”。“我们的方案”指什么是不言而喻的，显然不是教会的方案，而是民主德国国家的，民主德国宗教局的，更可怕的，是国家安全部的。

在宗教局发现的其他记录更严重。让历史学家瞠目的是，宗教局竟对教会内部的讨论和决定了如指掌。记录证明，从 1963 年开始宗教局以及统一社会党和安全部门非常了解勃兰登堡州教会代表会议的发展情况。到 1970 年 3 月民主德国宗教当局总结了取得的成果，“我们认为，进步的教会代表不仅从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有了更广泛的影响，通过米勒教授，克莱门斯·德梅齐埃律师，卡斯讷牧师以及青年牧师君特策略巧妙的工作，教会代表会议没有接受敌对方案而在民主德国境内教会独立性问题上做出了实质性的让步。”

根据这些材料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卡斯讷在柏林-勃兰登堡教会的分裂上是起了推波助澜作用的。认识他的人可能会对这个结论感到意外，他毕竟是教会的人。作为滕普林牧师学院的院长对外他必须有信誉，学院的活动也得有对当局持批评态度的牧师参加才行。卡斯讷为什么对教会的分裂这么积极，他是否受到安全部门胁迫而不得不这样做，这个问题在此找不到答案。

据滕普林地方报纸报道，在教会排名位居前列的卡斯讷在转折时期也发挥了突出的作用。政治家和滕普林居民的大型集会上，卡斯讷是幕后牵线人。他鼓励身边的人接受新的政治挑战。舍恩纳希说，是卡斯讷在 1989 年秋动员他加入社民党的。在歌德学校大礼堂的一次聚会上，舍恩纳希认识到，新论坛 1 担负不起什么政治责任，而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时期必须有人负起责任才行。新论坛只知道它不要什么（比如不要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不要国家安全部），而社民党很具体地知道，他们积极需要的是什么（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议会制度）。卡斯讷也鼓励另一些人加入基民盟。贝斯科回忆说，转折时期他以为卡斯讷是新论坛的人，还记得他号召滕普林人加入新成立党派的情景。

卡斯讷有点像民主德国版的理查德·冯·魏茨泽克¹和勃兰登堡教会的长老。令他的某些同僚感到意外的是，转折时期过后他没有像很多牧师那样参与某一个政党。他自己也喜欢说，他曾鼓励周围的人意识到肩上的责任。他的夫人是滕普林社民党内的积极分子，女儿先是在“民主觉醒”²工作。假如卡斯讷德国统一后从政，他不是得面对他过去在州教会所起作用的质询吗？他把自己描画成一个退休牧师，一个反贪婪布道者的形象，这不全面。如今卡斯讷在竭尽全力为保护老普拉赫特的绿色乡间教堂奔走呼号。另外他也声援1992年形成的群众抗议运动“自由原野”，他们要阻止联邦军队继续使用原苏联红军留下的一大片演习场地。2004年5月他发表讲话反对在哈斯雷本建猪饲料厂。他号召回归文化和宗教的根本传统价值观，以前人们对牲畜不是肆意屠宰的，食肉也有限度。他反对不道德的交易，“一切向钱看，生产者只追求利润，多挣钱，消费者不看需要只想买得便宜买得多。让人们的思想只跟着市场经济转，不独立思考。把一切都变成了市场，包括大自然，不用有道德顾虑。”

下面这段话可以看出他的根本政治观点：女儿成为联邦内阁成员的第二年，父亲在教会报纸上发表了一篇特约评论文章，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对当时联邦政府政策的否定。以下是摘录：“作为加入者我们使用的是联邦德国原来的宪法，不可能有新的文本，最多做一点修改补充。可它并不是最佳的自由民主制度。我们从国家政党的专制下解放出来，期望的本是民主崛起，得到的却是政党国家，宪法规定了‘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但却回不到人民那里。我们看到，国家成了各党的战利品，成了政治家的自选商店。联邦德国两大政党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它与民主德国一党制的不同只是有多个党，舒适地按比例分配席位，结党营私成了制度，互相帮助，尽得好处。”

1994年9月4日在“自由原野”的一次步行抗议活动中，卡斯讷在采希林教堂里讲话，“为了世界未来的和平我们不需要炸弹，需要面包。这一片荒原实在太宝贵了，我们不能让它变成投试炸弹的目标。那些政治负责人为什么认识不到呢？”说这话时女儿安格拉早已是科尔政府成员了。接下去的用词更有意思，“如今做政治决定需要高度的智慧，而政治家一般来说却不具备。他们越来越目光短浅，他们更多的是行动者而不是思想家。眼睛只盯着权利，怎么上台掌权，怎么留在台上不交权。像吕尔¹这样一个中学教师出身的人，几乎不用指望他用长远眼光看问题。”

另一方面卡斯讷对女儿的成就以及自己为此做出贡献的自豪之情也时有流露。父亲似乎在女儿的讲话中认出了自己的手笔。2000年11月基民盟主席参加了滕普林温泉游泳馆的揭幕仪式。父亲评论说，“看得出来，安格拉不是腹中空的人，她讲起话来就是跟其他人不一样。”只有为自己的孩子感到骄傲的父亲才会这样说，他的三个孩子都能奋斗，很成功。现在卡斯讷对评论女儿参与的那些政治活动很克制，甚至克制到连基民盟为默克尔50周岁举行的生日庆祝都不出席，他的夫人和别的孩子都参加了。

和蔼可亲的母亲

采访中默克尔一再提到母亲。了解母亲的某些人认为，当时的环境情况，包括父亲的主导地位都使她觉得受压抑。由于一直不能正式工作，母亲感觉自己只是一个家庭妇女。卡斯讷夫人对民主德国时期的生活状况始终不满意这点，可以从她转折时期以后的行为中看出来。与丈夫相反，1989年以后她开始了积极的政治活动。2000年她说，“几十年都不能做什么，转折以后我就想有所作为。”她加入了社民党。但那里似乎也不是她真正的归宿。她曾对基民盟滕普林主席、女儿从前的数学老师贝斯科说，别人称她“同志”她觉得很别扭。很多新加入社民党的民主德国人对此都有同感，并且至今不喜欢，因为“同志”一词在民主德国被用滥了。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卡斯讷夫人对唱党歌和工人歌曲也不太习惯。她之所以没有加入基民盟大概与在民主德国这个党是和统一社会党结盟的有关。那时每年的“五·一”和国庆滕普林的基民盟主席都站在主席台上。1989年10月7日他还在市府广场上发表与西方帝国主义作斗争的讲话呢。滕普林现任基民盟主席贝斯科非常称赞卡斯讷夫人1993至98年任市会议员时的合作精神。市长舍恩纳西也对她赞不绝口，“她是最好的市议员，帮着出主意想办法，认真阅读所有文件。”岁数挺大还学会了用手提电脑的卡斯讷夫人显然跟她的议会党团有矛盾，对滕普林社民党内说话的口吻觉得反感，尤其是市议会主席和党主席之间，

两个人都想争权，大吵大闹。卡斯讷夫人如今在滕普林业余大学教英语。转折时期之后，在一个重要的地方问题上甚至出现过家庭分裂：卡斯讷先生是“别墅”青年之家促进协会的主席，他主张由地方政府来负担；市府委员卡斯讷夫人反对，市长也反对，他们主张独立经营，父母也要承担一部分义务。

1998 年卡斯讷夫人再次为社民党参选市议员，但没有选上。母女感情似乎没有受到政治活动的影响。女儿在私人谈话中常半开玩笑地提及母亲是社民党党员的事，采访和讲话里也不例外。2002 年联邦大选时，女儿到滕普林发表竞选演说，母亲作为普通听众站在老百姓当中，只是不清楚身处竞选战斗中的女儿是否知道这点。对于研究默克尔生平的记者来说，母女政治关系的故事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好材料。总的来说母亲不觉得大女儿的知名度是个负担，但每天在电视新闻里都看到自己的孩子总有一种比较奇怪的感觉。

安格拉的弟弟马库斯在民主德国时期就与反对派有接触，柏林墙倒塌后走的也是不同的道路。他是民权运动人士、现任基民盟联邦议员诺克小女儿的教父。马库斯一段时间里在波茨坦参加过联盟 90，到它准备与绿党合并的时候退了出来。妹妹伊蕾娜也加入过社民党。在莱比锡获得物理学博士的马库斯和他姐姐安格拉一样聪明和勤奋。柏林墙打开的时候他正在苏联。如今他是信息行业的企业家，在达姆施塔特工作。妹妹和他俩不一样，没上大学。姐妹俩非常知心，妹妹在柏林当理疗师。

总而言之，无论是跟父亲，尤其是跟母亲，还是跟弟弟妹妹，默克尔和他们的关系都不错。她的 50 岁生日是和家人、亲戚以及几个很要好的朋友一起庆祝的，既没有邀请政要名流，也没有举行大型庆典。民主德国时期业已存在的不同政治见解，比如在“工农的国家能否长久存在”问题上的分歧，到了联邦德国仍然继续着。所以默克尔才把同父母的关系形容成“亲近、友好、但也有一定距离”，这样的关系中每个家庭成员都有自己的生活空间。父母现在住在滕普林一个新建住宅区里，都还在忙着各自的事情，担任着名誉职务。卡斯讷家是个知识分子聚会的地方，来的人主要是医生和律师。

解析中学时代的安格拉·默克尔

严格地说，默克尔从未因是牧师的女儿而遇到过严重的麻烦。无疑这是父亲，说得客气一点，避免与民主德国国家发生任何冲突的结果。如今滕普林市长，比安格拉大三岁的舍恩纳希的命运就完全不同。1951 年生于牧师家庭的他受到了种种歧视。他不是少先队员，没有参加成人仪式，从不参加选举，没有被高中录取。服完兵役以后他在新勃兰登堡州当钳工帮工。成年后补学了高中课程，1975 年开始在德累斯顿学机械制造。1981 年来到滕普林，成了瓦尔德霍夫疗养院的院长，卡斯讷的邻居。那时安格拉已经不在父母家住了。了解默克尔的人认为，她的青年时代好像更多地受到了母亲的影响，而在政治上出道以后，就越来越像父亲了。

安格拉中学生时代的形象是多面的：一方面是有天赋，学习成绩突出，能融入集体，尽可能不引起忠于党的路线的老师们的注意，另一方面总是身着西边的衣服上学，因反社会主义文艺会演几乎被开除。这些表面的、细微的矛盾像一条红线贯穿着默克尔的整个青少年时代。问到她小时候的职业愿望时，她说做梦也没想过当政治家，她很愿意当老师。在另一处她又说，在民主德国牧师的女儿永远也当不了教师，所以她连试也没去试。又一次她说曾想过成为花样滑冰运动员，知道自己这方面特别不行，而那时就是想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继承父业当牧师，她不干，原因是什么她不说。她决定学自然科学，准确地说，学物理，到莱比锡去上大学。除了神学，要数自然科学是国家监督留有余地的领域。在那里她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生活阶段，远离父母和弟弟妹妹，远离中学同学和滕普林-下勃兰登堡的明珠。

尽管统一社会党统治机关无处不在，默克尔当年还是找到了逃离监督的避风港，当然在日常行动中，比如打电话时，脑子里时刻得有根弦。为躲避打击迫害而调整适应与个性发展的矛盾始终存在。出色的学习成绩，鼓励独立思考的家庭教育，准确把握发表个人看法时间、地点的分寸都帮了她的忙。小城滕普林深深地影响了默克尔的青少年时代，“那里的青年时代是田园诗般的”，邻居的

男孩凯尔纳这样说，回顾往事默克尔也说“是的，我有一个美好的童年，西方常常忽视这一点，民主德国的生活也不全是政治”。

第二章

除了柏林，莱比锡对安格拉来说像是通往世界的大门。1973 年高中毕业后，她开始在那儿上大学学物理。民主德国时期这个萨克森的大都市是离下勃兰登堡很遥远的地方了，遥远到远离故土和要求严格的父母，开始独立的生活。大学时代对人的一生影响至深，在默克尔也不例外。她找到了新的朋友圈，可以跟父母保持一定的距离，迫使自己自立。大学毕业前一年，1977 年安格拉·卡斯讷与她的第一个丈夫乌利希·默克尔结婚。

为什么学物理？

与滕普林的距离肯定是选择莱比锡的原因之一。当问到她是否是有意“脱离”父母时，她回答是，但更主要的是想离开小地方。在柏林上大学对她来说还是离家和滕普林太近了一点。通过博览会，莱比锡这个大学城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国际化的，至少是开放的氛围。到莱比锡学物理，这是每一个有天赋和雄心的物理大学生的愿望，莱大是名校，能到那里上大学，今后在自然科学上的发展就有了保障。虽然在高中的最后一年里上大学的地点和专业都已经决定，但莱大的学生指南中对学物理的申请者提出了如下要求，除了逻辑思维能力，还要有巧妙的实验能力，热爱自然科研工作，有钻研精神。此外申请者必须证明，有能力和愿意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有社会主义思想，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表现良好，基础知识全面并有牢固的政治知识。

安格拉为什么选了学物理呢？中学时代她最喜欢的课程是俄语和英语，对物理是又恨又爱，她说：“我对理论物理很感兴趣，很想弄明白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想知道制造出原子弹的罗伯特·奥本海默及其同事们都想些什么，还有很多。选择专业时还有一个起决定作用的是我被推荐了学物理，假如我想学心理学，肯定得不到推荐。”很长时间内她考虑过学医，最后决定学物理使她父母也颇感意外。虽然在民主德国很多牧师的孩子都子承父业，但她从未想过走父亲的道路。这是不是父亲的意愿呢？默克尔说，父母做的事情，她很尊敬，但自己一直就想从事一种“世俗”的职业。1991 年她对记者京特·高斯说，“为了能学想学的专业，我先利用了特定的适应方式。因为从我们认识的很多牧师家庭看到，他们的孩子要想上大学，最终只能选择学神学，而这是我从一开始就不愿意的。”

跟卡尔·马克思一起上大学

莱比锡大学是德国历史传统最悠久的大学之一，也是当时民主德国最大的大学。统一社会党对莱大的意识形态控制很严，党无处不在。这一点可以从与大学结构平行的党的组织结构上看起来。大学党委书记负责贯彻党的路线。后来的高教部长汉斯·约阿希姆·伯梅曾多年任莱大党委书记。另外各系除了系主任也都设有系党委书记。系主任由高教部长任命。很多学生都是党员，系里有党支部。还有作为党的“盾与剑”的国家安全部间接参与领导。校长身边有一位负责安全与秩序的第一副校长，他的上面还有安全事务专员。这位专员是国家安全部的人，这点，至少在教师圈内不是什么秘密。如今已很少读到对当时情况的描述了，大学网页上虽有一个很好的档案馆，但几乎找不到作为“工农大学”时的那段历史介绍。任职多年的那位传奇校长乔治·迈耶为统一社会党的意识形态统治起了不小的作用。大学很早就要求统一思想，步调一致。莱大当时是党性特别强的地方。1948 年，资产阶级学生在这里和在东部的其他大学遭到逮捕，首次自由选举产生的学生会主席沃尔夫冈·纳托内克就是其中之一。他被判强制劳教 25 年，1956 年被释放。尤其是 1951 年第二次院系调整以后，党的领导加强，高校管理更加集权化。要求分在固定班级中的在校大学生通过集体学习熟悉马列主义新人的形象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所有课程科目中马列主义都是必修课。按照统一社会党的意愿，民主德国的大学里不应该有意识形态的空白区，物理学当然不例外，其他学科如科学共产主义、哲学、历史、法律、经济还更要

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学校通过必修外语俄语与苏联教育体系更加贴近。1953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35周年之际莱大被命名为“卡尔·马克思大学”(1991年恢复了原名莱比锡大学)。莱大是“红色大学”的名称也出自对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的处理。1957年4月哲学所的一次会议上,布洛赫被打为“修正主义分子”。后来他和其他很多学者都去了西方,日耳曼学者汉斯·迈耶也是其中之一。1957年通过了一个“卡尔·马克思大学社会主义发展纲要”,从此统一社会党的影响更深了。

2009年莱比锡大学将庆祝建校600周年。庆典讲话中肯定会强调,曾命名为卡尔·马克思大学的莱大是从布拉格的卡尔大学分离出来的:1409年5月一大批德裔教师和学生在一场争辩之后迁到了莱比锡,“艺术系”即后来的哲学系首先开始上课。十五世纪莱大就有了物理学讲座。很多著名的物理学家曾在这里执教。其中最著名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维尔纳·海森贝格(他25岁就已经是正教授和理论物理学院院长),还有192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古斯塔夫·赫茨,1954年他以67岁的高龄从苏联回来,一直担任院长至1961年。二战中遭严重破坏的大学1946年2月重新开课。103个教学、科研机构中67个被彻底毁坏了,完好无损的只剩下14个,藏书被毁掉了70%。

安格拉来这里上大学之前五年,1968年5月23日,市议会决定新建一组大学校舍。这个决定成了一个特殊的政治事件,使很多人改变了对民主德国社会主义的看法,同年6月炸毁波茨坦军人教堂的情形亦如此。为建新校舍要把大学教堂炸掉。这座始建于1240年的多明我会修道院教堂在宗教改革后的1543年被莱比锡大学接收成为大学教堂,战争中它幸存下来,现在要炸毁它,在大学师生和全市人民心里遭到激烈反对。摧毁这一历史性建筑群的理由是,只有这样才能在这块地上建起新的校舍。决定作出后仅七天,1968年5月30日上午11时,炸药把教堂变成了一堆废墟。随后不久,战争中部分损坏的大学主楼也被炸毁了。在统一社会党的巨大压力下,校委会仅以一票弃权同意了这些计划。位于奥古斯都广场和大学路的新建筑群,包括主楼、大讲堂、教学楼、食堂和图书馆分部等在1973至1978年间陆续投入使用,这也正是默克尔在莱比锡学习的时间。

莱大有值得骄傲的历史,大量著名学者曾在这里执教,比如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巴赫,前面提到过的布洛赫、海森贝格、赫茨以及克洛普斯托克和莱辛¹。大学也提到自己著名的毕业生,例如文学家歌德,埃利希·凯斯特纳,哲学家莱普尼茨,阿诺德·格伦,神学家和农民起义领袖托马斯·门采尔,音乐家舒曼和瓦格纳。年轻一代的有名学生只提到了作家乌维·杨森和民社党主席洛塔·比斯基,基民盟主席安格拉·默克尔还没添上去。

社会主义大学的物理专业

在大学教安格拉物理学的教授们,重视的是专业知识而不是马列主义教条。物理专业在莱大的地位是首屈一指的。1930年出生的理论物理学家阿明·乌尔曼被同事和学生视为天才,这位世界名人同时也是人民议院的统一社会党议员。另一位领先人物是实验物理学家阿托尔·洛舍,他是统一社会党多年的党员,他的专业能力和水平享誉世界。教师中还有海森贝格和德拜的学生、实验物理学家维尔纳·霍尔茨穆勒,1952至1977他一直在莱比锡执教。

那些年每年在物理专业注册的学生平均有70到80人。跟联邦德国相比,这里的教学方式更中学化一些。两个学期以后有一个考试,凭这个成绩决定能否继续学习和获得奖学金。物理专业的基础课是两年,课程既包括专业知识也包括语言培训,以及体育和军训。社会政治基础知识,尤其是马列主义哲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基础课阶段要掌握的学习内容。后两年是专业课阶段,第四年的主要任务是撰写毕业论文。默克尔是在第五学年完成的论文。15到20个学生分成一个班,这个分班不是只存在一学年,而是贯穿整个大学期间。每个班有一致的课程表,有一名辅导员。除了其他工作,辅导员也负责组织青年团活动。每个大学生都是青年团员,不少人是德苏友协会员。上大学后,默克尔决定参加青年团的工作。完全不参与很难做到,青年团是大学生活的一部分。“上大学时我当过青年团文化委员,负责订戏票。”

每个系都有团的基层组织,全校有团委。各校团委组织的“大学生之夏”活动要求同学们做一些与学习原本无关的工作,假期里用10到14天时间完成一项社会公益劳动。默克尔也参加了。莱比锡大学的任务之一是修整莫里茨古堡,这是老城边上紧靠大学的一座古老、被掩埋的防御碉堡。

修复之后想作为大学生俱乐部用。多数学生当初都愿意参加这里的劳动，后来，古城墙内的这个俱乐部很受学生欢迎。默克尔记得，1973 到 1977 年间一直参加挖土，但是并不觉得有什么乐趣，因为总也看不出什么结果，没有想到真能成今天这个样子。1993 年默克尔对《莱比锡人民报》记者承认，“参加这样的挖掘也有有趣的地方，但最终让人觉得这是卖苦力。我们小组不算是特别卖力的，别的组织积极得多。”如今莫里茨古堡的酒馆和餐馆仍是大学生和年轻人周末喜欢聚集光顾的地方。只是很少有人知道，默克尔曾参加过这里的修复工作。

前面提到过，物理专业的学生也得学马列主义。谈起当年，大家都说那不过是些意识形态的空话，至少在物理系没什么人拿它当真。但从中可以看出，一个“非政治性”的专业也有在教学中提高思想教育影响的压力。民主德国的高等教育以及整个教育制度无疑是成功有效的，但洪堡科学自由的理想没有被发扬。中学式的管理和意识形态的教条是卡尔·马克思大学的标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有默克尔当年写的有关马列主义的文章。

[禁书网 大陆直连 https://goo.gl/C6xxGf](https://goo.gl/C6xxGf) 看 [禁书禁闻禁文禁网禁片禁歌禁曲](#)

比尔曼，昆策和大学生的一点点抗议

安格拉的大学时代，正是民主德国党和国家领导竭尽全力走独立的“社会主义民族”道路，反对一切统一理论的年月。1974 年 9 月 27 日昂纳克在人民议院提出了民主德国宪法修正案。新宪法于民主德国建国 25 周年时开始生效。根据第一条，民主德国是一个“工农的社会主义国家”，抛弃了老宪法中民主德国是“德意志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说法。民主德国成了“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族”，两德的所有共同点都被剔除了。贝歇尔作词的民主德国国歌中有发誓要祖国统一的词句，后来就只能演奏，不准唱歌词了。全德的象征性标志所剩无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统一社会党报《新德意志报》这个报纸名称最突出地反映了共产党作为德国统一先驱的那个时代。

赫尔辛基进程，对于所有对政治感兴趣的民主德国人来说，其重要性远超过对西德人。1973 年 7 月 3 日在赫尔辛基召开、有 33 个欧洲国家（除了阿尔巴尼亚）和美国、加拿大参加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给人们带来了很多希望。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在 1975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1 日的峰会后由 35 国首脑在芬兰首都签署，其中包括两个德国。赫尔穆特·施密特 1 和昂纳克见面的照片传遍了世界。这份不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意向性文件宣布了承认欧洲现有边界，和平解决争端和不干涉别国内政。赫尔辛基第三批一揽子文件据说在民主德国内部引发了激烈争论。文件规定了在人道主义方面和其他领域的合作，要求加强人员往来，信息和旅行自由以及青年和体育聚会。民主德国公民可以要求政府兑现他们承诺的东西。尤其是知识分子和教会，开始思考如何按照最后文件的精神改革民主德国的政策，增加社会自由。在原则上忠于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那里，统一社会党的日子也不好过了。很多人认识到，党中央那些顽固派根本没有改革的意愿。1971 年昂纳克替代乌布利希成为党的第一书记，1976 年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随更迭而来的内部能较为宽松自由的希望落空了。党内收得越来越紧。安格拉在莱比锡上大学期间，党就作了几件事来杀一儆百：

赖纳·昆策，这是默克尔最喜欢的作家，被开除了民主德国作家协会。这就意味着他的作品在民主德国遭禁。1933 年 8 月 16 日出生于埃尔茨山脉的无产阶级后代，1949 年加入统一社会党，先学新闻学，后任助教，1953 年发表第一首诗，第一部诗集《露水之鸟》发表后不久，博士论文即将完成前被迫离校。他的罪名是在大学生中鼓吹非政治化，同反革命有联系。后来多年他一直在一个重型机械厂当钳工。再后来成为自由作家。华约国家武力镇压“布拉格之春”之后他退了党。很多人都同情 1968 年被残酷镇压的“布拉格之春”，喜欢“人道的社会主义”。昆策的诗歌很多年只能在西德发表。1976 年 9 月他在法兰克福发表了讽刺性标题的“美好的岁月”短文，文中描写了民主德国青年人的日常生活，年轻人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内和青年团内的压抑经历。对失败的“布拉格之春”表示同情的昆策，在民主德国无法再待下去，1977 年春，他和全家离开了那里。

统一社会党领导对昆策感到恼火的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参加了抗议驱逐歌手沃尔夫·比尔曼。比尔曼 1936 年 11 月 15 日出生于汉堡，父亲是共产党抵抗运动成员，1943 年被杀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他本人于 1953 年迁居到民主德国，在洪堡大学学哲学和数学期间开始写诗和作曲。他和统一社会党当局越来越不对付，1965 年因“阶级背叛”和“有伤风化”被禁止演出和出版。1976 年 9

月，比尔曼在遭禁 11 年后在普伦茨劳的尼古拉教堂第一次公开演出。同年，当他去联邦德国巡演时，政治局决定开除比尔曼国籍，理由是他的敌对性表现取消了自己继续拥有民主德国国籍的基础。这一决定在民主德国内部引起了震惊：11 月 17 日 13 位著名的知识分子联名抗议开除比尔曼国籍一事。

大学时代发生的这件事对安格拉有震动，她是听比尔曼的音乐的。青年团动用了全部思想教育体系来解释比尔曼事件。1978 年是默克尔作毕业论文的时候，身为哲学家和反纳粹战士的罗伯特·哈维曼因是党内批评意见的领头人而遭软禁。同一年 8 月，鲁道夫·巴洛因“鼓动反对国家”罪被逮捕，巴洛在其在西方出版的《选择》一书中抨击了统一社会党的弱点。1979 年 10 月在一次普通大赦中巴洛被赶到了联邦德国。没有听说默克尔参加抗议活动。莱比锡的大学生中很少有在真正信任的人的圈子以外对上述事件提出批评的。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埃贡·克伦茨在向昂纳克报告大学的“有意挑衅和敌对活动”时提到了莱比锡的物理系学生某某，已被开除党籍，他试图为声援比尔曼收集签名，被立即制止。不管怎么说，莱比锡也有抗议的声音。克伦茨把学日耳曼文学的四年级学生费尔阿本特一句最富挑衅性的句子给昂纳克写了下来：“留在国内，拼命反抗。”

对莱比锡的大学生活，默克尔今天的描述是“以学习为主，基本无忧无虑的时光”。她合群，也喜欢旅行，常和她后来的丈夫，在平行班学物理的乌尔里希·默克尔一起出行。在物理学生交流项目中他们一起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他们一起参加聚会，一起跳舞。物理系每星期举行两次迪斯科舞会，到第二天上课时总是昏昏沉沉。如今在电视谈话节目中，默克尔很乐意谈她当年当调酒师积累的资本主义经验：在大学生俱乐部有一个临时吧台，她常站在那里调制“樱桃威士忌”，能挣不少钱。别人回忆应该是伏特加而不是威士忌，因为民主德国时期伏特加供应充足。她说调制鸡尾酒所需的配料是她自己白天乘电车找遍全城买来的。

安格拉也常常去参加大学生基督教会的活动。那时候去参加这种活动本身就是表明信仰。当大学生牧师问她是否愿意担任“学生联系人”1 时，她马上拒绝了。在作毕业论文期间，她认识了最要好的朋友埃里卡·洪池，她是学化学的，她们那种少有的深厚友谊持续至今。洪池说认识安格拉是她一生中遇到的最美好的事情之一。在自然科学系安格拉的同学大多数是男生。

第一次爱情与洗衣机

大学期间，安格拉·卡斯纳变成了安格拉·默克尔。民主德国人结婚比西德早。但安格拉的第一次婚姻只持续了四年，而她以前同学们的婚姻都经受住了各种危机的考验。1977 年，23 岁的她跟比自己大一岁的物理系学生乌尔里希·默克尔结了婚，乌尔里希来自弗戈兰，是工厂主的儿子。他俩是 1974 年认识的。结婚前一年他俩已经分到了一个小而简陋的住宅，虽然卫生间是和另外三家合用的，但这已是特别的优待了，小夫妻有两人的房间，其他学生都是四人一室呢。他们的房租是 20 东马克，生活靠的是每人每月 190 东马克的奖学金。

他们是在滕普林教堂举行的婚礼。仪式显得有点呆板。是安格拉坚持要去教堂，为了她乌尔里希也就答应了。新娘穿的是蓝颜色，她最喜欢的颜色。“我们想告诉亲友们，我们在 1977 年 9 月 3 日结婚了。”两个人用一张印有这句话的卡片通知了大家。家里的仪式是小范围的。头一天晚上在瓦尔德霍夫举行了“闹婚之夜”1，但并没有闹出什么响动。大约来了二十几个人，其中有安格拉的好朋友洪池和莱大同学莱因哈德·伍尔夫特。大家虽然带来了旧碗盘，可是在森林的湿地上摔起来就是不响。

大学毕业后默克尔夫妇搬到了市中心玛丽恩大街的一套小住房里，离柏林墙不远。“泪宫”剧场也在附近，那里是去西柏林的过境点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安格拉常在那里和汉堡来的亲戚告别。来往于东西柏林轻轨火车的隆隆声不绝于耳，像是在不断提醒着人们这个城市的分裂。默克尔夫妇不能去西柏林。乌尔里希回忆说：“没有安格拉为此特别难过的印象”。他自己的工作从洪堡大学调到了科学院的光学研究所，离他夫人上班的地方不远，她是物理所的。但两个人之间越来越疏远和陌生，“我前夫比较顾家。”这是安格拉现在比较谨慎的说法。总之夫人的单位物理所的研究旅行他不参加，据同事们回忆，她也没觉得缺少什么。

四年后，1981年婚姻破裂了，破裂得很突然，对乌尔里希来说显然有一点意外：“有一天她突然收拾起她的东西搬出去了。她自己跟自己商量好了就做出了决定。但最后我们还是和平地分了手。经济上我们两人都是独立的，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分，她拿去了洗衣机，我拿家具，其中有几件至今还保留着。”正式离婚是在1982年，他们没有孩子。离婚在无神论为主导的民主德国比较容易接受，因为结婚早，离婚也不奇怪。滕普林牧师家里对离婚肯定是不以为然的。已再婚并有了一个儿子的物理学家乌尔里希·默克尔如今在德累斯顿的半导体行业工作。谈到和第一个夫人共同度过的岁月，他始终评价积极：“能去的地方我们都去旅行了，常和朋友聚会，我们两人都喜欢大自然，常去远足，也去看电影、看话剧。我们俩都很重视和家庭的联系，所以常去看望双方的父母”。

安格拉·默克尔自己也说，民主德国的早婚和住房紧张有关，已婚的受优待。“很快结婚的背景是，只有结了婚才有可能两个人在同一个地方找到工作。”记者胡果·米勒-福格曾问到除了住房原因以外爱情在哪里，安格拉回答道：“我的前夫和我，我们当然是相爱了，我们也设想了共同的前程。但在民主德国就是这样，只有结了婚才有共同的住房和工作。这就缩短了成家决定中的考虑时间。说起自己的第一次婚姻我好像很无动于衷，原因也许在于当时我们不应该那么快结婚，而应该再等一等。”1991年在接受摄影师赫尔林德·克贝尔采访时，安格拉·默克尔甚至把第一次婚姻持续的时间缩短到了三年，当问到是否曾很相爱时，回答得很明确：“不是，我们之所以结婚，是因为大家都结婚了。这在今天听起来很愚蠢，但当时我确实没有以必需的认真来对待这件事。三年后我们分了手。是我搞错了。”安格拉·默克尔的前夫对她这些说法不无异议，他对《焦点》杂志记者科特克说：“这话很伤人，我对结婚是认真考虑过的。”“假如我们今天还在一起，我最多也就是她的保镖。”

反应速度

在莱比锡默克尔是个勤奋的学生。在实验物理方面成绩不怎么突出，她承认“做实验不是我的强项，焊接我有困难。我的线路板也总是有问题。”尽管如此她还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硕士论文是第五学年作的。物理学生必修的体育课是她的大痛苦，百米跑不得不补考，她估计是有人按错了秒表才得以通过的。

她的考试指导教授是莱因霍德·哈贝兰德，他有两个学术头衔，一是在科学院莱比锡分部工作，另一个是在莱比锡兼任任教物理。科学院莱比锡分部所在地在二战前和战争中曾是军火企业的场地，后来是几百名科学家工作的地方。哈贝兰德是联系科学院和大学的纽带。他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也承认这个信仰。他尽量使他的学生们能不受政治影响地学习。他的重才是出名的。默克尔的另一名指导教授是如今在莱比锡信息工程系执教的拉尔夫·戴尔。他比默克尔大12岁，1971年被迫离开大学，理由除了别的也包括抗议炸毁大学教堂。后来他到了科学院莱比锡放射研究所。他是个学术狂，执著的物理学家，致力于高科技与实用的结合。他的书虽然允许在国外出版，但他本人不能去西方国家。写给国外同行的信，比如写到美国去的，都必须经过研究所领导的写字台。对戴尔来说，像默克尔这样的考生是他与大学保持联系的好机会。默克尔去问他是否愿意担任指导的时候，他们并不认识，但他立刻就答应了。哈贝兰德和戴尔与默克尔一起讨论，把这份篇幅60页，有无数算式的论文题目定为《密介质中的双分子基本反应对反应速率的空间联合反应》。这篇论文一方面是在莱比锡大学物理系完成的，同时也是科学院放射研究所化学物理研究项目的一部分。

为准备论文，默克尔在科学院顶楼上布满管道而显得压抑的小屋里蹲了好几个月，小屋有一点好处，可以看得很远，看得到莱比锡。东南方向是树立在那里的人民战争纪念碑，纪念的是1813年10月16至19日联军打败拿破仑。默克尔在那些日子里经历了理论物理学家所需要的所有洗炼。借助数学公式来说明粒子间的相互关系，提出的命题是决定性的，要找出可能存在的错误，需要几周时间。她几乎是一个人呆在这里。现在这里属于“莱比锡科学园”的环境研究中心，拿奖学金的留学生在这里工作，他们不知道，现在那么有名的前辈曾在这里完成了她最初的学术论文。哈贝兰德给予论文的评分是“优秀”。默克尔感谢他给予的指导和承担的评判工作。论文由两位指导教授和默克尔共同署名，于1980年发表在美国的一份专业杂志《化学物理》上。哈贝兰德至今对当年

的学生评价很高，她那时大概是个很内向，甚至可以说腼腆的人，“从没有主动说过什么，只有问她才说”。毕业考试科目中有一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受欢迎的同学

戴尔至今仍很称赞当年的学生，说她很正直，自信，导师要求太高的时候也会提意见，有主见，不喜欢乱七八糟的生活方式。她会计划安排生活，对事情的内在关系比人们想像的要清楚得多，知道自己要什么，做什么。戴尔也常让默克尔一起参加学术以及其他问题的讨论。说到朋友圈子讨论政治问题的情形，戴尔就激动起来。他的朋友们都反对当时的制度，反对不自由，默克尔当年大概也是这样吧，但是他们没有明确的方案，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来替代共产党制度。当问到记忆中默克尔的“祖国”是哪一个时，戴尔说“我们必须在制度中生存，但保持人的本色”，“当时没有人谈到德国统一，更多的是谈社会主义根本思想。”总的来说，他朋友圈内的人是批评资本主义，要社会主义的，但要的是改革后的另一种社会主义。他们圈内的人都信不过阿登纳。戴尔不记得当年自己考生的政治观点和与参加讨论的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因此转折时期以后看到默克尔在基民盟的成功真是让他大跌眼镜。1995年当默克尔来为好朋友洪池设计的一条自行车道剪彩时，戴尔也在场，她一见到他，马上大声说“你可别也马上来指责我啊……”指的大概是她在科尔政府内已官至联邦部长了。莱比锡时代的某些朋友对默克尔所走的政治道路感到惊奇。如今戴尔认为，默克尔在基民盟能有这样的地位，真是够了不起的。再说，那些年里谁又能够想得到德国统一真的能成为现实呢？尽管有人一致拒绝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很多民主德国公民不知道替代这一制度的出路在那里。如今经常被默克尔引用的阿登纳，在民主德国的形象可不怎么样，连反对派圈子里都是如此，他对东德人的命运不太在意。伍尔夫特当年是戴尔的同事，他说的和戴尔一样，“统一”在他们当时的政治讨论中不是一个话题，“没有人想到德国会统一，我们已经准备在那个制度下老死了。”1948年出生的伍尔夫特如今谈到默克尔还是很激动，“安格拉爱好文学、文化、戏剧，读的书很多，由于家庭的关系她能得到难以得到的书。她是可以信任的。”伍尔夫特是民主德国制度的批评者，所以有一段时间他受处分被迫离开了大学，到工厂去劳动改造。后来才又继续物理学业。他是属于反对派学生圈子的。博士论文完成前夕，他被逮捕，但很快到了联邦德国，在柏林工大获得博士学位。他从西柏林给他从前的朋友们写信，也写给好朋友默克尔。那时她已被分配在科学院工作。来自“国家敌人”的信件对收信人来说有时会有麻烦。因此默克尔通过间接的途径告诉她的朋友，以后不要再寄信来了。伍尔夫特接受了意见。他们两个人肯定是相互很有好感的，柏林墙开放以后默克尔马上去西柏林看望了这个朋友。伍尔夫特今天对默克尔的评价是：“无论是文化上还是政治上，安格拉都非常开放。我们是一路人，都对民主德国的制度持怀疑、批评的态度。”

对自己的大学生活默克尔似乎没有太多的怀念。差不多有二百多名当年的物理系学生是“物理、地质学校友会”成员，很多是她的同学。默克尔不是会员，也不来参加聚会。

第三章 科学院里不抱幻想的年轻女科学家

“我马上就来，你让我再在这里安安静静地站一会儿。”这是1998年默克尔对一位工作人员说的，说这话时，当时的联邦环保部部长正望着一大堆建筑垃圾。这里曾是她的“老排房”，物理化学中心研究所，214号办公楼。直到1990年，她在这里工作了12年。科学院是所有研究所的上级组织，根据统一条约第38条第二和第三款将在1991年12月31日被清理接管。后来身为民主德国政府副发言人的默克尔负责向媒体解释统一条约，她自己很早就知道接管给这些名噪一时的科研机构带来的后果将是什么，所以及时地进入了政界。她从前的很多同事都成了失业者。有一些，比如她现在的丈夫，能够在当今学术界站住脚。

1998年默克尔和记者一起第一次回到自己原来工作的地方，也是为柏林-阿德勒斯霍夫这个地方成为科技和经济投资地做宣传。好多年她每天清晨从家坐轻轨车到阿德勒斯霍夫站，从那里沿鲁多大道步行到办公室。“早上上班的时间是七点一刻。对基础研究来说这个时间其实太早，这个钟点人还没有接受能力呢”，这位部长这么说。至今她仍保持着早早开始工作的习惯，让某些要采访她的记者叫苦连天。

在 12 年的职业生涯中，默克尔始终是个小小的学者，看不到什么前程。获得博士学位后很久工资才长到 1012 马克。高级鞋店里一双鞋就要 320 马克，一件大衣 400 马克，那点工资干不了什么。但房租非常便宜。在同事和朋友圈子里默克尔虽然是得到承认的，但没有人看出她有领导能力。她在青年团担任过一点领导职务，但她不是党员。假如没有德国统一，她会不会至今还在科学院埋头搞科研呢？“这里的时钟走得比别的地方慢，窗前的灌木忘记了季节，还挂着冬天的果实。”柏林歌剧院总经理米歇尔·辛德赫尔姆在他的小说体传记《罗伯特游记》中这样回忆道，他和默克尔作过一段时间的同事。他对科学院的气氛写得很不客气：“几个星期就足以让人看清楚，这个研究所以及整个科学院的科研工作沉闷乏味的。我们挤在一块大科研场地边上的小平房里，从外面看像是传达室。窗外长着黑刺李，房间总是显得很暗。城市野兔和受冷落的科学泰斗们在长满荒草的路上相遇。”默克尔在书中（化名蕾纳特）只是被一带而过，“和我同一办公室的蕾纳特是不抱幻想的年轻科学家的楷模。几年了，她慢慢地做着她的博士，只在骑上自行车去勃兰登堡漫游时她才焕发出一点朝气。”

被安全部门看中

科学院不是默克尔的第一选择，毕业后她原想去图林根地区的伊尔梅瑙工业大学当助教。她和第一个丈夫一起前去应聘。应聘谈话中得知，自己的“干部档案”已经在那里了，里面记得清清楚楚，“我多长时间听一次西方的广播，什么时候换了新的牛仔裤，全是同学探听报告的”，默克尔气得够呛。这次发人深省的谈话后，她去会计室报销旅费，路上被安全部的两个工作人员拦住，直截了当地问她是否愿意参与工作。她当场就拒绝了。对此，她今天的说法是，“我从父母那里学到，对安全部的人要说，无法保守秘密。所以当时我就说，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闭口不谈，我肯定忍不住会告诉我丈夫。”但默克尔不准他人阅读她的安全部档案，所以无法为她所描述的拒绝合作提供文件证明。伊尔梅瑙的职位没得到，在科学院她遇到了赫尔穆特·哈贝兰德，莱比锡大学教授赖因霍尔德·哈贝兰德的弟弟。科学院是“资产阶级”科学家的避风港吗？

由德国科学院而来的民主德国科学院把自己看作 1701 年莱普尼茨创建的勃兰登堡选帝侯科学院的继承者。民主德国科学院在整个科研机构中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和社会科学领域里统一社会党中央的社会科学院相提并论。两院塑造了民主德国的科学研究体系，尽管科学院当年的某些成员强调，科学院是国家机构，不直属党中央领导。1968~1969 年第三次高校改革以后科学院变成了中央科研机构，更接近苏联的模式。它包括 60 个研究所，25000 名工作人员，分布在民主德国各地。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自然和技术科学的基础研究，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人员只占总数的十分之一。科学院隶属于部长会议。在统一社会党的内部文件中可以看到，党想要加强意识形态监督，尤其是在建国初期，“资产阶级”科学家在科学院找到了一个避风港。党试图控制科研，每五年制定一个中央科研计划，须经党中央政治局批准。党的县、市领导富有特别的责任，与中央和各研究所的党委书记协调，保证中央科研计划的实施。党的影响也反映在干部政策上，这是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按照斯大林“干部决定一切”的宗旨，在所有关键职位上都必须保证党的绝对领导。在选拔接班人的时候，前面提到过的“干部档案”的作用非同一般，它跟随一个人一生，而本人是不能看的。各干部部门与国家安全部密切合作。

物理化学研究所 1968 年由三个所合并而成。第一任所长是沃尔夫冈·什尔莫，1985 到解散前夕由格哈特·奥尔曼领导，最后几个月到清理接管是默克尔的博士导师路茨·措里克负责。在化学科研领域一共有 3102 名工作人员，其中 1369 名科学家，共有九个研究所，默克尔工作的这个所有 643 名工作人员，其中 336 名科研人员，是九个所里最大的，分布在鲁多大道两边的多座建筑中，除了实验室、办公室以外还有一个理发室和一个按民主德国的标准来看货物丰富的食品店。

是叛逆者吗？

在教育 and 科学领域统一社会党尽可能加强控制，科学院也不例外。这些人的专业知识国家要用，但不允许他们接触大学生。统一社会党最怕的就是教育制度中有人煽动年轻一代起来造反。因此对

某些人来说，尤其是在那些远离政治的专业，去科学院比去大学容易一些。尽管如此还是只有所谓“储备干部”资格的人才能到科学院，可以指望他们对现行政治制度保持最基本的服从。科学院没有培训任务，不接触大学生，“在国家眼里，这样比较安全，叛逆思想不至于传播”，默克尔指出的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

默克尔的同代人都证实了她内心对统一社会党所持的保留态度。和西德一样，民主德国的绝大部分老百姓也相信在遥远未来的某一天会重新统一。这里所说的叛逆是第三者能明显看到的反抗，默克尔具备吗，哪怕是有限的一点点？大学期间她不时地去出席过大学生基督教会的活动，但是她的行为从未到让人觉得她到了反对派的程度。她拒绝担任大学生基督教会“受信任的人”，她莱比锡时代的好朋友伍尔夫特被驱逐到西方后，她不愿意收到他寄自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来信，她担心被怀疑与反对国家的敌对势力合作。与绝大多数同龄人一样，默克尔也很早就在父母的帮助下学会了一套表面上忠于民主德国的行为模式。加入少先队和青年团便是证明。默克尔也从未说过自己是民主德国制度的反抗者。她只想事业有成，尤其是向父亲证明，她是有这个能力的。异见人士在科学院受压制，民主德国制度的反对者在科学领域极不自由的人事政策下是没有前途的。

北约双重决议和“化利剑为犁头”

1978年默克尔到科学院工作时，两德关系开始紧张，民主德国的年轻一代越来越不平静。1979年12月12日北约通过追加军备决议，同年同月27日苏联进军阿富汗，1980~1981年波兰危机以及独立的团结工会运动和1980年美国、联邦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联合抵制莫斯科奥运会，这些都导致了东西方关系的极度紧张。1980年10月13日昂纳克在“格腊条件”中提出联邦德国承认民主德国国籍，两德变常驻代表处为大使馆，以易北河划界，解散位于萨尔茨吉特针对民主德国的中央调查局，新一轮两德冲突又起。社会主义制度在动摇的事实瞒不住民主德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华约国家经济停滞，民主德国供应短缺，对西方债务增长，莫斯科、柏林年龄老化的政治局已经没有积极执政的能力。所有这一切在青年团活动和默克尔的朋友圈子里都是讨论的题目。1982年青年团试图以文化会议的形式来安抚情绪，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情绪。1982年科尔当选为联邦德国总理之后，27岁的默克尔对民主德国的局势不再抱有幻想。她那一代的年轻基督徒在衣服上缝上了“化利剑为犁头”来反对日益升级的扩军备战。它成为80年代民主德国独立和平运动的象征。默克尔没有佩戴这个标志。紧张乎，平淡乎

科学院的工作与大的政治局势相比平淡得出奇。在中央物化研究所，默克尔先去的是措里克领导的理论化学领域，转折时期以后措里克在波茨坦大学担任这个学科的教授。获得博士学位后默克尔转到了海因里希·克里科斯基手下的分析化学的物理方法组。辛德赫尔姆作为同事出现在她生活中的时候，她已经平平淡淡地研究了好几年了。那是1983年，“安格拉和我之间的化学反应是很实际的，和化学、物理、数学都无关，她负责每天两次把用土耳其方式调制的咖啡摆到我桌上，我们便把电脑、孔带等都抛到一边，讨论起苏联改革的发展以及魏茨泽克纪念战争结束40周年的讲话，讲话是我们托人悄悄从西柏林弄来的。”

与辛德赫尔姆相反，默克尔留在了科学院。有着出逃计划的辛德赫尔姆在1986年放弃了学术道路，在哈茨山的一个小城市里成了家庭妇男和业余翻译，直到民主德国消亡。之后他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先在格腊和北豪森当剧院院长，接着到了巴塞尔。2005年4月辛德赫尔姆成了柏林歌剧院基金会的总经理，这里面包括柏林的三个剧院：菩提树下大街的国家歌剧院，德意志歌剧院和喜剧歌剧院。任命是由元老会通过的。2001年辛德赫尔姆曾为国家安全部的兼职工作人员一事被曝光，有260页的材料为证，材料中他的化名是“曼弗雷德·魏”，1984年3月15日年仅23岁的量子化学大学生在苏联的一个学生宿舍地下室，被两名安全部的军官胁迫为他们工作，威胁他的借口是安全部门掌握了他同西方情报机构有联系的事实。如今，辛德赫尔姆是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我是青年团员，没有什么反叛的表现，政治上并不引人注目。对我这代人来说，伪装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在苏联不得偏离规定的路线”，这条指示他没有遵守，他和某些外国学生的友谊以及有一次和《时代》周刊记者共进晚餐引起了注意。回到柏林以后，他和领导他的军官见过几次面，但

没有发现他有出卖朋友的行为。他不是个好探子，报告上去的最多是些关于艺术、文化和民主德国日常忧愁的牢骚议论。参与秘密工作的事是辛德赫尔姆自己公布于众的，但在他的自传小说中没有提及。在暴露身份前一年，辛德赫尔姆还说过，安格拉和他都学会了与民主德国的制度保持距离，监控严的时候就伪装起来，没监控的时候就放下伪装，“我俩之间是没监控的”。一年后，当谈到他为安全部门所做的工作时，他说：“对安格拉和研究所的其他同事我没报告过一句。”

考虑过移居吗？

默克尔说，她曾想到过移居。她谈到所里的一个同事，波兰戒严期间，到那里去参加马列主义培训班，讨论中什么都说，结果回来之后吃不了兜着走。默克尔恰好没去参加这个班，她那几个月在布拉格。她说，“也许是布拉格之行挽救了我的博士学位。这样的局面真是让人觉得受不了。我一直都很理解那些想走掉的人，最终如何决定，和每个人的性格有关。失去理智、呆不下去的危险随时存在。提出移居申请对我来说始终是个精神上的紧急出口。”

出逃，离开民主德国，当然就做不成博士了。获得博士之后再走呢？走有三种可能的方式：一是逃离，像辛德赫尔姆提到过的，靠朋友帮助，经过匈牙利走，这是极其危险的，一旦失败就要准备坐几年牢；二是合法地提出移居申请，这意味着事业上的毁灭，遭受排挤刁难和忍受多年折磨人的等待；成千上万的民主德国人通过教会的途径被联邦德国“买出来”¹，在波恩的官方术语中称之为“联邦政府的特殊任务”。父亲跟国家以及教会领导层都有很好的关系，默克尔也许有望被买出来？问题是她愿意承受那种长时间的心灵折磨吗？第三种可能便是争取到一次合法的去西部旅行的机会，年轻人一般很少能有这种机会，而且得预计肯定返回才会获准。总而言之默克尔在转折前有过一次离开民主德国的机会。³²岁那年她获准去联邦德国，用民主德国官方的话说，去资本主义外国。她在汉堡的一个表妹1986年结婚，这是去西部私人旅行的一个好理由，研究所的干部部门就可以批准。婚礼后默克尔乘特快列车去博登湖地区，到康斯坦茨看望一个出逃了的同事，到卡尔斯鲁厄看望了一个教授。记得摇摇晃晃慢慢腾腾的民主德国火车的人，不会觉得意外，联邦铁路给默克尔的印象实在太好了。“我最震撼的经历是乘坐特快列车。这轮轨技术，我的老天，太棒了！”这么漂亮的火车，西边的学生穿着鞋上椅子，她很看不惯。在另一个德国访问期间她似乎有些不安全感，不像去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路上有点紧张，我不知道在西边妇女能不能一个人过夜，真的是很滑稽，我去过布达佩斯，莫斯科，列宁格勒，波兰，搭车穿越苏联，但是我不知道，在西边妇女能不能一个人在饭店过夜，这大概和我西边的侦探小说看多了有关。”虽然手里的西马克不多，但她还是享受了一下康斯坦茨的夏季大减价：用20马克买了一个旅行包，5马克一件的衬衫给丈夫买了两件和一件20马克的毛衣。对默克尔说来这就是所谓“金色的西方”了。她说，在康斯坦茨她很快就消除了偏见，“很多东西其实都很熟悉，西边的世界是可以把握的，这一点我的回答很肯定。”从那以后对她来说不存在任何疑问了，“假如可以选择，肯定是选择西边的制度。”接下来出人意料明确地说出了父母在这方面的观点：“对我来说无疑是西边的模式好，母亲也同样。父亲怎么看我不那么有把握，他对照搬西方是有保留的。”但默克尔还是回来了，回到了她的朋友中间，回到了科学院。

她是房屋抢占者¹吗？

在科学院很多人都有私人交往，遇到困难时相互帮助。1981年默克尔和丈夫分手，要找个临时住处时就是这样。当时东柏林的住房非常紧张。她先搬到了同事杨娜·格莱尔那儿。同事们在市中心离德国剧院不远的赖因哈德街上发现了一套空着的房子。国家房管局大概把它给忘了。安格拉的朋友们不由分说就把这套一室一厅的住宅撬开了，根本没去问房管局，去问是绝不会同意的。研究所里半个青年团的人一起为默克尔刷房装修。帮忙的人当中有伍尔利希·哈维曼，他是不同政见者罗伯特·哈维曼的继子，他给默克尔送来了书架、矮柜和窗帘。作为回报，默克尔有时去哈维曼家帮助照料孩子。房子都布置好了以后默克尔才去办手续。讲起这个“帽子戏法”的故事，比默克尔年长13岁的哈维曼总是喜形于色。略施小计（下班前几分钟进去），成功地在警察局报上了户口。

临时居所几乎已设备齐全，只缺一副灶台了。为了避免别人问起，老的灶台哪里去了，朋友们又生出一计：偷偷摸摸把别人扔到街上的一个灶台搬回来装上，第二天工人按计划来换新灶，就把旧的拉走了。父亲卡斯讷到女儿的临时住处来庆贺她 30 岁生日时，对这里的情景大吃一惊：“你还从没干过这种事呢！”后来默克尔自己申请到了一套住房。巧的是住的那条街叫滕普林大街，位于柏林的普伦茨劳贝尔格区。她之所以能得到那套新房子，是因为同事们出击抢占来的房子要拆掉重建了。

青年团与孤独

在科学院团龄可以保留到 30 岁，比别的地方时间长。只要入了团，一般都在团里呆到退团年龄。但不是所有人都一直积极活动到 30 岁。当年的所团委书记汉斯-约克·奥斯滕估计，30 岁以下年轻人当中大约 70%到 80%参加青年团活动。这是年轻人的合法组织，其代表在所领导面前有发言权。默克尔不是个普通团员，而是所团委成员。奥斯滕回忆不起她担任的具体职务了，只记得她是四到五人领导小组的成员，负责“学习年”活动，其中包括政治学习和马列主义学习。他记不清，但也不排除默克尔担任的是宣传委员。默克尔本人坚决否认这点，说自己从未宣传过什么，是文化委员。“我不打算在青年团里发展，决不要进入县团委或其他类似的机构。”如果从一开始在所里就有朋友，也许她根本不需要参加青年团的活动。默克尔说，“开始的时候我在科学院感觉很孤独，我和丈夫住在柏林墙附近，每天走过这条路觉得很压抑，和莱比锡的学生时代相比很不一样。某一天有人问我是否愿意参加所青年团的文化工作，至少可以和年轻人在一起，可以去看戏等等。”她只是负责订戏票和组织苏联青年作家朗读会、报告会等，对隐藏在字里行间对民主德国的批评内容，也很感兴趣。

默克尔到底是宣传委员还是文化委员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对青年团怎么看：如果把它视为在青年一代当中贯彻党的路线的工具，那么对任何积极的参与都要批判，无论是第一书记，还是宣传委员、文化委员或是别的什么；如果把青年团当作接触同龄人的场所而不是为党工作，就不存在什么政治问题，用现在的眼光看当然更不是问题。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青年团的那些同事都是默克尔的好朋友。他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抢占房屋就是最好的例子。在默克尔与第一个丈夫分手的困境中青年团给了她支持和帮助。这大概也是她 1991 年（那时的顾虑还比较少）在回答记者高斯提问时会这样说的原因，“我很喜欢青年团，”她还解释说，“在学习小组里，年轻人还开展了很多与那个制度和意识形态无关的活动。我承认，有 70%机会主义的成分在里边。”

博士论文

科学院虽不是教学单位，但也有两级博士学位授予权（A 授予博士学位，B 授予教授资格）。前面说过，阿德勒斯霍夫这里的科研工作进展缓慢，成果不大。默克尔做博士论文期间对此有亲身体会。当年科学院的专家估计，虽然有不少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在阿德勒斯霍夫工作，但民主德国在这个领域还是比美国至少落后 10 年，如果不是 15 年的话。西方的制裁政策，尤其是涉及计算机技术方面的，使民主德国的学者与西部的同行相比非常吃亏。计算中心只有一台“罗伯通”1 仿照 IBM 生产的计算机，还在用孔带操作。可怜科学家们，一个数据结果有时要等上好几天。默克尔在斯巴达克式简陋的斗室中孤独地为博士学位奋斗了好几年，论文的题目是《对由断裂引起的分解反应机制的研究，以及采用量子化学和统计学方法对此分解反应的速率常数的计算》，于 1986 年 1 月 8 日完成。她在前言中指出，碳水化合物在无氧高温下的转变目前和今后都具有重要的国民经济意义。撰写论文的过程中她一定多次心灰意冷过，单是数学的计算部分就够她戗，计算中心经常要好多天才能把所需数据吐出来。她的论文中很多地方靠数学假设，所以得不断检验数据的正确性。总是要等几天后才能知道一个假设是否成立、是否需要修改，可以想像这个研究过程是个什么样子。在论文末尾她感谢自己的导师在选题上给予的帮助和无数建设性的指导，同时感谢博尔格尔博士，克罗茨博士给予的启发和共同讨论，最后感谢绍尔博士阅读修改全文。这位约阿希姆·绍尔博士后来成了她的第二任丈夫。

按照规定，取得博士学位也得交一份学习马列主义的论文。默克尔文章的题目是《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据她自己说，这篇文章遭到很多批评，说她把农民写得太多，工人阶级写得

太少。如今这篇文章在科学院的档案中找不到了。她说当时打字的时候没有加复写纸，“我没有留底，要是有我马上交出来。可是我这么说有人立刻会怀疑是要遮掩什么。这是因为如今没有人能够想像，没有复印机，在一台老掉牙的打字机上打字是什么情景，放上蓝复写纸就会粘在一起。”

论文交上去之后还有口头答辩，科学院的所有工作人员自愿参加，谁都可以向考生提问题。答辩结束后大家喝点酒、咖啡，庆祝一下。有几个朋友专程从莱比锡赶来祝贺。有一张合影留下来做纪念，照片上默克尔坐在桌旁，右边是现任丈夫绍尔，左边是辛德赫尔姆。做完博士以后，默克尔似乎搞够了纯理论，她转到了克里科斯曼教授领导过的分析化学方法研究所。克里科斯曼退了党，80年代初被革了职，换了一位忠于党路线的人。默克尔所在那个处的处长是克劳斯·乌布利希，他是所里惟一个无党派处长。他是在默克尔获得博士学位后到处来应聘时才认识她的，至今他都很称赞默克尔的工作干劲儿：“看得出来她是能干事儿的，很执著，有明确的目标，有自己的主见。”也看出来她出身于牧师家庭，曾组织全处到滕普林郊游过。转折时期后这个处合并到了联邦材料检验局。“民主德国时期当物理学家的有趣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使我感到自豪，它和我在柏林墙倒塌后的生活完全不同。”

第四章 民主德国的崩溃，安格拉·默克尔的崛起

默克尔不是发起民主德国和平革命的早期积极分子。出乎大多数人意料的巨变发生后她才决定从政。大部分民权人士、早期革命家现在都销声匿迹了，只剩下基民盟的埃佩尔曼、维拉·伦茨费尔德、诺克和阿诺尔德·法茨，绿党的舒尔茨和社民党的民主德国前外长马库斯·梅可尔、施特凡·希尔斯贝格仍担任着联邦议员。政界职务最高的两个东德人——联邦议院议长蒂尔泽和默克尔，都是在民权人士冒着极大危险对独裁专制进行的斗争取得突破之后才进入政坛的。1989年圣诞节前夕，柏林墙打开六个星期以后，默克尔决定参加到“民主觉醒”的工作中去。“民主觉醒”是个民权运动组织，其代表人物包括埃佩尔曼、罗斯托克的律师沃尔夫冈·施努尔和弗里德里希·朔莱默尔。在此之前默克尔在私人圈子里表示过民主德国必须进行民主改革的主张，是众所周知的，比如1989年9月23日在滕普林牧师学院的讨论会上。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开放，是民主德国内部几个月，甚至是几年动荡斗争的结果。要想了解默克尔从政的动机和开始，必须大致勾画一下转折时期那几个月里惊心动魄的状况。

民主德国内部开始不安与动荡

民主德国的老大哥苏联在华约国家内越来越不能胜任领导地位。1985年3月，苏共三年内的第三个总书记去世，“葬礼外交”开始了。昂纳克与科尔在苏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契尔年科的葬礼上首次会面。两个人都向戈尔巴乔夫祝贺新职。虽然后来又经历了反复，但这一次两德的非正式峰会是两德关系改善的开始。1986年5月6日波恩和东柏林签订了一个文化协定，1986年10月6日萨尔路易斯和艾森许滕施塔特结成第一对两德友好城市。十年以前这两件事似乎是无望办成的。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民主德国有了较多的自主权。经济上民主德国越来越依赖联邦德国。1985年获得批准去西部旅行的在职民主德国公民是66000人，第二年上升到140万，民主德国政府把它看作给人民的一个出气口。实际上通过这样的旅行保持了民主德国老百姓当中要求统一的愿望。

另一方面，党和国家对经常是在教会庇护下不断形成的新的反对派活动进行了坚决制止。对内政策越来越强硬。1987年9月7日至11日民主德国国家主席昂纳克对联邦德国进行的正式工作访问也没有改变这一点。昂纳克认为通过访问中的红地毯和奏民主德国国歌便意味着国际法上对民主德国作为一个平等的德意志国家的承认。这次访问无疑是昂纳克政治生涯的顶峰。民主德国的经济问题导致人民生活还停留在70年代的水平，远远低于西德，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明显，大家寄希望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开放能带来新的动力。而统一社会党领导层内那些年龄老化的顽固派对苏联的改革越来越怀疑和看不惯。1987年11月，民主德国当局对柏林犹太教堂的环保图书馆采取了强硬措施，这里主要是一些环保积极分子在活动，他们出版了一份半合法的杂志，有一个藏书丰富、其中有不少禁书的图书馆。1988年1月在每年一次纪念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游行活动中，一些

示威者被逮捕。恰恰是写有卢森堡语录“异见人士的自由才是自由”的标语牌遭到警察禁止。光头党的出现标志着青年团工作的失败。

1989年5月7日的地方选举对党的领导是个特别的挑战，基层教会成员守候在多个投票点，仅在柏林就有127处，确认每处都有10%到20%的反对票。晚上在伊丽莎白教堂举行选举聚会，有基层教会成员和西方记者大约270多人参加，当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埃贡·克伦茨在夜间新闻节目中报出98.89%赞成票的官方结果时，场上爆发出一阵讥讽的笑声。

在这个背景下，1989年6月17日联邦议院的纪念活动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大会发言人艾哈德·埃普勒与统一社会党会谈多年。他认为，基于这个党的顽固僵化，现在是结束这种独家对话的时候了。他的发言之所以引发巨大反响，还有一个原因是它与社民党总理候选人奥斯卡·拉封丹的路线唱对台戏。拉封丹认为：“如果我们是在一个进程中来考虑问题而不是在终点站，许多东西都是不可预测的，包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前途。生活在那里的很多人都有一种‘民主德国意识’，一种有一点执拗的对这个贫穷弱小德国的归属感，他们很想把它建设好。假如我没有搞错的话，这种想法两年以前比现在强烈。但是希望国家改革而不是期盼它末日来临的人在民主德国可以说还是大多数。如果统一社会党继续像这几个月这样，无视现实、自以为是地走下去，今后的两年里，这个多数就要变成少数了。”事情的发展果真如此。民主德国公民申请移居的数字持续攀升；几千人分别逃入联邦德国驻东柏林、布达佩斯、布拉格和华沙的代表机构寻求庇护；莱比锡开始了定期的“星期一示威”；新的反对派组织不断成立，所有这一切都是对统一社会党政权越来越严峻的挑战。1989年9月30日外交部长根舍和总理府内政部长鲁道夫·赛特斯在联邦德国驻布拉格大使馆宣布，已和民主德国政府商定，滞留在里面的大约5000名民主德国公民可以移居联邦德国，从此民主德国大势已去，其速度之快是在此之前任何人都未曾料到的。

更为紧张的局面出现在1989年10月7日民主德国成立40周年的庆祝活动上。前一天已经出现了被警察驱散的游行示威。戈尔巴乔夫在他的贺词中强调，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逃避面临的深刻变革。青年团员们也都明显地朝着戈尔巴乔夫欢呼而不理会昂纳克。正是在这天，戈尔巴乔夫对昂纳克说了那句著名的话：“晚到者将受到生活的惩罚”。1989年10月24日昂纳克让位于克伦茨，但这一更迭已无济于事。克伦茨也是个强硬派，再加上选举舞弊，名声很差。

11月8日终于让素有“改革者”之称的德累斯顿专区书记汉斯·莫德罗当了总理。第二天晚上19点07分，政治局委员京特·沙波夫斯基宣布部长会议关于旅行的新规定，私人去国外旅行不再需要提供理由、证明。消息一公布，东柏林举城欢庆，当天夜里和接下来几天中成千上万群众自发涌向西柏林。虽然内部已经极其虚弱，但当时看民主德国国家政权似乎还有可能走回头路。真是一场和平革命吗？民主德国当局会不会发出血腥镇压的命令？还是悬念。科尔总理的安全顾问霍斯特·台尔契克的笔记中记录着：11月20日星期一，仅莱比锡就有25万人示威，哈勒5万，开姆尼茨4万，什未林1万，东柏林、德累斯顿、科特布斯都有好几万。与此同时，波恩方面知道了戈尔巴乔夫对事情失控的担忧。今天我们自然是清楚了，民主德国制度内部早已分崩离析，当局已经没有把握，人民军和警察是否会执行命令。苏联的坦克这一次是决不会出动的。

变革是由民权运动准备和推动的，其组织越来越严密，参加者越来越多。1989年9月9日成立了新论坛，民主德国内政部马上将其定为反国家组织。9月12日成立了“民主现在”，10月1日成立了“民主觉醒”，10月7日成立了东部社会民主党。

柏林墙倒塌时的默克尔

民权人士埃佩尔曼一听到沙波夫斯基宣布开墙，立即和青年牧师沃尔弗拉姆·胡尔泽曼一起赶到了城内边界：“我们不相信在电视中和广播里看到听到的消息，想亲眼证实一下。开着沃尔弗拉姆的车到了舍恩豪泽大街以后，我们下来跟着人流沿勃霍尔姆路朝柏林墙走去。到达边界时，那里已经有好几百人站在第一道栏杆前，有的甚至靠在上面。大家和边防军战士交谈着，尽量避免一切过激的言词。很快就看出，这些身穿军装、几十年来对自己国家的人民趾高气扬的大兵们，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从前的自以为是一扫而光。突然吊杆竖起，大家涌进了勃霍尔姆桥上的隔离带”。

住在柏林墙附近的默克尔在开墙这天做了些什么呢？她不是最早去穿越这道突然可以穿越的隔离墙的人。按惯例她先去洗桑拿。沙波夫斯基声明的影响她显然是清楚的，进桑拿室前，她给母亲打了电话，“我从电视里看了沙波夫斯基的新闻发布会，我们家里有个说法，‘柏林墙倒的那一天，我们去凯宾斯基饭店吃鲜蚝’，我对母亲说，这一天来了。然后像往常一样进了桑拿室。”现在她又补充说：“当时我没有马上看出来柏林墙在那天晚上就倒塌了，18点我和朋友一起进的桑拿室，到21点也还没耽误什么。只是没有像平时似的再喝一杯啤酒而是马上就出发了。”沙波夫斯基是19点07分宣布的，马上就上了电视，所以默克尔肯定是19点以后才进的桑拿室，她自己说的那个时间一定是记错了。21点以后她经勃霍尔姆边卡到了西柏林，想从那里的一个电话亭给汉堡的姨妈打电话。但没打成，一是没有找到电话亭，二来她也没有西马克。她和陌生人一起庆祝了一会儿，“不知什么时候我们突然到了一家快乐的西柏林人家里，我从那儿打了电话。后来还有人想去选帝侯大街，我就回家了，第二天还得早起上班呢”。带着责任心走向统一！再说“也太乱，对我来说已经走得够远的了”。第二天她和妹妹伊蕾娜一起逛了选帝侯大街。默克尔的某些朋友对走“第三条道路”希望之破灭相当沮丧，觉得这下就剩很快统一，西部来教训东部了。她对这样的想法不以为然。1989年11月13日默克尔去波兰出差，在那儿她惊异地听到“德国马上就会统一”的说法。她的波兰同行吃惊的是她怎么还来出差而不呆在紧张有趣的德国。他们还说，下次他们到柏林出差的时候，德国大概已经统一了。“这话让我吃惊，同时让我醒悟，我还没有想那么远”。科学院的其他同事也对波兰人的看法表示诧异。默克尔的看法是，“那些离事件距离较远的人看得比我们清楚”。假如说这是没有远见的话，请不要忘记，许多西德人那时也只把统一视为遥远未来的一件事。继续在莱比锡举行的星期一日游行中群众喊出的口号有了变化，从“我们是人民”变成了“我们是同一个人民”。在莱比锡的圣诞市场上有人开始为统一收集签名。

先找的社民党

默克尔在某个时刻决定从政。最早大概也是在12月下旬，她试着找到了“民主觉醒”。之前她说和她当时的领导乌布利希一起去找过各种党派和组织。“我们俩都对社民党感兴趣，因为它有个纲领”，乌布利希这样回忆道。乌布利希马上就加入了，1992年以来担任柏林克佩尼科区区长。他俩一起参加过社民党1989年12月14日在特雷普陀区皈依教堂举行的一次会议，并排坐着，默克尔觉得无法马上作决定，她还需要时间。科学院那些无党派的同事对乌布利希加入社民党直摇头，他们认为他的行为很可疑。几天后，默克尔问她的头儿，“我去民主觉醒那里怎么样？”他觉得默克尔这样问像是在解释她为什么没有加入社民党。乌布利希谈到了多元化和各党之间的竞争，说他会理解她的决定。后来她因要在“民主觉醒”那儿全职工作向他请事假。今天默克尔对那次社民党会议的看法是，“那里的一切似乎都已经很完美了，西部的一个基层支部帮助把一切都组织好了，大家相互称‘你’，高唱‘弟兄们，向着太阳，向着自由’，这不是我要的东西”。默克尔说的这些只适用于西边来的人，东部的社民党人都不习惯于“同志”的称呼，以及其他社民党的习俗套话。有的甚至拒绝党的代表色——红色。默克尔加入“民主觉醒”的日期在记者施托克写的默克尔传记中是1989年11月底12月初，应该是在她参加了社民党那次会议之后，圣诞节前夕了。相对来说那已经是没有什么危险的时候了。

何为“民主觉醒”

今天回过头来看“民主觉醒”成立的历史，不能不对在一个政府和国家安全部严密控制的社会里办成这件事的那些人肃然起敬。尽管受到重重阻挠，多个民主觉醒小组仍纷纷成立，到1989年10月1日这一天，来自全国各地的大约80名代表聚集一起，准备在柏林的萨马利特教堂召开成立大会。大批警察封锁了入口，埃佩尔曼在最后一刻成功地把准备好的秘密聚会地点——牧师家，写在小纸条上分发给了大家。安全人员随即跟踪上离开的人。17名代表在诺伊伯特住宅被封锁之前赶到了那里，其余的转移去了老潘克教区。诺伊伯特家的这一组在牧师潘科起草的一份号召书中号召成立“民主觉醒”。其政治路线在后来的几个月一直不甚明了，有时还矛盾百出。民主觉醒的

第一份文件提出的目标是自由，分权，国家非意识形态化，财产所有制多样化但同时坚持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特征。1989年10月30日的《临时纲领》中说“民主觉醒对现存社会主义制度的批评并不意味着拒绝社会主义的理想，我们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方案的争论。”10月29~30日召开的成立大会上，代表们通过了这份纲领，并一致同意，最迟到1990年5月1日把民主觉醒建设成一个政党。自然他们也被接连不断的政治事件催得加快了速度，1989年12月17日在莱比锡建了党。这是第一个召开代表大会、建党的反对派组织。

莱比锡党代会上通过的纲领除了要求国家与社会的民主化以外还有浓厚的生态环保特征，“我们主张高生态要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增加经济活力还要求对工业社会进行生态改造。这主要是“民主觉醒”当中左派的愿望，他们觉得应该忠实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财产所有制需要重新规定，不同的所有制应该平等共存。与《临时纲领》不同的是“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在党纲中没有出现。与其他民权组织不同的是，“民主觉醒”和东部社民党都把德国统一作为自己的目标，“德国问题不应只从内政和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而应该在欧洲范围内全面协调处理。德国的统一与欧洲的统一不相矛盾，两个进程是相互促进的。”“我们对德国的分裂是不甘心的。”“民主觉醒”认为，克服分裂的前提是承认现有边界，两德人民要有自决权，用和平协商的方式与邻国和战胜国共同决定。统一的途径是两德签订联邦国家同盟条约。“民主觉醒”主张不结盟和非军事化，如果统一完成，联邦德国应退出北约。这一要求在民主德国得到很多人的拥护。在这次党代会上，自由的中间派律师施奴尔被选为党主席，左翼代表索尼娅·施洛特比他略低几票当选为副主席。埃佩尔曼虽然一直担当着发言人的角色，但差几票没有正式当选，他被选为理事会成员。

“民主觉醒”拥护统一的路线引起了某些成员，尤其是朔莱默尔的不满，他无法接受向联邦政府靠拢的路线。他和其他一些左翼代表1990年1月2日决定退出“民主觉醒”加入社民党。另一个随后这样做的领导成员是埃尔富特的牧师埃德贝尔德·里希特。1月中旬，朔莱默尔说科尔的《十点计划》是“边界开放后最大的灾难，因为它增强的不是我们的自信，而是我们的无助”。几个星期里波恩方面似乎拿不出明确的方案，通过这个计划，科尔政府在德国统一问题上开始采取主动。计划的核心内容是在两德间建立邦联制。波恩也还没有准备马上实现完全统一。人民议院选举前，1990年2月10日，科尔已经在莫斯科得到了苏联对德国统一的认可。对科尔来说重要的是，1990年2月3~4日在戴维营与美国总统老布什会晤中得到了美国的支持，统一后的德国应该继续留在北约当中。这一条并不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波恩的外交部曾有过民主德国地区实现持久非军事化的计划。

总而言之，“民主觉醒”在很长时间里都不太清楚作为政党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是否应该以西德的某一个政党为榜样。基民盟/基社盟，社民党，和自民党都派重要人物出席了莱比锡的党代会。西德的各个党派都在争取“民主觉醒”。基民盟代表布吕姆的发言大受欢迎，相反绿党代表没讲几分钟就遭到一片嘘声。

默克尔的第一个政治决定

“民主觉醒”莱比锡首届党代会后，默克尔加入了这个年轻的政党。她是否正式填写过入党申请表不得而知。在那个动荡的岁月，这种形式上的东西也不那么重要。入党登记表几经调查也没找到。当年“民主觉醒”的积极分子，如今柏林议会基民盟议员阿佩尔特说，那些日子里，“大声宣布一下”就算入党了。默克尔入党时，“民主觉醒”何去何从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阿佩尔特属于比较早主张与西部基民盟结合的人。他还能回忆起默克尔来到普伦茨劳贝尔格基层小组，问能否旁听的情景。小组开会的地方叫“人民团结厅”，默克尔是一个人来的，阿佩尔特试着动员她，她同意了，说自己有时间，可以做点事情。当时“民主觉醒”内部还没有明确的分工，阿佩尔特在总部负责新闻工作。有一个手工业工人把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供“民主觉醒”使用。1989年底1990年初，党部搬到了弗里德里希大街的民主大楼内。阿佩尔特让默克尔撰写传单，在舍恩豪泽大街104号家里拟好稿子，带到办公室打印。她写的第一份传单是发给柏林的出租车司机的，他们是重要的消息传播者。当时“民主觉醒”还没有自己的报纸和其他可供使用的媒体。

谈起默克尔在“民主觉醒”时的工作热情，报业专家、后来《勃兰登堡-奥德报》发行人克劳斯·德杰至今仍赞不绝口，在办公地不可避免的混乱当中，“她是个少不了的人，走投无路时她总有办法，不起眼，但友善和蔼。”德杰属于转折时期积极推动东部民主政党建设和媒体工作的西德人。穿着随便，不赶时髦，在那些日子里总是身着一一条咖啡色灯芯绒裤子的默克尔给人的印象还像个大大学。她逐渐成长为“民主觉醒”的新闻发言人，这是当时的形势造成的，是党主席施奴尔个人的任命，并不是党理事会的决定。她从没有被正式任命为发言人，也不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民主觉醒”的创建人之一。在参与工作的最初几个月里，她只是个普通的工作人员，没有特别的表现和观点，当然对她也没有这样的要求和期许。当时莱法州 1 青年基民盟主席施特凡·施瓦茨是“民主觉醒”主席施奴尔的顾问，他说记不得默克尔当时真正起过什么作用，她自己的活儿干得不错，很认真，好合作，他甚至没有注意到，她是什么时候参加进来的。“民主觉醒”内部的派别斗争，默克尔似乎没有介入，最初的几个月里她也没有什么影响力。她系统地、一步一步地建立和巩固着自己在党里的地位。起初只是个普通的工作人员，通过在总部仔细认真的工作成了那里缺不了的人，然后慢慢进入了一个事实上的发言人角色，最后想成为理事会成员。

参加“民主觉醒”是默克尔第一个自主做出的政治决定，事前是否同父母，尤其是父亲讨论过，不得而知。和现任丈夫一定是谈过的，他们当时已经在一起了。“民主觉醒”的亲基民盟倾向是默克尔当时加入这个组织的原因，这种说法值得怀疑，她入党时党的方向还不明确。但“民主觉醒”确实是一个聚集了一批有头脑、有感召力的知识分子的政治组织。假如加入东部社民党，就不可逆转地决定了朝西部某个特定的党走去，而参加“民主觉醒”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问到她当时为何没有积极参加常常由教会保护的民权运动时，她说：“当时的很多聚会我都是在场的，但我跟他们不是一路人。拿和平运动来说吧，我理解每一个拒绝到人民军服兵役的人，但我不是和平主义者。再说切尔诺贝利事件，我不认为核能本身是罪魁祸首，我的结论是苏联应该建安全的核电站。”“那些人讨论问题的方式我也不喜欢，那里还有不少人不仅赞成巴洛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分析，而且赞同他的结论，这些人我觉得根本不行。我去只是为了表示对反对派的支持，但并不真正赞同那些内容”。“民主觉醒”看着还能干成点什么，“我想，这里我还可以做点贡献。另外我主张政党多元化，当时看着好像只有社民党能成为一个新的政党似的”。现有政党默克尔一律都不想考虑，新论坛搞的所谓基层民主程序她不喜欢，在“民主觉醒”那里“至少还有一点我对未来所设想的东西，那里聚集了不少知识分子，也有事情可做，比如我把西边来的电脑拆箱、安装起来。我在那儿认识了不少有意思的人，听过一些课。当时公开进行的理事会会议也去旁听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默克尔也清楚地认识到，统一会很快实现，货币联盟马上要实行了。

最后一届人民议院的竞选

为了给“民主觉醒”搞竞选，1990 年 2 月默克尔在科学院请假不再上班了。柏林市“民主觉醒”特雷普陀党代会决定让默克尔从 1990 年 1 月起任政治发言人。于是由她代表“民主觉醒”柏林市主席阿佩尔特和东部基民盟、西部基民盟以及德国社会同盟签署了一份《柏林联合声明》。很长时间“民主觉醒”在与西部政党的合作上迟疑不决。在革命和动荡的岁月里，“民主觉醒”的领导人过高估计了党在 1990 年 3 月 18 日人民议院选举中获胜的可能，有的人甚至估算能得到 20% 的选票，对主席施奴尔也传出了可能当总理的说法。因此他们也就没有利用和另外两个党（东部基民盟和在萨克森力量强大的德国社会同盟）的共同候选人名单。“民主觉醒”虽是“为了德国竞选同盟”成员，但它以独立的候选人名单参选。“为了德国竞选同盟”的诞生本身就是难产，是靠了基民盟总书记吕尔的努力才有可能，于 1990 年 2 月 5 日在科尔亲自参加下，经过几小时的争论好不容易在西柏林建立起来的。“民主觉醒”之所以不愿意加入共同候选人名单，因为那样一来就得跟东部基民盟，这个被斥责为统一社会党结盟党的组织签订一个固定的席位分配协议。这个协议会保证“民主觉醒”在人民议院得到事先商定的席位。事后看假如当时真那样做是明智的。对基民盟来说，“民主觉醒”和德国社会同盟的加盟很重要，这样东部基民盟的分量可以加强，过去与统一

社会党的关系问题可以淡化。选举结果表明，前民主德国人民大部分把票投给了积极推进统一的党，即科尔的党，而东部基民盟当时也已经被视为这样的一个党了。

选举前几天，“民主觉醒”主席施奴尔被揭露为前国家安全部的非正式工作人员，消息无异于一颗炸弹爆炸。罗斯托克的两名安全部工作人员以 10 万马克的高价把有关档案材料卖给了《图片报》资深记者彼得·布林克曼，《图片报》当时的副主编、后成为新闻电视台首席执行官的卡尔-海因茨·库洛是施奴尔的新闻顾问，他竟成功地说服《图片报》主编相信，那些材料不说明什么。库洛为什么要这样努力地为施奴尔掩饰，包括在基民盟的某些重要人物面前，至今是个谜团。施奴尔也一再成功地做到了把一段时间以来流传的有关谣言大事化小。《图片报》没做的事后来由《明镜》周刊做了，材料公布后，施奴尔承认了自己与安全部合作的事实。阿佩尔特和默克尔共同主持的新闻发布会上，“民主觉醒”理事会对此事表示震惊，党因此面临的整个困境也一目了然了。至今有些人还回忆得起，默克尔在那次新闻发布会上六神无主的样子。盼望“民主觉醒”有更大政治影响的梦想看似要破灭了：3 月 18 日的选举中，它只获得了 0.92% 的选票，不存在百分之五的限制条款 1，年轻的政党在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自由选举的民主德国议会中获得了四个席位。选举之夜，默克尔一定以为，她很快就得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去了。假如真是那样，她今天所说的，“一旦出现民主制度，就放弃原来的职业从政”的理想也就无从实现了。

沮丧的选举夜

“为了德国竞选同盟”在选举中获得的意外成功导致了默克尔在最短时间内的第一次政治升迁。在组阁过程中，默克尔没有受“民主觉醒”得票率低的影响被任命为政府副发言人。竞选同盟几乎获得绝对多数：基民盟 40.8%（163 个席位），德国社会同盟 6.3%（25 个席位）。社民党只获得了 21.9%（88 个席位），统一社会党的后续党民主社会主义党获得 16.4%（66 个席位）。进入人民议院的其他党派是自民党 5.3%，联盟 90 2.9%以及其他小党共获 25 个席位，绿党以 2% 的得票率获 8 个席位。

估计默克尔的政治世界在那个选举之夜挪了地方。她一定很快认识到，基民盟对自己今后的前途至关重要。“民主觉醒”在格拉夫斯瓦尔德大街的磨坊餐馆举行庆功会，她作为全职竞选工作人员和发言人是必须参加的。但之前她和德杰一起先去了人民议院所在地共和国宫，那里涌满了媒体和记者。他俩虽没有入场券，但也照样进去了，还看到了洛塔尔·德梅齐埃接受电视采访的情形。接着他俩还想去渔夫岛街的枫叶餐馆，真正的胜者基民盟在那里大庆胜利。德杰是个经验丰富的人，在人流如潮的拥挤中拽着默克尔的手往前走，但最终也未能到达活动地点。德杰的儿子和默克尔现在的丈夫也想去参加基民盟的选举庆祝会，但严格的封路措施把他们挡回去了。最后默克尔和德杰父子一起到了气氛极为忧伤的“民主觉醒”会场。夜深以后德梅齐埃也来了一下。尽管有德杰父子的描述，默克尔还是说选举之夜去了基民盟庆祝会场，在那里跟托马斯·德梅齐埃谈了很久，他是洛塔尔·德梅齐埃的堂兄和顾问，跟他说在新政府的政策中别忘了“民主觉醒”的贡献。默克尔自己的崛起是值得的吗？在那个选举之夜，她一定给自己提出过这个问题。行将消亡的民主德国的公关女士

选举结果在揭晓当夜就表明，民主德国新政府将由东部基民盟主席洛塔尔·德梅齐埃来领导。1989 年 11 月 18 日以来，他是总理莫德洛手下负责教会事务的副总理。当时和他一起搞竞选的人现在都说，他当总理是被迫的。这个感情细腻的中提琴手、职业律师不是当政治家的料。从一开始他就知道，和西部对手科尔合不来，两人太不一样了：一方是人高马大、掌权经验丰富、信仰天主教的法尔茨人，另一方是柔弱瘦小的律师、胡格诺家庭出身的基督徒，虽然庞大的家族中有不少人居住在西德，但他对很快统一还不能接受。他从没想过要当政治家。但他想有尊严地代表民主德国，成为民主德国利益的维护者。在其短暂的执政期内，德梅齐埃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尽管有人把民主德国政府形容成“一群外行”。

组阁谈判进行了几个星期，到 1990 年 4 月 11 日组成了新政府。政府第一次会议在 4 月 18~19 日召开，这是一个大联合政府，基民盟、德国社会同盟、民主崛起、自民党和社民党都参加了。德

梅齐埃坚持要社民党参政，并把几个关键职位给了他们：外交部长马库斯·梅可尔，财政部长瓦尔特·隆姆贝尔格，劳动与社会部长莱吉娜·希尔德勃兰特以及其他三个部长。8月28日社民党的这几个部长不顾议会党团主席里查德·施罗德的反对宣布退出政府，德梅齐埃只好自己兼任外交部长。总理府主任是克劳斯·莱辛巴赫（基民盟），副总理兼内政部长是彼得·米歇尔·迪斯特尔，他原来是属于德国社会同盟的，6月30日以后成为无党派人士。德国社会同盟的代表埃伯林出任经济合作部长。“民主觉醒”惟一个进入内阁的人是埃佩尔曼，民主德国最早的拒服兵役者，成了裁军与国防部长。他请埃贡·巴尔担任他的私人顾问，这是个有争议的决定。

由于没人料到组阁会是这样，所以事先也根本不存在重要职位的安排计划。据圈内人回忆，当时是把莫德罗政府各部门设置的图表铺开在地上，边查看边安排人选。人事安排根本没有可能认真斟酌决定，总之没有考虑过让默克尔来担任政府副发言人。而她又是怎么当上的呢？有人推测，父亲卡斯讷通过教会内的关系跟德梅齐埃打了招呼，为女儿说了好话。但同时也存在一个平行的“被发现过程”：德梅齐埃记得，埃佩尔曼找过他，对他说有个很好的发言人，还没有着落，指的是安格拉·默克尔。德梅齐埃从滕普林的一个熟人那里早听说过默克尔，知道她是一个“较左的牧师”的女儿。他委托来自西德的新闻顾问汉斯-克里斯蒂安·马斯见见默克尔。于是默克尔就在这时被马斯“发现”了。马斯当时是发展部长王尔克的发言人。德国统一是从民主德国逃亡的牧师之子马斯的心愿，所以他利用一切可能，积极推动民主德国的民主化进程，给德梅齐埃和“民主觉醒”当新闻顾问。他组织新闻学习班，陪同德梅齐埃出席竞选晚会。在西柏林的一次基础学习班上他注意到了默克尔。也许事情的过程是这样的：马斯把想让她做副发言人的想法告诉了默克尔，默克尔请埃佩尔曼去寻求德梅齐埃的支持。现任萨克森州内政部长托马斯·德梅齐埃是洛塔尔·德梅齐埃的堂弟，他回忆说曾即兴地提过让默克尔当发言人，理由是觉得她在“民主觉醒”做的新闻工作效果很好。德梅齐埃听从了他政府发言人格勒的劝告，不准备把副发言人的位子给社民党。因此在组阁谈判中，他正好可以提出，只得到一个部长职位的“民主觉醒”应该再获得一个重要的位置，而且得由一位女士来担任。把政府核心的这个位置再给基民盟显得不太合适，这一考虑对默克尔是很有利的。政府发言人格勒是默克尔的顶头上司。他也不是生来就知道有朝一日会当上民主德国最高新闻官的。他曾试图往俄国偷运《圣经》，有一段时间因此失业，后以当歌手勉强为生。各式各样的活动上他的吉他艺术得到了充分展示。他的专业是数据处理，后来在东部基民盟的《新时代》报找到了工作，这份报纸的发行量是12万份。那时正是开始转为电子排版的时候，所以他的专业知识派上了用场。开始不准他当编辑。1989年他认识了德梅齐埃。和默克尔谈话后他同意任用她。标着4月9日20点给格勒的一封信中有如下内容：“尊敬的格勒先生，经过考虑及征求主席意见，我很高兴并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政府副发言人的职务。”她还写道要去伦敦几天，几天后会来电话。主席指的是接任施奴尔的埃佩尔曼。

默克尔虽然有个震耳的头衔，但并不属于民主德国新总理的亲信。哪些人是日益衰落的民主德国政权的核心人物呢？除了总理府的第二号人物克劳斯·莱辛巴赫以外，必须要提到的是京特·克劳泽。他一方面是总理府的国务秘书，同时担任最大的执政议会党团——基民盟/民主觉醒议会党团主席（民主觉醒的四个议员加入了基民盟议会党团，名称由此而来），一个人身兼政府和立法机构两职是很少有的。在日常决策过程中，除了格勒以外，起重要作用的还有：总理办公室主任希尔维亚·舒尔茨，类似科尔身边的尤利阿娜·韦伯，只是舒尔茨更知识分子化一些；年纪尚轻、负责外交和安全事务的蒂洛·施坦因巴赫，他是学水利和建筑工程的，曾为教会和平活动工作，转折时期到了基民盟，引起了德梅齐埃的注意。他是五个司长之一。

有几个西德来的官员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表面上看不出来。萨克森州现任内政部长托马斯·德梅齐埃是其中之一。他是总理的堂弟，因此得到特别的信任。还有一个是汉斯·雷克斯，他是联邦总理府派来的司长，在那里负责行政管理和人事。如今他是德意志银行董事会成员。西德来的顾问中包括前面提到过的马斯，现在他在经济界做公关工作；还有洛塔尔·德梅齐埃的好朋友弗里茨·霍尔茨瓦特，他俩认识的过程很特别：当时德梅齐埃刚刚当选为东部基民盟主席，在波恩的政界，尤其是基民盟主席科尔那里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人。那时以及后来的一段时间里科尔始终避免与东部

基民盟，统一社会党的这个结盟党有任何接触。当德梅齐埃未经通报自行来到波恩基民盟总部时，敲开的是霍尔茨瓦特的门，霍尔茨瓦特那时是政治司的一个处长，当时那种棘手的形势，尤其是科尔的强硬态度，霍尔茨瓦特在不无个人风险的情况下帮助东部和西部的基民盟逐步建立起了联系，也因此赢得了后来民主德国总理的友谊。德梅齐埃与身边的几个亲信每日举行的“晨会”一般霍尔茨瓦特也是在场的。但是有一条西边来的官员都必须严格遵守的成文的规定，这就是他们不得抛头露面，以避免产生“波恩遥控”的印象。

《世界报》前驻民主德国记者德特勒夫·阿勒斯回顾默克尔在民主德国最后几个月的工作时写到：“作为发言人她是东柏林最佳和最方便的消息来源，有问必答，声音不高，准确、重点突出”。就连统一社会党中央报《新德意志报》也不吝赞誉之词，说默克尔聪慧、可靠，及时全面地向西方媒体通报情况是她的功劳。大家都说副发言人默克尔工作得很好，许多人还记得她身穿黑色百折裙、黑上衣和平跟凉鞋的样子。她很不在意穿着。德梅齐埃还记得有一次访问苏联时强迫她去穿象样的鞋和大衣。回顾默克尔的公关工作，德梅齐埃很称赞她的方式，“谁应该在媒体中占多少位置，她都能够把握得很准确。她预先就提出如何把复杂的政治决策过程传达给公众的问题，实际上也等于提出了行动建议。我原以为她是社民党的，左翼社会派，虽然是牧师的女儿，但没有给人特别虔诚的印象；更像个大学生，会开怀大笑，有即兴幽默感”。她的顶头上司格勒表扬她向记者通报情况的准确性。驻东柏林的记者斯洛克证实了这点，斯洛克当时是东柏林新闻发布会主席，她说默克尔的每个回答都很精确，事前认真研读过材料。

默克尔有时陪同德梅齐埃出访，这不是因为格勒害怕坐飞机。格勒说是出于同事间的合作与帮助有意把一些能出名、有影响的访问让给了默克尔。在这类访问中，默克尔能直接接触到总理。本来就喜欢旅行的她，尽管任务繁重，仍觉得出访中做新闻工作是种特殊的享受。她陪同总理去过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1990年5月16~17日），法国（1990年6月18~20日），伦敦（1990年6月26~27日）。出访的最高潮是去莫斯科参加四个战胜国和两德外长共同会议。德梅齐埃在社民党政治家梅可尔辞职后兼外长。9月12日的这次会议之后，德国统一道路上的最后障碍被清除了，对此后面还将细谈。始终陪同总理出访的还有办公室主任舒尔茨和外交政策顾问施坦因巴赫。

统一来得比预料的快

命中注定默克尔为最后一届民主德国政府工作的时间不会太长。这届政府本来是准备干几年的。1990年4月18日民主德国部长会议第一次开会的时候，没有人料到，10月3日就能庆祝德国的统一了。有人甚至还考虑设立民主德国总统一职，人选是当时的无党派人士、教会法学家施托尔帕，以此延续民主德国的寿命。但事情的发展超越了一切。

1990年4月25日就已经开始进行有关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月22日就德国国家主权统一的时间表达成一致，经济与货币同盟7月1日起生效。1990年7月26日联邦议院和人民议院德国统一委员会共同会议作出决议，于1990年12月2日举行第一次全德大选。经过艰苦谈判之后，朔伊伯勒和克劳泽于8月31日凌晨2点零8分在波恩完成了统一条约的文本，当天上午，两个政府批准了这一条约，接着双方谈判代表克劳泽和朔伊伯勒在这份有45条款、长达1000页的条约上签了字。安格拉·默克尔当时也在现场。

默克尔还是另一个历史事件的见证人。1990年9月12日“2 4”结束性会谈在莫斯科举行。兼任民主国外长的德梅齐埃至今很称赞自己当时的这位女随行人员。莫斯科会谈期间，默克尔出色的俄语发挥了优势。德梅齐埃很想知道当地老百姓对德国统一的看法，默克尔在莫斯科地铁里做了询问并报告给德梅齐埃，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戈尔巴乔夫正准备当二战的失败者”，“斯大林赢来的东西，戈尔巴乔夫正在丢掉”。根舍是带着一大批记者乘坐空中客车飞机抵达的，民主德国代表团坐的是小飞机，随行记者只有12名。《法兰克福汇报》常驻民主德国记者约翰内斯·莱特豪泽也在其中。他们下榻在以前属于苏共的“红十月”饭店。莱特豪泽还清晰地记得默克尔很照顾随行的记者，会谈前一天晚上跟他们一起去一家格鲁吉亚餐馆吃饭。由于民主德国代表团人数少，记者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所以默克尔把记者也算作代表团成员。这么一来，与西德的同行们相比，

他们就有了优势，可以直接进入会议厅，成为历史事件的见证人。根舍继续就德苏条约、经济问题和苏联驻军的问题进行着谈判。民主德国代表团没有再继续参加就返回了。

最高苏维埃 1991 年 3 月 4 日才批准了“24”条约以及德苏睦邻、伙伴合作条约。德苏关于苏联按计划撤军方式条约是 1991 年 4 月 2 日批准的。经常被遗忘的是，德国主权的真正恢复是在俄国军队 1994 年 8 月彻底撤出东德之后。

“民主觉醒”变成了基民盟

德梅齐埃政府上任之后，“民主觉醒”虽然继续存在，但活动基本停止了。最著名的领导人埃佩尔曼在 4 月 22 日什未林党代会上以绝对多数当选为施努尔的继任。身为裁军与国防部长的他工作繁重，无暇顾及党的活动。他在党代会上强调说，政府想创造奇迹，把这个世界上每平方米驻扎武器最多的国家变成一个和平的地方。党代会前的理事会上，默克尔声明，由于担任了政府副发言人职务，她无法再完成党的工作。党代会上她以 118 票的最高票当选为理事会成员。尽管“民主觉醒”的影响力在减弱，但默克尔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利用这个党，以某种方式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这一地位对其后来在联邦德国的发展至关重要。“民主觉醒”秘书长奥斯瓦尔德·乌茨克宣布，这不是一次听天由命的党代会，“民主觉醒”要扩大到统一德国的其他联邦州去，因此修改了党的章程。很快“民主觉醒”上层便清楚了，这个党已经失去了政治动力和政治基础。1990 年 5 月 13 日的理事会上，已在民主德国经济合作部任国务秘书的乌茨克建议让很多小的团体，包括德国社会同盟和“民主觉醒”联合。于是组成了一个小组，负责与不反对这样做的小党和团体协商谈判。默克尔也在这个小组里。5 月 28 日的理事会上又成立了专业工作小组，默克尔负责劳动与社会组。

6 月 30 日的理事与主要委员会会议上开始讨论到“民主觉醒”与基民盟合并的问题。埃佩尔曼在会上对与东部基民盟的合并表现得很不积极，他主张先与西部基民盟谈判，原则上是三方联合：西部基民盟、东部基民盟和“民主觉醒”。默克尔说会议记录中写着，柏林市党组主张与西部基民盟联合，但她显然说了之前先与东部基民盟合并。八个月的短暂历史之后，1990 年 8 月 4 日在东柏林的特别党代会上大多数代表同意与东部基民盟合并。对很多“民主觉醒”成员来说，这一来逾越了一个障碍，否则他们不能加入西德基民盟。因为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民主觉醒”只有事先与东部基民盟合并以后，才能在第一次全德基民盟党代会上加入基民盟。在全德基民盟内建立了一个“民主觉醒工作小组”，此外还确定了适当考虑“民主觉醒”成员进入党理事会和州与联邦议会议员候选人名单等条件。8 月 10 日接着举行了理事会，默克尔成功地使自己成为 10 月 1~2 日将在汉堡举行的全德基民盟联合党代会上三个代表候选人之一。在那次党代会上，她通过一个简短而巧妙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她自我介绍为“民主觉醒”的新闻发言人和德梅齐埃的部下，感谢联邦基民盟给予“民主觉醒”的大力帮助，表示“民主觉醒”将以工作小组的方式在基民盟内继续活动，保持与东欧政治伙伴的联系。她说：“我很高兴地期待着合作与走上共同的道路。”默克尔在联邦基民盟第 38 届党代会，同时也是全德基民盟首届党代会上的表现对她后来的升迁非常有利。

默克尔虽然成功地当上了全德基民盟党代会代表，但她想得到提名进入基民盟联邦理事会的努力却没有成功。从“民主觉醒”8 月 31 日主要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记录中看，有七个人对提名感兴趣，默克尔是其中之一，当时她已发出信号，表示有信心承担基民盟联邦级的工作。第一轮投票中她只得到 3 票，被淘汰了。经过三轮投票最后是萨克森的汉斯·盖斯勒战胜埃佩尔曼胜出。在联合党代会上，汉斯·盖斯勒也真的当选为基民盟联邦理事会成员。“民主觉醒”联邦干事长克劳斯·博克不久便关闭了位于弗里德里希大街 165 号的“民主觉醒”总部办公室。

基民盟现任主席是什么时候加入这个党的，至今不为人知。对默克尔进行了一次采访后，有个记者说她是 1990 年 8 月加入基民盟的。以本人提供的材料为基础编辑的联邦议员个人简历中只简略地写着：“1990 年 12 月起基民盟党员”。这条记录让人有点迷惑，1990 年 12 月是默克尔被选入联邦议员的时间。假如事实真是这样，就意味着 12 月 2 号大选前她当了几个月基民盟的候选人而还不是党员。现在正式的说法是，默克尔自 1990 年 10 月 1 日，联合党代会之日起是基民盟党员。显然在此之前她已经加入了东部基民盟，在 10 月 1~2 日汉堡党代会上的简短发言中她说“一年以

前的今天我还无法想像能成为东部基民盟成员，因为那时看不到独立政治活动的空间，同样无法想像成为西部基民盟成员，因为我怯懦地认为，柏林墙高不可攀，无法逾越。”

靠克劳泽和直选名单进入联邦议院

还在当政府副发言人的时候，默克尔就在考虑统一后自己的职业走向了。以前总理府的一个同事回忆说，别人的脑袋里还在忙于应付民主德国消亡的事情，默克尔已经在考虑自己的职业前途和政治前程了。1990年10月3日起默克尔就不再是政府副发言人了。但是跟其他很多人相反，她不必担心失业，她已经在联邦新闻局得到了一个副处长的位子。她的顶头上司格勒得到了一个处长级的职位。默克尔得到的这一保障要感谢早期的扶植者克劳泽。克劳泽在她的政治生涯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克劳泽和朔伊伯勒1990年8月31日谈判统一条约的时候，默克尔在那里协调新闻工作。

看起来克劳泽对默克尔的工作颇为满意。民主德国政府中这个颇有影响的人物1990年10月3日统一后用从前的国务秘书换到了联邦部长的职务。加上他，10月3日以后联邦政府增加了五名来自前民主德国的部长，他们是前总理德梅齐埃，前人民议院议长贝格曼-波尔（两人都属基民盟），赖纳·奥特莱普（自民党）和德国社会同盟的瓦尔特。到1990年12月2日第一次全德大选后产生新的联邦政府为止，他们负责代表前民主德国的利益。后来克劳泽当了联邦交通部长。在“转折巨人”当中克劳泽无疑是个悲剧式人物。《星期日法兰克福汇报》写道：“没有人像他这样升得这么高，跌得这么惨。”克劳泽1953年出生于哈勒，建筑工程学和信息学毕业后，1984年获得博士学位，1987年在维斯玛工业大学完成教授论文。他和朔伊伯勒很合得来。由于办事干练果断，他被看作来自民主德国的政治天才。他还是个出色的钢琴家和管风琴家。克劳泽说联邦总理科尔曾在一封给民主德国总理德梅齐埃的信中答应过，大选后由他领导设在柏林、负责东部新州的建设部。但这样一个横插进来的部，在统一后与联邦政府当时的结构配合不起来。当时更多强调的是每个部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都要负责好新州的事务。在此情形下，克劳泽也愿意担任交通部长，因为在高速公路上的大量投资正好是东部经济结构政策的一个良好工具。由于雇保姆和搬家漏税的丑闻1993年5月克劳泽辞去了部长职务。

还在担任特别任务部长的时候，克劳泽就已经带过来了一支民主德国人组成的队伍。默克尔得到了新闻局的这个职位，克劳泽想让她在新政府里继续为他搞新闻工作。默克尔则利用了在新新闻局的任职搞自己的联邦议员竞选。在这个过渡期内，除了竞选她还做了哪些工作没有记载。默克尔是身为政府官员、在有保障的情况下竞选联邦议员的，在大选前一天的星期五，她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她还特地到波恩找联邦新闻局的领导签订书面协定保证她的工作岗位。虽然她已稳稳地在基民盟梅前州1的直选名单上了，但她还是做到万无一失，避免一切风险。

默克尔在基民盟内迈出的第一步，克劳泽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他是联邦部长，又是基民盟前州主席。默克尔很早就看出，克劳泽将在科尔领导的统一后的德国政府内拥有重要地位。所以她也及时地请克劳泽帮助自己实现统一后的职业过渡。确实也是他帮助默克尔进入联邦议院的。在寻找选区的时候，他们俩的眼光都落到了施特拉尔松-吕根。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个选区里已经有了两个来自西德的候选人。

在新联邦州提名联邦议会候选人的时候，大家都还缺乏实行民主的经验。革命变革的时代导致在短时间内突然需要大量的人员参与各种政党的理事会、地方政府、市长或州议员的竞选，默克尔的选区亦如此。很多人的经历都不是连续的，就是说他们从前从事的是非政治性的职业，一天之内被逼上梁山毫无准备就担任上了一个职务。施特拉尔松的市长哈拉尔特·拉斯托夫卡也是这种情况，他本是民主德国铁路的蒸汽机车修理工。转折时期的紧张程度是如今难以想像的。很多的地方政治决策者几个月里都在超负荷地工作。这也是为什么联邦议院的候选人中没有当地人的原因之一。默克尔也不是那儿的人，虽然她的家乡是与最北边这个联邦州接壤的，但她毕竟不是梅前州人。

几个操作程序上的问题帮了克劳泽和默克尔在第一轮候选人提名时的忙。当地基民盟在联邦选举法方面的无知造成了很大的混乱。1990年9月16日要在施特拉尔松市政府召开基民盟267选区

联邦议员候选人提名大会。之前安排了三场分别在贝尔根/吕根、施特拉尔松和格林门举行的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会。当时只有两名来自西德的候选人。最先来探路的是联盟党议会党团工作人员克劳斯·赫尔曼。吕根基民盟提名的是奥尔登堡银行家汉斯-京特·策姆克。奥尔登堡和吕根是友城，所以策姆克和吕根有很多联系。在各基层组织派送参加选举会代表人数的问题上意见分歧很大，委员会进行了长时间的法律咨询，最后还求助于基民盟联邦总部。策姆克坚持要求无懈可击的合法程序，通过全体选民大会加以监督，大会将于9月27日在军事技术学校的军人之家召开。假如不是策姆克坚持在候选人提名大会前搞清有关法律问题，默克尔就不会在这个选区获提名。

到那个时候，默克尔的名字还根本没有被提及。克劳泽利用操作程序问题争取到的时间帮默克尔在格林门的州议员摩尔肯丁和其他人那里说好话。决定性大会召开前10天，默克尔的名字才出现。普罗拉这个地方是以“吕根的巨人”著称的：纳粹曾计划在此修建世界最大休闲地，沿普罗拉海湾有一块4.5公里长的地段，上面建有八座六层的楼房，每座长500米，民主德国时期作军事技术学校用。

普罗拉这天晚上的会议气氛非常紧张。格林门来的代表都被摩尔肯丁说服提默克尔的名，施特拉尔松来的显然是要提赫尔曼，而吕根人赞成的是策姆克。策姆克眼看就要成功了，第一轮投票的305张有效票中，他的得票率占45.9%，默克尔得到96票（31.5%），赫尔曼差得很远，只得了69票（22.6%）。按照这个结果，23点以后还得进行第二轮投票。会议地点在吕根，开始像是帮了吕根人的首选策姆克，但是在第二轮投票中却害了他。第二轮只有274张有效票，缺的那35张选票大概都是住在附近的吕根人，他们都回家去了。相反远道来的人得等大会结束后才有车来接。严格意义上说，策姆克是默克尔的第一个政治“牺牲品”。

在她上升的道路上，还有更多挡在道上的男士被清除。“我不赞成西德人代表新联邦州进议会”，回顾往事默克尔如是说。照这个说法，比登科普夫和福格尔任萨克森和图林根州长也应被阻止才对。在第二轮投票中，默克尔利用了德梅齐埃提出的要求，新的议会里要有1600万东德人的代表。1990年12月20日统一后的德国联邦议院在柏林的国会大厦组成的时候，她成为其中的一员。但是在这一天，她还没有料到，几个星期以后她将担任联邦妇女和青年部部长。

第五章 青云直上——联邦青年、妇女、环保部长

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从1989年12月加入“民主觉醒”，到取得基民盟联邦议院选区，最后一步登上联邦部长宝座，这一切只用了一年的时间。默克尔是如何引起科尔重视的？当时不断传来风声，民主德国人民议院主席及后来三个月的过渡部长贝格曼·波尔将重新就任联邦部长，但德梅齐埃劝科尔不要采纳这个建议。科尔也一直主张，联邦内阁应能充分反映地区政治，而一位来自东部地区又信仰基督教的年轻女性是最理想的人选。此外科尔希望身边有一个绝对服从和忠实于他的人。科尔与默克尔第一次相识并非完全偶然，而是默克尔安排的。柏林举行统一庆祝大会前夕，基民盟于1990年10月1日和2日在汉堡召开所谓“统一党代会”，党代会期间五个新州的代表团成员要像演戏一样，逐个向联邦基民盟提交加入基民盟的申请。默克尔作为“民主觉醒”三名代表中的一员，请求当时萨克森“民主觉醒”的同事及后来的萨克森社会部长汉斯·盖斯勒把她介绍给科尔，她的原话是：“你能把我介绍给科尔吗？”科尔由于早就关注基民盟在新联邦州的人事问题，所以认识汉斯·盖斯勒。

在党代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这位年轻的女政治家有了与联邦总理第一次会面的机会，当时在汉堡市政厅地下餐厅正举行新闻发布会。科尔与默克尔二人谈了相当长时间，这次谈话显然给科尔留下深刻印象，因为科尔邀请默克尔于1990年11月，即1990年12月2日第一次全德联邦选举之前，前往波恩联邦总理府。回忆起与科尔在波恩的第二次会面默克尔很平静地说：“我还记得，我到了波恩，先在科尔的秘书韦伯的办公室里等候，一直到被接见。我们聊了一些关于选举的事情，科尔显然对这次谈话很满意。”科尔在用人问题上从来不是头脑一热就决定的，他经过深思熟虑准

备把默克尔作为新发现的人选安排进下一届联邦内阁。但此时他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他要等审阅完默克尔在东德时期的国家全部档案后才能最后拍板。

最年轻的联邦部长

默克尔当时已经感觉到，一旦科尔再次当选是会启用她的。到了年底，特别是德梅齐埃和克劳泽与她谈了有关政治提拔问题后，这种感觉更明显了。这两个人都原则支持她进入内阁，尽管他们还不清楚默克尔将被安排什么职位。德梅齐埃在统一党代会后是科尔当党主席时的惟一副手，这就证明了他的特殊地位，至于他对科尔的实质性影响有多大暂且不谈，但科尔决不会让他的副手一无所知。《世界报》常驻东柏林记者阿勒斯当时就对默克尔当政府副发言人时的工作很欣赏，1990年12月底默克尔向他表露过自己的真实想法，她虽然比较肯定会在新一届政府内任职，但不知道具体担任什么职务。她曾多少有些幼稚地补充道，她对家庭、妇女等问题根本不感兴趣。幸好这位记者十分谨慎，没把默克尔的这些想法在公布她的任职前捅出去，因为她后来恰好担任这一领域的部长。默克尔没有表示任何犹豫就走马上任了：“事情的发生使人不知所措，根本没时间容你去仔细考虑这些问题。我自己清楚，这种安排是有道理的：女性，来自东部，又年轻，这些对我来说都不是什么损失。这个部的工作内容我过去确实很少接触，妇女和青年这类话题在统一时期不是我的主要兴趣。”

默克尔1991年1月18日宣誓就任联邦妇女与青年部部长，在她成为联邦基民盟党员只几个月后，她便在重新统一了的德国基民盟党内攀上她的政治高峰，这也得益于科尔赢得大选后在内阁中加大了妇女工作的力度。科尔解散了原来的青年、家庭、妇女和卫生部，又重新成立了三个部，即由格尔德·哈瑟费尔德(基社盟)领导的联邦卫生部，由哈内罗尔·瑞施(基民盟)领导的家庭与老年部，以及由联邦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女政治家默克尔担纲的妇女和青年部。媒体嘲讽地称这三个部为“三姑娘之家”。

科尔故意没有赋予新的妇女和青年部更多职能，他把一个处理“软性”政治问题的部交给来自德国东部的年轻女部长，为的是让她对承担更重要的任务作准备。科尔把默克尔所从事的部长工作解释为在艰苦的政治管理领域中学徒。至今默克尔都没改变当初的看法：“我认为这项任务为我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我可以逐渐进入工作角色，可以了解整个机制，同时又没有在重重困难中为某事而心力衰竭的风险。比如克劳泽，他失败的部分因素在于，他所在的交通部是一个庞大的机构，一个可以支配很多资金、同时又是院外人士游说的是非之地。”

作为内阁成员中惟一来自东部地区的女部长默克尔，仍要为得到周围人的承认而不断奋争。她被看作是波恩政治鲨鱼池里“科尔的小姑娘”。《斯图加特日报》形容默克尔“有时候目光显得疲倦，偏爱下摆过于宽大的裙子和花色土里土气的衬衫，不喜欢擦脂抹粉，这让善于观察人的男士很快得出‘灰耗子’的结论。”《法兰克福汇报》甚至评论她“一点没有部长的举止”，还发现“她在公共场合吸烟”！有人认为默克尔青云直上成为一部之长，这全是科尔对她的恩赐。为此默克尔十分恼火，尽管她这些年也很尊重科尔。她觉得科尔的鼎力提拔对她个人形象没有太大帮助，同时她的政治发展又受益于“大胖子”科尔（科尔在波恩时的绰号）的特殊保护和宠爱。她谈到：“客气地说，如果一个人总被看作是另一个人派生出来的身影，真够让人伤脑筋的。我必须从开始就为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而斗争，不是让科尔，而是让其他人这样看待我。从一开始起整个舆论就干扰着我。当时各个职位已经被占满，尽管很不合理，但要权衡的因素很多，如女性比例、基民盟内的左派、被科尔直接左右的人等等。我很想做些事情，但在我所处的位置上很难马上动手。对我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保护，但一想到这些不合理的安排就让我不舒服。”其实这位新人根本不用为不受外界关注而抱怨，光是她的生平就使她与其他新被提拔的人相比更引人注目。

波恩政界，莱茵地区，对于这位滕普林人及柏林选出来的女性就像“充满敌意的地方”，在这里她没有一点家乡的感觉。1991年6月她就说过：“有人说我在波恩的政治环境中没有在家的感觉，这种比喻太过分了。”1992年，她当部长的第二年，曾对一位陪同参加竞选活动的女记者说，从政的年代是最不容易找到朋友的年代：“我走过波恩城心里在想，如果我不再是部长，谁还会向我打招呼？”所以从一开始就显得“狂躁”，对所有人都态度苛刻：“突然有那么多人来找我，想

告诉我些什么，我无法判断这些人的真实想法。如果说我们在民主德国时期学到了一些东西，那就是对诚实有一种细微的感觉。我总是爱持怀疑态度，这一习惯对我在西部至今都有帮助。”但默克尔也为自己感到惊奇：“我突然与那些生平只在电视里才见到过的人坐在一张桌子旁”，之后她又鼓励自己：“你能解开数学中的整数，你就能和布吕姆谈话。”她很快发现，政治上的“大腕”也不过如此。她第一次接受采访时的表述方式颇引人注目，她谈到基民盟时爱用“它”，而不用“我们”，以对所谈内容保持一定距离，比如她说：“它需要像我这样的人。”

默克尔像所有新上任的部长一样，都希望本部具有实质性职能。她除了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之外，还有个人的意愿，就是有一天能够从科尔这位导师的影子里彻底走出来。当然在开始时她非常敬重科尔，她有时还效仿科尔的政治风格。在默克尔政治生涯开始时，许多人低估了她克服困难的毅力，而正是这一特性有助于她日后的发展。默克尔首先要在“她的家里”——各部部长都这样称呼他们各自所管辖的部——博得大家的尊重。她挑选基督教神学家彼得·辛茨担任她的议会国务秘书，辛茨曾是联邦民事管理专员，熟谙民事管理，而且他作为北威州1基民盟副主席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他经海纳·盖斯勒的介绍进入政界，并与聚斯穆特和布吕姆关系密切。

她任命维尔纳·科芮这位以勤奋和精通业务著称的官员为她本部的国务秘书，可惜他上任仅几个月就因癌症去世。默克尔又决定启用联邦内政部的副司长维利·豪斯曼作为新的国务秘书。默克尔在签署统一条约时认识了豪斯曼，从那时起默克尔就对他产生了信任，他后来成为联邦基民盟干事长也得益于这一信任。豪斯曼属于那类不惹人注意的国家公仆，他从不让自己聚焦在闪光灯下。他曾随当时内政部长维多德·哈尔德一同参加两德统一条约的签署，并负责新闻发布；默克尔则在民主德国一方负责新闻工作，是豪斯曼的同行。从事这项工作的西德官员得到明确指示，要特别照顾东德代表。每次在召开联邦新闻发布会之前酝酿发布内容时，豪斯曼总是请他后来的上司默克尔先发言，这样默克尔就可以首先阐明自己一方的态度，之后豪斯曼才作补充性发言。在记者招待会上他还会巧妙地避开一些很专业的、内容深奥的问题。默克尔十分欣赏豪斯曼的谦虚和不张扬的作风，所以他是默克尔的第一选择。默克尔知道，豪斯曼会成为自己身边一位极其忠实和守口如瓶的官员。

辛茨当了基民盟干事长后，来自吕登沙伊德的克内利亚·玉泽接替了他的职务，这位1961年出生的女子比默克尔年轻很多，两位女性勉强相处。她们分别属于两个女性世界，一个是穿拉格菲尔德时装、打扮入时的女郎，另一个是“宽上装、大裙子”不赶时髦的女人。默克尔从前的一位同事这样形容她，“别人肯定认为她想把自己藏在宽大的衣服里。”与她常打交道的“领导层”同事们都会发现，默克尔在衣着和外观上花费的精力是多么少。大家耐心劝说她要注意外表，作为公众人物，政治家的形象十分重要，但这些劝告都无济于事。她慢慢地才开始接受同事们让她改变发型的努力，有时她也被“拽到”波恩附近的特洛斯多夫去理发。她早上也曾长跑过，但这位年轻的女部长很快又停止了，因为她的工作日每天很早就开始，以致没有时间和精力为保持身体平衡去锻炼。

默克尔很快发现，部里有些官员懂得如何打发经常变动的部长，特别是会对付那些被分解的部委。她的前任是乌苏拉·玛利亚·雷尔和聚斯穆特，正由于默克尔的“姑娘”形象，她就更想得到大家的尊重，因此她马上从人事安排上入手。她上任几周后就撤换了曾经是前任部长雷尔的私人助理、后来当上部办公室主任的约阿希姆·维尔伯斯，此人十分熟悉本部情况，默克尔不愿意看到前任的心腹坐在自己办公室的前厅。默克尔和她从经济部调来的办公室主任雷斯根相处的时间较长，他在1994年大选后又随默克尔去了环保部。默克尔还很快换掉了私人助理卡塔琳娜·舍尔根这位细腻的无党派女神职人员，调来了一位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年轻同事，但这位年轻人却打电话给广播电台夜间节目，自称是部长助理并要求通过广播为他与一位女士约会，默克尔得知后马上解了他的职，为他在部内安排了另一个岗位。默克尔的第一个新闻发言人格图·扎勒曾是众多同事中对她影响最大的人，但自从夜间广播事件发生后，贝特·鲍曼调到部里，扎勒的影响力大为减小，但扎勒后来还是跟着默克尔去了环保部。

新部长上任后的人事变动马上殃及到司一级领导，首当其冲的是负责青年工作的司长万弗利特·戴特林，他是海内·盖斯勒在基民盟总部时的同事，后被调入部内。他以“想法与众不同”出名，

完全不像“典型”的官员，也不按常规行事。戴特林的工作以前就受到科尔及其心腹、统一前的青年部国务秘书安彤·普法伊弗尔的干扰，戴特林对被解除职务反而感到高兴，他甚至是有意让默克尔撤消其职务。解除戴特林的职务很有可能也是科尔的意图，科尔对海内·盖斯勒的其他同事也都同样持排斥态度。向他的新部长特别是在人事问题上发号施令，是科尔的领导作风。默克尔下一步的人事安排更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她撤消了负责妇女政策的女司长顺普席林，后者以夸张的形式代表着妇女解放的立场，她是默克尔前任聚斯穆特的心腹，1992年2月到纽约联合国参加妇女权益大会刚回来就被解职。默克尔既不同意这位女司长的基本立场，也不能接受她过于突出的自信。

默克尔在部里肯定还有过其他不快，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她当部长半年后的一次新闻招待会上，与交通部长克劳泽大谈令她失望的经历——在本部内公开斥责自己的同事绝对是一种不寻常的现象。默克尔曾宣布，她要把新联邦州内急剧下降的妇女就业现象作为部内重点问题来解决，而从同事那里得的回应却是：“我们进行的有关调查研究要到1994年才能完成”，听了这话部长大怒：“新联邦州的妇女们等不到1994年。”她过去的同事一直都为默克尔能如此之快地接受新事物感到惊讶，有些同事还回忆起教她如何使用信用卡；她去美国时向她介绍连环画主角“史努比”的发明人并告诉她“史努比”是什么的情形。由于过去在东德时不具备条件，所以现在她要加速了解和适应“西部”的生活方式。即便对那些比较熟悉的领域，她也力争尽快了解全貌。她与很多专家座谈，比如比勒菲尔德的青年社会学家克劳斯·胡勒曼，联邦银行行长蒂德迈尔，以及曾担任过联邦内政部长和宪法法院院长的恩斯特·本达都进行过交谈。

如果仔细看一下当时妇女青年部为与本达谈话准备的提纲，就会对默克尔借助这位宪法专业人士想要了解的广泛政治问题有所认识。这些问题包括：改革第218条，姓氏权，强迫性收养，非婚生子女权利新规定，同性恋婚姻，依法追究对儿童色情犯罪的责任，性旅游，同等权利法等。参加过谈话的人员都回忆说，默克尔谈话时神情专注，只要她搞清了一个问题，马上就转入下一个议题。她的私人助理舍尔根证实：“她的全神贯注，她令人佩服的智慧，她对抓实质问题的能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过去的同事哈德维希·默伯斯也说：“默克尔在和同事讨论复杂的政治问题时就像‘政治动物’，有着本能的直觉，总能神奇般地指出立论的缺陷。”只要默克尔感到事先计划内容限制了她的决策空间，就会立即做出反应。几个过去的同事回忆道，从某种意义上说，默克尔还带来了一种民主德国时期的忧郁和古板的工作作风，默克尔在莱茵地区时而有过的“生活乐趣”，在她手下工作的人是感觉不到的：“根本别想和默克尔一起喝点什么”，相反倒是聚斯穆特有时会请关系最密切的同事到她家做客，海内·盖斯勒也会把别人送他的礼物分发给同事们。默克尔工作起来片刻不停，她似乎没有一点时间为她的同事们做点私人的事情。

默克尔很快发现出国访问也很重要。她作为部长的第一次长途旅行，是1991年4月7日到9日对以色列的访问。以色列对于历任德国青年部长都是一个重点国家，因为两国之间青年交流项目很多。默克尔乘坐的是从民主德国接管过来，后被德国联邦空军喷上空军标记的飞机，当初昂纳克在外出旅行中经常乘坐这架飞机。随行人员至今还能闻到飞机上东德人常用的特殊防蛀卫生球和洗涤用品的味道，这使飞机里的气味很特别。默克尔恰好乘坐这架飞机前往以色列想必是满意的。她的新闻发言人扎勒，负责青年交流项目的阿尔文·普罗斯特和几位随行记者陪同访问。这次访问恰逢第一次伊拉克战争结束不久，访问的整体气氛比较紧张，因为舆论指责德国公司向萨达姆·侯赛因出售化学及其他物品。

到达以色列后默克尔开始有些不快。她不是独自访问以色列，同行的还有科研部长海因茨·里森胡伯和联邦总理府国务秘书卢茨·斯塔芬哈根。按照礼宾惯例默克尔排在两位男士之前。早在阿登纳时代，家庭部长在部长排列中就是靠前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考虑到议会开会时，在政府成员席第一排就座的就不会都是男士了。科尔将一个部一分为三后给予三位女部长很高的礼宾待遇。默克尔抵达特拉维夫本古立昂机场后感到惊讶的是，整个日程安排没有征求她的意见就执行了。默克尔开始时并没有受到重视，甚至有点把她“晒在一边”。《斯图加特日报》描述道，“当默克尔怀着忐忑的心情踏上以色列国土时竟没人迎接她，并不是以方政府代表和记者以及德国外交官来机场的人数太少，而是这些人全都涌到同机抵达的里森胡伯身旁”。在特拉维夫机场贵宾室里，“里森胡伯在

德国驻以大使奥托·冯·嘎布伦茨友善目光的注视下，滔滔不绝地大谈科技合作”，在坐的还有陪同里森胡伯的以方对口部长，而“默克尔默默坐在一旁，她内心的想法肯定与许多当时的东德同胞相同：我们被容光焕发的西德人挤在了一边”。她尤其感觉自己没有受到德国驻以大使冯·嘎布伦茨的重视和同等对待，这使默克尔在这样一次历史性访问中油然而生一股“怒火”，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随行记者都看见了，但并没予以报道。默克尔试图在以色列人面前淡化自己在礼宾上受到的冷遇，但她出乎预料地得到通知，与时任以色列外交部长莱维进行会谈。这次出访以色列是根据默克尔本人尽快成行的意愿安排的，引人注意的是，尽管她是一个牧师的女儿，但她对安排参观基督教场所没有什么激情，也不参加任何礼拜活动。而其他基民盟政治家到以色列来都要参加一次基督教礼拜，做一次弥撒或与僧人一起进行一次晚祷。通过会谈，默克尔给以色列同事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在海法市与来自俄罗斯的犹太人交谈后，她对俄国情况的熟悉程度使这些人感到惊讶。

默克尔担任部长第一年中的另一次旅行对她来说具有特殊意义：1991年9月11日~17日科尔请她随同出访美国，同行的除了科尔的妻子外，还有作家昆策和当时的德美关系协调人维尔纳·魏登费尔德教授。科尔一行先去了旧金山和洛杉矶，在那里拜会了美国前总统里根，然后前往华盛顿，科尔向总统老布什介绍了他的年轻女部长。科尔携默克尔访美有其象征意义，也表明他对默克尔的偏宠。她在旅途中对德国记者说，陪同科尔访美一事早在德梅齐埃愤然辞掉基民盟职务之前就定下了，但她不知为什么对自己新承担的角色感到不适应。《斯图加特新闻报》这样报道：“在四天访问中默克尔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但同时也表现出正常的自信。当所到之处无不显示出科尔的高大形象时，波恩人眼里过于腼腆的勃兰登堡州牧师的女儿更想往后站，即使是科尔的妻子哈内罗尔和默克尔的私人助理舍尔根不断轻轻地把她往前排推，也无济于事，按照礼宾排列，她是德国代表团政治上的第二号人物。”

她当部长的第二年年年初遇到一桩倒霉事：在离开柏林一家叫博为勒的书店时，她不小心将右腓骨摔成骨折，她的腓骨已多次骨折，疼痛万分，她不得不在柏林济慈医院住院几周，这期间她就在病床上指挥工作。回到波恩后几周内她还得住拐杖上班，包括去参加内阁会议也离不开拐杖。根据医生的要求，她夜晚必须返回医院，按道理她白天也应该休养。科尔对她非常同情。

默克尔在部长岗位上很快认识到，要有实权才能塑造个人权威，而她由于所管辖的部权力有限，她塑造个人形象的机会就有限。她懂得没有支持者，没有一块自己的领地，她就是一个暂时的、可被替换的角色，因此她要为此创造一切条件。但她排除了在她的选区梅前州1竞选州基民盟主席的打算，因为提拔过她的克劳泽正在这个位置上。

勃兰登堡州失败的候选人

尽管她是梅前州选出的联邦议员，去寻找的第一个领地却是勃兰登堡州。1991年秋对默克尔来说是竞选勃兰登堡州基民盟主席的有利时机：德梅齐埃在此前9月份因民主德国国家全部事件辞掉了包括州基民盟主席在内的所有政治职务。当时基民盟内代表雇员利益的社会委员会主席及德国工会副主席西德人乌尔夫·芬克打算争取成为德梅齐埃的继任人，当他正决定申请候选人资格时得知，有人提出让默克尔也参加竞选，但开始时遭到她的拒绝。使芬克感到吃惊的是，他后来又接到默克尔的电话，告知她还是准备参加竞选。选举之前，芬克已在勃兰登堡州进行过多次竞选活动，得到该州多数地区基民盟组织的支持。而默克尔是被基民盟总书记吕尔推举为候选人的。科尔肯定也同意这一方案，因为他表示，如果来自新联邦州的女候选人接替德梅齐埃，这将对党的内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芬克是早在两德统一前就受冷落的前基民盟总书记海内·盖斯勒多年的知己同事，科尔不能容忍一个盖斯勒的人出任州主席，再加上一旦芬克成为州的党主席，就有可能成为勃兰登堡州很有潜力的州长候选人。

默克尔在1991年11月初，离竞选只剩不满一个月的时间才决定竞选州主席，这个被她称作“自己的决定”，决定得出奇之晚。但她仍然信心十足地准备一拼高低，特别是著名的东德政治家埃佩尔曼由于在州府波茨坦没有一席政治领地，于默克尔公布竞选之日宣布放弃竞选。他放弃的理由是，默克尔对他来说“值得信服和信任，这对将来也是明智的”。而当时的州基民盟理事会却表示，尽管默克尔青少年时期在勃兰登堡州的滕普林度过，但鉴于芬克长年积累的解决社会问题的经

验，将有助于解决本州社会问题。理事会多数成员支持芬克当选，同时芬克与州基层党组织关系密切，而默克尔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另外很多人对波恩总部指定科尔偏爱的候选人参选的作法十分不满。1991年11月23日在勃兰登堡州克纳特河畔的区里茨，州基民盟投票表决，默克尔在州党主席的竞选中只获得67张赞成票而败给得到121张选票的芬克。所有陪同和支持默克尔的人都看出她对如此悬殊的选举结果表现出惊愕。虽然她不高兴，但她不得不承认，芬克确实比自己老练得多。芬克能够获胜，一方面在于他暗示，他不是基民盟总部的宠儿，使那些对波恩总部持批评意见的人都投了他的票，另一方面他确实带着明确的人事方案来参加竞选，当时州基民盟正面临财政全面瘫痪，芬克出了一个高招，他推举富有的柏林工业家克劳斯·克内作为党内司库，这样他就可以帮助州基民盟长久摆脱经济困境。芬克使默克尔遭到迄今为止惟一一次政治上的失败，一次投票表决受挫，这着实给默克尔上了一课。

一跃升为联邦基民盟副主席

区里茨选举败北，并没使这位年轻的政治家真正受挫。吕尔马上表示，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默克尔都是德国基民盟党的希望。几周后，1991年12月，她在德累斯顿基民盟党代会上竞选当时联邦基民盟惟一的副主席一职，结果她获得719票中的621票，另有32票弃权，以86%的支持率当选。默克尔的获胜也是由于前任德梅齐埃辞职后人们觉得默克尔当选联邦副主席是早就内定的事，以科尔为首的基民盟领导层对默克尔的认可，使她能在最短时间里成为联邦政府内惟一具有长远发展潜力的东德女政治家，所以她毫无疑问地在党内未遭任何阻力就成了德梅齐埃的接班人。默克尔作为科尔的副手似乎并不能对提拔她的人有什么影响。以下例子便可以证实这一点：州长阿尔弗雷特·戈穆尔卡辞职后，在州府什韦林发生了政府危机。1992年3月16日科尔邀请梅前州基民盟总书记及不久后成为该州州长的贝尔恩德·赛特，交通部长克劳泽和州议会党团主席雷贝格，到总理府来讨论如何处理危机问题，而作为来自梅前州选区的默克尔却没有被邀参加讨论。对此《法兰克福汇报》写道，“能处理基民盟内部危机的只能是党主席和联邦总理科尔，而不是什么其他人，也不是他的第一和惟一的副主席、青年部长默克尔”。

德梅齐埃被解职并由默克尔取代后，两个人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在默克尔刚从政的头几个月里，德梅齐埃是她联系最密切的人之一，随着德梅齐埃作为民主德国最后一任部长会议主席在政治上的失败和默克尔事业上的直线上升，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淡起来。但是后来提到德梅齐埃的个人命运时，默克尔说她感到很痛心，并在1992年，当指控施托尔帕参与东德国家安全部问题解决后，她要求让德梅齐埃重返政坛，因为德梅齐埃的情况完全可以与施托尔帕相比较，“如果允许施托尔帕继续留在政府，就没有理由让德梅齐埃远离政治。二人都积极参加过基督教会活动，二人都与东德国家安全部官员谈过话，二人都作为非正式工作人员在东德国家安全部登记注册，而且二人都说对此一无所知。施托尔帕的问题得到了公正解决，而对德梅齐埃的处理是有偏见的。”

默克尔虽然对德梅齐埃问题的处理进行了积极干预，但两个人的关系并没因此得到改善，2002年11月德梅齐埃还抱怨，默克尔近十年内由于在基民盟的位置迅速高升，人变化很大，他的接班人已与他分道扬镳，他举例：默克尔与其现任丈夫的住所恰好和德梅齐埃的律师事务所在同一座楼里，“我两次对默克尔说，你有时间就到我这儿来坐坐，你来这里随时都有咖啡喝，可惜她一次都没来。我有一种感觉，她害怕接触所有提拔过她的人和对她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的人。她已变成西方式的政治家，像一个喜欢玩木偶的人，只要拽一下绳子木偶就摇摆晃动。这是一种操纵机械的乐趣，同样也是控制人的乐趣。”

继续寻找领地

默克尔在1991年12月当选为联邦基民盟惟一一位副主席，但她认为自己没有领地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她在勃兰登堡州失利后，正好赶上基民盟下属的基督教新教工作联合会主席辛茨因晋升为基民盟总书记，而使主席位置空缺，默克尔很希望能在1992年9月补选时成为该会主席。辛茨的前任均是基督教新教有名望的人物，如曾担任过联邦外交部长的格尔哈特·施罗德，担任过联

邦总统的罗曼·赫尔佐克，以及莱法州 1 议会主席阿尔布莱希特·马丁。这个联合会虽然没有很多各界代表，但却是基民盟传统的核心组织，对默克尔施展权力具有重要意义，能当选这个组织的主席让人有一种属于“联盟家庭”的感觉。作为基督教新教组织的第一位女性领导，默克尔想首先从讨论价值观问题入手，突出基民盟的基督教内涵，使这个组织在政治上得到加强。但在担任主席的一年中，她这些广告词般的宣言与她的实际工作内容很难统一起来，她也没给继任留下什么特别的工作印迹。不久她又迈向新的政治彼岸：1993 年她当选为梅前州基民盟主席后，她宣布将集中精力做好联邦基民盟副主席和州主席的工作。

在 1992 年 10 月杜塞尔多夫基民盟党代会上，默克尔获得 968 票中的 762 张选票（得票率 76%），连任联邦副主席一职。这一结果虽然是对她在政治上以及作为东德政治家突出代表人物的肯定，但她被拥护的程度有所减退，这说明在与西德同事的竞争中，她已很难像 1991 年 12 月那样，以单一候选人身份获得那么好的选举结果，那次她的得票率为 86%。默克尔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缺乏州一级政治方面的支持，正在此时她又赶上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偶然机会，曾经长期提拔过她的克劳泽由于前边已提及过的原因，不得不先从联邦交通部长的职务退下来，又于 1993 年 5 月被迫放弃梅前州基民盟主席一职，默克尔很快便被提名为继任候选人。此次与曾在勃兰登堡州竞选时的情形相反，无论联邦一级基民盟，还是梅前州一级基民盟都积极支持默克尔。一方面由于默克尔是从梅前州选出的联邦议员，另一方面州基民盟由一位有影响的联邦部长担任主席，可以在波恩基民盟执政的政府内更好地为州事务做院外游说工作。默克尔作为候选人还须通过当时的梅前州州长赛特的认可，这样默克尔进行竞选便不会有任何阻力了，果然她于 1993 年 6 月获得 159 票中的 135 票（得票率 85%），当选为州主席。由此她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保障她联邦政治地位的地方权力。此后她与克劳泽的关系明显恶化，而她则借助州主席的位置加强了她在党内的地位。她担任联邦妇女与青年部长近四年时间里，有几个重要事件值得分析总结：

最大的阻力：第 218 条

堕胎问题把默克尔带进十分困难的境地，一方面她作为年轻的妇女部长想为妇女争得自决权，同时她认为自己有义务在重新统一的德国代表东德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她属于信仰基督教的党派，这个党的大多数党员，至少联邦一级的议员都信仰天主教，这些人与教会的立场很贴近，认为“保护生命”意义非同寻常，他们以猜疑的眼光观察着党内高层对这一问题的政策。联邦议院要在绝对禁止堕胎、限期咨询、由医生出具适宜堕胎证明和限期解决的方法之间进行选择决策。前民主德国的法律规定很清楚：在胎儿生长的前 12 周内妇女有权决定是否终止妊娠。对此，两德统一协议中提出要制定一个适用于全德的规定。

显然，在对第 218 条进行修改的过程中，联合执政的联盟党与自民党不可能提出共同的法律草案。在堕胎问题上自民党主张限期解决的办法，而多数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成员则倾向严格的由医生出具适宜堕胎证明。以聚斯穆特为首的少数派则力主咨询解决方式，最终由当事妇女本人做决定。默克尔很欣赏聚斯穆特提出的草案，在她委托本部起草并提交讨论的法律草案中明确阐述了这个观点，从形式上说，这一问题一部分应由联邦司法部负责，另一部分应由联邦家庭部负责。默克尔始终把“帮助代替惩罚”的格言作为指导思想，主张妇女应该在公正的咨询之后做出是否要孩子的决定，而不是用惩罚手段进行威胁。尽管她的草案在自己所属的议会党团中没有通过的希望，但是像在以往的政治生活中一样，她总能在最后使自己的方案得到实施。这一次在联邦议院的表决中，大多数——主要是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议员投票支持限制期限的法律条款，默克尔由于对此投了弃权票而引起基民盟和基社盟议会党团多数成员的不满。248 名基民盟/基社盟联邦议员为了让这一决议流产，对它进行了法规审查起诉，但联邦宪法法院批准了限制期限条款的核心内容，妇女部长完全同意法院的判决。

默克尔在联邦议院表决后表示，不参与联盟党议员对重新制定的第 218 条的法规审查起诉：“我也听说基社盟甚至基民盟的一些议员要求联邦宪法法院对这一条款再进行一次法规审查，这种做法原则上是合理的也是正确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认为联邦宪法法院对此也应该明确表示它的态度，尽管我不会参加这一起诉。”但奇怪的是，在一次采访时她宣称她还是签了名，她

解释说：“联盟党的草案对我来说太强硬，社民党草案（跨党派提议）是纯粹的期限解决方案，二者我都不满意，因此投了弃权票。已经是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主席的朔伊伯勒催问我，是否参加对社民党提出的、自民党也同意的条款进行法规审查诉讼的签名时，我毫不犹豫地签了名。”她对本书作者也回忆道，在朔伊伯勒的追问下，她还是在法规审查起诉书上签了名。而事实上起诉人签名里并没有默克尔的名字。对于这惊人的“记忆空白”只有两种解释可能，一是她今天作为党主席想弥合旧时与多数本党议会党团成员的分歧；二是她搞混了，宪法法院宣判的结果正是她所希望的而不是起诉人所期望的结果。

堕胎题目不单对默克尔，而且对她的上司科尔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科尔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持自由宽容的态度，因为从感情上说，这个问题更多属于私人而非公共生活范畴。但他作为基民盟主席又觉得有义务倾向多数党员的保守态度。对他来说更为困难的是，作为联邦总理他必须签署这一条款，但对外表态时他又要说这一条款内容有悖宪法，而如果科尔拒绝签署这一条款，也免不了联邦宪法法院的官司。最后他选择了另一条路，他以联邦总理的名义签署了条款，又以议员身份参加本党议会党团多数成员提出的法规审查起诉。他为最终结果感到高兴，多年争论不休的问题终于有了一个满意的法律结局。

平等法

默克尔并不认为，自己克服重重阻力主张的“平等法”是妇女青年部头等重要的项目，但她得在内部阵营的政治分歧中证实她有能力实现个人的主张。默克尔积极制定“平等法”的理由是，在这一领域无论西德还是东德都是一个空白。1992年初她第一次提出相关草案就在波恩政坛遭到批评。参加联合执政的自民党以及颇具影响力的经济联合会，都强烈反对草案中关于雇用被证明有负担的妇女重返工作岗位的提法。这一提法意味着雇主在雇用人员时不得有性别歧视。默克尔的草案招来一片指责，1992年2月《星期日图片报》以“整个波恩都在嘲讽默克尔的妇女解放政策：您会雇用这样的妇女吗？”为标题开始了论战。德国工商大会主席施蒂尔也毫不掩饰对草案的蔑视，有媒体引用他那不客气的话说，“人们惊奇地看出，政治家们因为本身没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才会生出这种想法。”而在野党也对默克尔不满意，认为平等法草案在雇用妇女问题上没有规定雇用妇女的具体定额，使当事人无法起诉。

仔细观察一下整体情况就不会对平等法中缺少定额感到奇怪。作为部长默克尔从一开始就不主张搞定额，因为硬性规定定额与理智的、非感情化的平等法不相符。她只想让平等这个概念在实际运用中有所改进。默克尔没有被各方对草案提出的生硬批评所激怒，她并没有把这个草案的作用视为万能。为了协调各方对平等法的不同意见，需要几个月时间进行反复谈判。直到1993年9月，修改后的草案才又提交到联邦议院。默克尔在有争议的关于有负担的妇女重返工作岗位问题上做出了妥协，由此得到了联合执政党的支持。妥协后的草案提出，当事人妇女有权要求雇主最高给予三个月的经济补偿，不到400名员工的中小企业特例处理。经过顽强的周旋，这项法律于1994年9月1日正式生效。

幼儿园，青年暴力，妇女失业率

默克尔对待其他一些在联邦政治中算不上重要并且不那么引人重视的项目，也抱着同样执着的态度，比如年满三岁的儿童上幼儿园的法律保障。这一政策在今天，几乎很难让人想到与默克尔，或根本不可能与基民盟一位政治家联系在一起，但1992年确实是在默克尔当部长时，促成了“扶助儿童及青少年法修正案”，使儿童上幼儿园的要求有了法律保证。回顾那一段所做的工作，默克尔认为那是她当妇女及青年部长时取得的最大成就（请参看本书第267页作者对默克尔采访一节）。在与不断增多的青少年暴力犯罪的斗争中，特别是针对统一后第一年发生在东德的不寻常现象，她毫不畏惧地与有极端倾向的青年进行讨论。为了加强这一领域的工作，她的妇女青年部于1992年1月制定了持续三年的132项反暴力攻击的项目。她的一项建议至今还值得回忆。针对当时青少年中不断增多的攻击外国人的暴力现象，她建议为学生开设“人类文化学”课程作为必修课。同时她

提示电视台须加强自我监督，限制暴力内容节目的播出，此外她也主张禁止播放被列入禁放名单的电影，而且她极力反对播放带有右翼激进色彩的音乐。另一方面她拒绝对青少年刑法增加更为严厉的修正条款。默克尔还积极推动反对虐待儿童的运动，在全德范围开展了“反对对儿童施暴”的启蒙教育活动，并希望借此为降低联邦德国不断增高的针对儿童的犯罪现象做出贡献。另外面对东部妇女高失业率问题，默克尔在内阁里极力维护妇女利益，要求加强妇女进入劳动市场的措施。她在这一问题上的积极介入，促使劳动部长布吕姆在“劳动促进法”中增加了相关章节，但她同样没有笼统地要求规定妇女就业定额，从中可以看出她能根据现实发展需要，制定切合实际的政策。

踏着特普费尔的足迹戴上联邦环保部长桂冠 (1994~1998)

1994年联邦大选后，默克尔出乎许多人预料在科尔内阁当上了环保部长。与过去的“软任务”相比，她现在负责的领域是政治争论的中心，其决策对于经济发展在过去和将来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默克尔是继前任克劳斯·特普费尔在环保方面已采取了十分成功的政策背景下走马上任的。特普费尔在任期间所推行的环保政策在经济繁荣的大环境下一枝独秀。默克尔认识到，如果经济发展变得困难了，环保问题上的优先政策也势必要进行调整。默克尔冒着阻力开始了环保部长生涯。很多人对默克尔在环保部的业绩印象不深，其原因可能是，特普费尔从1987年起领导环保部多年，成就卓著。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他的环保政策在联邦德国具有越来越突出的意义。特普费尔成功的秘密武器在于，他出于对环保事业的执着和信念，为扩大环保部的影响四处争吵，这一点也是他1994年被解职的主要原因。一部分工业部门，如对他制定的环保监督条例极为不满的汽车制造业，认为他的态度过于执着，影响力太强。

在整个经济处于不利的状况下，特普费尔领导的环保部已经没有任何活动能量了。于尔根·吕特格斯了解到特普费尔原则上有关调换工作的想法，就提示科尔换掉特普费尔，对此科尔很感谢。吕特格斯出任“未来部长”之前，是基民盟/基社盟联邦议会党团第一干事长，可以对政府的人员组成施加影响，同时另一个可能导致特普费尔被解职的重要原因是，党内党外都议论特普费尔是科尔具有潜力的接班人，对这种说法科尔大为不悦。特普费尔很愿意乘机当上主管基础设施建设且具有实权的建设部长，同时肩负起议会和政府迁往柏林的巨大搬迁任务。现在特普费尔是联合国设在内罗毕的国际环保组织副秘书长，是德国驻外级别最高的政治家。

尽管有以上因素，外界对任命默克尔为环保部长仍感到吃惊，虽然她曾经是物理学家，专业也对口。当科尔提议让她接管环保部时，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她认为这个任命是一次很好的机遇：“很明显，曾经被分解开的妇女及青年部和家庭及老年部又将重新合并，我不可能做家庭部长，因为那时我自己还没结婚成家。而环保部涉及一系列自然科学问题，这正是我的强项。”1994年11月17日默克尔宣誓就任联邦环保部长，开始了又一任在联邦政府任职的生涯。正因为前任非凡的专业能力和在民众中的知名度，使她接手这项新工作时面临更大的挑战，外界用怀疑的目光注视着这位新任环保部长。具有影响力的环境与自然保护组织批评环保部任用了一名“轻量级环保部长”。因此默克尔总是避免别人拿她与在位多年、深受环保界政治家和环保组织专家高度评价的特普费尔直接进行比较。一个独具风格的国务秘书被解职

默克尔刚到环保部工作时有人曾低估了她的能力，但这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她上任不到三个月就让长年担任国务秘书的施特洛特曼提前退休，以显示自己的大权在握。施特洛特曼是前任特普费尔留任的高级官员，他在特普费尔手下工作了近8年，两人相互信任，合作密切。施特洛特曼作为环保专家，手中无可争议地掌握着一定权限，在切尔诺贝利反应堆事故后，他与特普费尔一起，在联邦内政部一个大司与联邦经济部一个司的基础上共同扩建成强有力的环保部。施特洛特曼独立和独特的工作风格，使默克尔从接触他的第一刻起就不喜欢他。施特洛特曼在特普费尔手下虽然在环保部的方针及政策路线上没有更多的发言权，但在很多重要问题上都参与意见，特普费尔与施特洛特曼的合作之所以成功，是因特普费尔虽然了解施特洛特曼求名欲望强，但他也知道施特洛特曼是一位忠诚的国务秘书，在无数次公开场合，施特洛特曼决不让部长特普费尔的权力受到任何危害。

按照一般规律，部长不喜欢作为自己副手的国务秘书有很强的对外形象，科尔时期只有极少数被看作是传奇人物的国务秘书，如经济部国务秘书施勒希特，财政部国务秘书蒂德迈尔以及他的继任、现任联邦总统科勒具有独立的对外形象，蒂德迈尔和科勒二人与其他国务秘书相比，更多的是因为在国际经济峰会上有所谓“负重的雪巴人”之称，他们不是作为财政部长的代表，而是作为联邦总理的个人代表行使权力，是总理赋予他们特殊的地位，他们可以与总理保持直接的“热线联系”。

特普费尔当联邦部长之前，从 1978 年至 1985 年曾任莱法州环保与卫生部国务秘书，后来又在该部当了两年部长。根据他本人的经验，他深深体会到作为国务秘书一方面自己要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另一方面又要默默地、高效率地支持部长工作，处理好这个关系很不容易。特普费尔有足够的自信，容忍施特洛特曼有时候撸胳膊挽袖子一派自命不凡的样子。特普费尔持这种态度也与他的政治风格有关，他不愿事无巨细地对“家里”所有事情都去过问。默克尔则与特普费尔对待施特洛特曼的态度完全相反，她根本就不想尝试与他合作，她也不容自己身边有特普费尔时代的影子。1995 年 1 月 6 日她就宣布解除施特洛特曼的职务，消息传出引起轩然大波，在环保部似乎“没有施特洛特曼的时代”是不可思议的。特普费尔本想在默克尔面前为自己昔日的国务秘书说几句好话，不料却帮了倒忙。社民党环保新闻发言人米夏艾拉·米拉曾说：“我们经常在具体问题上与施特洛特曼争吵，但我们始终都相信他说的”，这番话无异于火上浇油，加快了默克尔对施特洛特曼的解职过程。由于解职国务秘书必须经过内阁和总理的同意，最终经联邦总统签字这样一套形式，默克尔肯定在解职行动之前就征得了科尔的同意。在解职决定之前，默克尔准备了充分的事实在总理面前状告施特洛特曼。有人猜测，解职一事也反映出默克尔摆脱科尔影响的最初尝试，当然默克尔在那时还不敢那么放肆。不管怎么说，如果事先不与科尔商量，想解除谁的职务也是不可能的。

默克尔任命公认的管理专家埃卡德·尧克作为施特洛特曼的继任，他是从内政部调到环保部来的。与默克尔一样，尧克也是进入环保政治领域的新兵。尧克是由豪斯曼推荐的，他们二人是朋友。根据科尔的建议，默克尔将豪斯曼留在了由克劳迪亚·诺尔特领导的重新组建的联邦家庭、老年、妇女与青年部。而对于默克尔这个仍属没经验的来自东德的年轻部长，科尔想为她配备一名经验丰富的副手。任命新国务秘书后，默克尔虽然也还未完全进入尚不熟悉的环保政治角色，但已开始着手进行部领导层的人事调整。她想尽快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目标明确、独具个性的女部长。特普费尔与默克尔交接得很快，只涉及一些具体的事务，默克尔也没请有经验的特普费尔提什么建议或发表看法。此时此刻，没有人再怀疑默克尔获取权力的本能，而几年前她还被人嘲笑为“科尔的小姑娘”。

1995 年的柏林气候峰会

1995 年的头几个月默克尔就有了塑造个人形象的机会。联合国气候峰会拟在柏林召开，默克尔作为东道主国环保部长主持这次会议，这对她在国际层面上贯彻和实施政策的能力是一次严峻考验。经过两个星期的反复谈判，终于在 1995 年 4 月初的一次夜间马拉松会议上通过了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柏林议定书”。减少排放量虽然在短期内难以看到效果，但对将来有难以预料的好处。默克尔回忆当初在联合国气候峰会的成功表现时，认为这算得上她迄今为止取得的最大政绩之一：“我刚开始担任环保部长，就在 1995 年作为大会主席领导柏林气候峰会。会议结束时形成了所谓柏林议定书，在 14 天会议期间我赢得了与会者的信任，保证了大会取得圆满结果，我认为这是最好的业绩之一。”像其他国际会议常有的现象一样，在柏林会议的前几天，很难看出谈判能否取得积极结果。与特别难缠的代表团持续至深夜的单独谈判搞得默克尔精疲力竭。直到会议结束前几个小时，还到处弥漫着似乎要失败的气氛，果真这样，对默克尔来说会是一个苦涩的打击。

大会接近尾声时的一次夜间会议快要结束时，默克尔在体力和心理上支撑不住了，她落了泪，甚至想甩手不干了。这时是与她关系最密切的女同事贝特·鲍曼在不少人能听见的情况下，低声但态度有些生硬地对默克尔说：“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在座的德国代表团成员都吃了一惊，但鲍曼的话起了作用。几个小时之后会议取得了成功，默克尔对会议结果很满意。这位在环保领域还缺乏经验的女部长，任职之初就能够在国际会议上让 130 个国家的约 1000 名意见不一的代表最终达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决议，证明她在短时间内已掌握了气候保护方面的主要问题。

同事们开始时对默克尔的疑惑和回避（或者说默克尔对同事们）由于新部长的坦诚相待逐渐消失了，她对担任领导职务的同事给予越来越多的信任并赋予更多的职权范围。过去关系密切的同事时至今日还在夸奖默克尔如何利用她分析问题的天赋很快掌握了环保政治的要领，有些同事还回忆起，她很愿意就各种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并勇于接受各种批评意见。她很快发现，环保部工作人员中有相当多的“信念叛逆者”，他们在环保问题上并不为各自党派的政治方向所左右，这使环保部内形成一种有利于女部长稳固自己地位的氛围——为此一些人感到惊讶，当然这种工作局面也是经过一段冰冷的过渡期才形成的，这种氛围使默克尔作为环保部长的自信心大增。与特普费尔在任时相比，默克尔就职后的头几个月里便改善了环保部与经济界的关系，新的环保部长主张在环保政策与经济发展之间采取“缓和政策”，避免意见分歧，尽可能一致地去解决矛盾。

夏季废气排量与内阁会议上落泪

1995 年上半年，默克尔在新岗位上开始感觉游刃有余，但 5 月她却在一次内阁会议上痛哭流涕。引起默克尔如此激动的起因是，会上讨论她提出的限制夏季废气排量和机动车车速的规定。由于 1995 年入夏臭氧值超常，公众和反对党要求采取相应措施的呼声非常强烈，默克尔也想以夏季废气规定的制定，衡量自己在内阁里坚持个人环保政策的能力。

1995 年 5 月的内阁会议很快显示出，默克尔所倡导的建议很难得到多数成员的支持。尽管她在会前与交通部长马蒂亚斯·维斯曼和经济部长京特·雷克斯罗德已对此进行了磋商，但会议讨论中出现的反对意见显然使她陷入孤立。维斯曼指出，因臭氧值增高而禁止车辆行驶或限制机动车车速，就连科研人员也争议很大。他强调，如果真要采取措施也决不能影响高速公路。雷克斯罗德也对默克尔的禁止无催化装置机动车在臭氧值超标时上路的建议提出非议，他要求无论如何要对与经济 and 公务有关的车辆搞特殊规定，否则整个经济就有可能瘫痪。默克尔的计划仅仅禁止小轿车、摩托车和卡车行驶，认为这样并不影响大众生活。科尔鉴于多数人反对也没有同意。当默克尔坚持要在夏季采取相应措施时，科尔表示，他理解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民众对环境的担忧，但他觉得，在夏季休假前仓促出台相应措施不妥，而且主管部还须与议会党团进行细致的商讨。显然默克尔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在她意识到自己的大胆提议已没有希望实现时，泪水不禁涌出。

她感到自己被内阁同事置于困难境地而不管，更恶劣的是连自己的导师和政治养父科尔也如此对待自己，这使她非常气恼，她在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瞬间落了泪，泪水隐含着积压在心中的失意与失望。落泪一事在波恩政坛引起不同寻常的反响。对于那次内阁会议上的表现默克尔至今还记忆犹新：“长期以来的压力，又赶在夏季来临之前把这个议题提到内阁日程。很显然科尔此前没太注意这个问题，但他问我是否与基社盟和自民党即米歇尔·格罗斯和赫尔曼·奥托·索尔姆斯商量过，而这两人恰恰是我惟一没有征求过意见的人。长话短说，我感觉自己上了圈套。我担心夏季之前规定难以出台，面对这种局面，一个男人会大声叫喊，而我只能流泪。”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默克尔的泪水推动了夏季废气规定的出台。落泪成了政治事件，公众对此无人不知。就在此次内阁会议后短短几天，她就与维斯曼和雷克斯罗德达成妥协方案：当臭氧浓度超标时禁止无催化装置的汽车行驶，此规定不涉及有害物质低的柴油汽车、近途公交车、医生和医院用车及摩托车。联邦州可以根据需要允许上下班人用车，度假及与经济运营有关的车辆不在此禁止范围，同时妥协方案也不要求限制车速。这一规定由联邦调解委员会进行了修改加工，经过长时间谈判的夏季废气排量规定终于出台，这一规定首先在一个联邦州实地试行。各方对妥协方案都比较满意。

核废料运输与核能

默克尔担任环保部长期间最大的危机莫过于核废料问题。还在 1995 年夏季废气排量规定之前，同年 2 月默克尔就看出用卡斯特储罐车把核废料从巴符州运往下萨克森州戈莱本镇储存中心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对她处理危机能力的检验。在这一问题上她始终坚持前任特普费尔对下萨克森州关于储存核废料的要求，这一做法尽管遇到强烈反对和阻力却一直坚持到 1998 年春季。她之所以决定这样做，是她认为让核能下马是不现实和无意义的。默克尔还一直主张由本国自己解

决核废料问题，包括最终埋藏。回顾当初在卡斯特运输问题上所持的强硬立场，她认为这是联邦环保部长根据法律所应履行的义务：“这关系到原则，关系到法制国家的原则，凡是法律规定的，国家就必须执行。另外我的基本信念是，和平利用核能是负责的态度，但我很清楚，如果核废料的处理受阻，核技术的应用也就无从谈起。”

1998年5月爆出消息，在卡斯特储罐运往法国途中，已燃烧过的核废料出现放射超值现象。这一核污染的发生对于处在大选之年的政府阵营极为不利。绿色和平组织指责，不管核电企业还是主管安全的部门都没有按要求履行监督职责。默克尔本人也感到核废料储罐出现问题，对整个核领域的可信度是个沉重打击。1998年5月21日环保部要求立即停止核废料运输：停止国内核废料运输和向国外运输待处理的核废料，直至确定相应的安全措施，保证不再发生核污染。默克尔委托独立的设备与核反应安全协会对事故进行调查。1998年5月25日她提出核废料安全运输的十点措施，要求在能源供应规划中制定新的运输方案，实行放射值超标申报这个迄今为止尚未有过的制度。

默克尔邀请各联邦州环保部部长到波恩参加危机峰会，但有的州不配合，只派了司长一级的领导赴会，以示不满。她的同行竟在联邦大选前的几个月不助一臂之力，帮她走出困境。反对党要求她辞职的呼声很强烈，联盟90/绿党的议会党团发言人菲舍尔推论，默克尔在1998年4月底才得知早就发生的核运输超标事故，仅这一点就足以让她退位。当时社民党联邦议会党团的干事长彼得·施特鲁克也指出，默克尔应认识到，她作为部长所应承担的责任，她必须毫无漏洞地说明，究竟是核电企业向环保部错报了信息，还是环保部明知危险却仍然批准了核运输项目。默克尔对上述让她辞职的要求给予了坚决回击，至于证明运输过程中是否违规操作，这不是她的工作，而是长时间内没有向她及环保部通报核运输中辐射超标的核企业的义务。她的任务是全面阐明事故的真像。回顾当初的情景至今让她很生气：“我感觉自己被欺骗了。特别是他们对核储罐没有采取改进措施。当你为一件事负有责任，却又力所不能及时，是很糟糕的。核工业界的所作所为在1998年联邦议院选举后，受到红绿政府的报复：核能源的使用被完全取消。”科尔对她还是支持的，但科尔也强调，作为环保部长对核污染丑闻应承担 responsibility，但不是辞职。如果在大选前几个月辞职，等于她承认发生的一切都是自己的过失。

默克尔对联邦议院环保委员会指出，联邦州有权负责监控核发电企业的生产经营，比如对最容易发生污染的核废料装载过程进行严格检查监督。她要求核能企业尽快落实十点安全措施。由于找不出默克尔对事故的直接责任，最终她还是克服了危机。对她的指责主要集中在部长的监督作用不够，但主要责任应该由联邦州承担，是核能企业没有认真履行监督职能。正因为默克尔熟知权限范围的划分，才得以保全自己。默克尔克服危机的能力已被公认为很有“耐力”。她深深明白，辞职意味着她联邦政治生涯的结束。虽然有了这番经历，这位物理学家在1998年8月核污染丑闻之后、联邦大选前几周仍表示坚持和平利用核能的政策。

默克尔关于使用核能的态度，早在1996年5月与社民党讨论未来核能利用及核废料处理问题时就很明确。在几次讨论中她不但主张使用核能，而且还认为应该在德国本土解决核废料最终处理问题。随着1997年7月默克尔的“核能法补充议案”的提出，与社民党的核能讨论也以失败结束。补充议案提出，新型核电站的检验程序不受所在地区限制，无须联邦州同意，这一议案的核心思想在能源专门讨论会上遭到社民党的坚决反对。下萨克森州环保部长莫妮克·吉里凡作为社民党一方的副代表把默克尔的做法视为一种侮辱，指责联邦环保部长破坏了继续谈判的可能。但默克尔执意要搞核能法补充议案，到1997年入夏，能源专门讨论会结束时她都未改变态度。在她的坚持和推动下，1997年7月中旬联邦内阁批准了核能补充议案。政府一意孤行的做法引起了几个州、自然保护组织和波恩反对党的强烈反对。反对的重点是默克尔在草案中提出的对核电站进行集中检验、延长东部核电设施使用许可、促进德法重水反应堆的建立。默克尔面对一片反对声无动于衷，她的理由是，正因为与社民党的能源专门讨论会毫无结果，才促使政府独自做出决策，她在能源专门讨论会上的表现和对核能法补充议案的态度引起很大争议，但也进一步证明她能顶着阻力实现个人意志和决策的特点。

循环经济法和土地保护法

除了核能和卡斯特运输这两个系列问题外，作为环保部长默克尔还抓了其他几项重点工作。1996年秋季循环经济法生效，它实行一种产品责任肇事者原则，旨在减少、再利用和按照环保要求处理企业在生产、市场营销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垃圾。废除过去企业造成的垃圾由社区或乡镇出资处理的旧法规。默克尔想利用这一法律加强自己的职能和对企业的监管，对此她做了这样的诠释：“企业生产出产品还不是任务的结束，它还须负责按环保规定处理垃圾，包括废物再利用。”1996年9月默克尔又向议会递交了关于改进土地保护的法律草案，这一“保护土地改良和清理土地废物法”规定，土地和地产所有者有义务按照法律保护土地，减少所属土地圈封现象，减少或避免由工业、道路和住宅建筑造成的污染。但环保和自然保护联盟依然批评默克尔做得不够，形容她提出的法律草案像“没牙的纸老虎”，因为这些法律条款包括很多可以不在执行范围的特例。但这一法律的最终生效结束了多年来联邦、联邦州和行业协会之间的争论，不能不说是一个成就。默克尔还想推动自然保护法的形成，却失败了，她的前任特普费尔当初就没成功。1996年8月科尔内阁虽然通过了新的联邦自然保护法草案，但出于联邦州和农业协会的压力，议会迟迟未予批准，默克尔经过长时间努力，终未实现对自然保护法进行重新修订，这一新修订的法律草案在她的继任于尔根·特里廷（绿党）当部长时才得以批准。

气候保护

土地保护法和自然保护法草案忙过后，默克尔把工作重点再次集中在气候保护问题上。1997年4月她向内阁提交了由环保部完成的第二次国家气候保护报告。报告指出，1996年有害于气候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自两德统一以来，在德国西部第一次升高了1.9%，在东部相反减少了43.6%，为了实现1995年柏林气候会议上提出的，到2005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25%的目标，默克尔要求参加柏林会议的各方人士进一步加强努力。1997年11月在日本京都世界气候会议上，默克尔的态度和举止表明，联邦德国愿意在环保问题上为国际社会作出好的榜样。她属于那些主张持续减少有害气体排放的代表。与会人士称，在近160个国家的代表经过艰难和漫长的谈判之后，终于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其中默克尔功不可没。备忘录中规定，大部分工业国家的温室排放量最晚至2012年要减少5%到8%，欧盟国家规定减少8个百分点，美国减少7个百分点，日本减少6个百分点，总之工业国家平均要减少5.2个百分点。

1998年4月默克尔在环保政策方面又提出“德国的持续发展”纲领，这是她塑造个人特性的一个典范。纲领为最重要的环保政策确定了目标、时间表和措施。环保组织评价说这个纲领方向正确、但步伐迈得不够大。它至今指导着一些重要的环保政策，是一个成功的纲领。

生态税

今天每当联邦议院讨论生态税问题时，老议员就会回忆起过去那位主张对汽油和取暖油收取生态税的女环保部长。默克尔相信，税收是发出合理使用有限能源信号的工具。1997年她在《法兰克福评论报》撰文：“今天的能源太便宜了，我认为应有目的地提高能源价格，包括矿物油、煤气和电。只有逐年增加税收比例，才有可能达到我们期望的环保政治导向效应。”在2002年联邦大选时联盟党又提出，根据有害物质排放量多少收税。默克尔说：“我没看出红绿政府的生态税在家庭消耗和道路交通方面起了导向效应”，我们主张“一种递增的、平等竞争的、适合整个欧洲的、根据有害物质排放量征收的税额，这是红绿政府所没有做到的。”

小结

1998年联邦大选不仅是科尔时代的结束，也意味着默克尔8年联邦部长任期的终结。1991年至1994年她是妇女与青年部长，1994年至1998年又当上了环保部长。回忆科尔政府时代，默克尔的角色仍然显得比较苍白，她多么希望在她所管辖的业务领域能够显示出个人魅力，然而她未曾完全脱离提拔她的科尔的影子，尽管她早就明白，1998年科尔作为联盟党总理候选人只能给党带

来灾难。只有局内人看得出，默克尔在小心地与议会党团主席朔伊伯勒一起搞联合执政。朔伊伯勒通过几次大的环保活动，了解了默克尔的“精明”。与其他东部年轻的政治家相比，默克尔在部长位置上培养了一种可靠的权力感，此外她在波恩这部政治机器里的分析能力和快速、全面掌握新事物的天赋也颇引人注目。她参加内阁会议总是作好充分准备，据曾任外交部国务秘书的维尔纳·霍耶（自民党）回忆，默克尔在内阁会议上有时还反驳科尔的意见，“她有自己的头脑”。

第六章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当上朔伊伯勒“临时班子”的总书记

1998年11月7日在波恩联邦基民盟党代会上，科尔揉着湿润的眼睛把党主席的宝座拱手让给了朔伊伯勒，这个尽管他不喜欢这个多年来被他宣称是自己接班人的。这次党代会使默克尔有机会——她已不再是联邦部长——在事业上达到新的飞跃。黑黄联合执政的政府大选败北几周后，被迫辞去联邦部长职务的默克尔于1998年11月初如愿以偿当上基民盟总书记。这个职务是在野党内少有的几个确实有意思，同时又是跨区域并且有脸面的职务之一。默克尔根据继续担任基民盟/基社盟联邦议会党团主席朔伊伯勒的提议，以874对68的高票当选为新总书记，成为从1992年5月以来一直担任这一职务的辛茨的接班人。默克尔是能够给基民盟带来信心的正确人选吗？朔伊伯勒出于什么原因举荐这位44岁的女性做总书记？直到2000年2月朔伊伯勒从党主席和议会党团主席的位置下台，他依然认为，“我相信，这一人选是我在位期间一个最成功的决定，对这一点我从未后悔过。”这句话今天还会不会从朔伊伯勒口里说出，就值得怀疑了。

1998年联邦大选：交出政权后的新起点

朔伊伯勒和默克尔是在联盟党遭到灾难性的选举结果后开始主持党内工作的。1998年9月27日联盟党在大选中以35.2%的历史最低选举结果失利（1949年第一次联邦大选除外），而1994年大选时，联盟党还能以41.5%的结果勉强与自民党组成联合政府。实际上从那时起党内有经验的同事就清楚，科尔下一届大选必败无疑。因此有野心要接科尔班的朔伊伯勒对大选问题再不敢掉以轻心。最晚到1996年末1997年初，朔伊伯勒开始坐立不安，明显地将候选人问题作为关注的重点，为此他还利用媒体造势。他让《明星》周刊提出问题：“坐轮椅的人”能不能当联邦总理？在《南德意志报》上刊登了一篇被科尔认为是散布朔伊伯勒论调的文章，文章猜测科尔可能会辞职，同时还引用朔伊伯勒的话：“我知道，科尔听不进公开的、特别是朋友的建议，所以我也不给他出主意。”这些假惺惺“忠实”于科尔的话要反过来理解，因为朔伊伯勒心里明白，他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像等待继位的“查尔斯王子”。

默克尔同样早就看出科尔时代已近尾声，她开始追随接班可能性最大的朔伊伯勒。她深谙变成在野党后普通议员须退居后排座位的危险。大部分曾任过联邦部长的同事在政府更换后都痛苦地意识到，在日益年轻化的议会党团里他们几乎起不到明显的作用，就连很有名望的魏格尔交出基社盟党主席位子后也毫无例外地不再担任实职，并在2002年像科尔一样彻底退出联邦议会。科尔时期的部长，到2002年只有少数几位保住了联邦议员的位子，但在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领导层里也不再起什么重要作用，像吕尔这样老资格的国防部长有可能担任一定职务，可这位汉堡人却决定在2000年2月27日石荷州议会选举时竞选该州州长，不料就在选举前几个月爆出基民盟献金案丑闻，本来很有希望取代女州长希蒙（社民党）的吕尔，与州长一职失之交臂。竞选州长失败后，吕尔很难再“重新融入”新的党及议会党团领导层，按说就他的威望，他有能力与其他几个人一起遏制默克尔的野心从而影响她的升迁速度。吕尔现在是议会外委会主席，这个头衔听起来很响亮，实际上各议会党团的专业委员会没有特别大的作用。

1998年大选失败后，朔伊伯勒开始时还想利用吕尔的经验和在外界的威望让他担任一定的职务，当然朔伊伯勒首先考虑的是，把党内这个惟一具有威胁力的竞争对手垂涎党主席一职的欲望扼杀在萌芽中，而吕尔也许没有识破朔伊伯勒的目的。大选失败的当天晚上，尽管二人没被邀请，他

们还是一起前往科尔的别墅，欲与科尔和他那帮垂头丧气的心腹们共同商讨如何走出政治低谷。按照朔伊伯勒的说法，他想让吕尔和默克尔两个人作为最有可能当选总书记的候选人，他甚至还想让吕尔担任新设置的党的第一副主席，一段时间里朔伊伯勒和吕尔扮演着双驾马车的角色。但吕尔在科尔时期从 1989 年至 1992 年曾担任过基民盟总书记，原则上他不想再第二次出任此职，实际上朔伊伯勒从一开始就把眼睛盯在默克尔身上，想让她当总书记。再说吕尔有时举止“粗鲁”，他当总书记的时候有时还跟科尔唱反调，因此朔伊伯勒不会真的把他作为总书记人选。

默克尔为什么能当上总书记？

让默克尔出任总书记，朔伊伯勒的考虑有三：首先他认为默克尔比起吕尔要容易摆弄得更多，当然后来他明白自己想错了。其二，提名默克尔做总书记时，恰值朔伊伯勒与科尔疏远而与默克尔观点一致，默克尔在选举失败前就对关系密切的记者说，基民盟中占优势的“老男人”必将被击败，不只是科尔，还包括其他人。所谓“科尔的小姑娘”几年来一直想挣脱提拔者的束缚。在这段时间里，比其他入更清楚科尔的功与过、素有“科尔体系”设计师之称的朔伊伯勒也常常压抑着对科尔的不满，但外表上他对科尔还是一付忠诚老实的样子，像一位勤奋的大管家。1998 年作为新的党主席，他想借助默克尔的力量迅速摆脱科尔，撇开被人称之为“父亲与儿子的关系”。偏偏这时候男性杂志《花花公子》发表了对朔伊伯勒的采访，朔伊伯勒宣布他与多年以来的指导教师科尔已经友谊不再的消息——而这时距联邦大选只有几天时间！这一采访对基民盟核心选民有多大影响，在此不再细述。朔伊伯勒同时还让《花花公子》的读者知道，他认为科尔“政治上不巧妙”，科尔不该在“几年前”就说自己是他的接班人。当时还是议会党团主席的朔伊伯勒说“在民主国家不应预先、而必须在适宜的时机才能做出人事决定”。朔伊伯勒也反对把他与科尔的关系形容为“男人之间的友谊”：“我们属于政治上的两代人，仅这一点就不可能是男人的友谊。”朔伊伯勒试图摆脱自己深深陷进科尔时代的局面，但这使他后来遭了厄运，从而帮助女总书记进一步高升。大选失败后的波恩党代会上，朔伊伯勒违心地推举科尔做党的名誉主席，朔伊伯勒和默克尔二人几个月后才痛苦地听说，科尔作为名誉主席也享有并允许使用相应的权力（在联邦基民盟理事会及党内高层的席位和投票权）。就像一个总监工，科尔随时伴着他的继任及继任的总书记。

学法律出身的朔伊伯勒——这也是他选择默克尔做总书记的第三个原因——与学自然科学的默克尔在她做环保部长时两个人就很合得来。两人在政治上的天性，使得他们在诸如提高汽油价格和收取“生态税”这种争议很大的问题上都能保持一致。1998 年 3 月，绿党在马格德堡关于中长期大幅度增加汽油附加税达 5 马克的决定，成了惟一个让联盟党在大选中得分的外来因素，绿党在民众中的拥护率减少了一半。此时朔伊伯勒和默克尔二人执行的是一致的方针，他们不想对进一步提高生态税可能性的问题发表意见。只当了 17 个月的总书记

默克尔当基民盟总书记的时间很短：17 个月，更确切地算只有 12 个月。这期间联盟党在几个联邦州选举获得大胜，特别是 1999 年 2 月 7 日黑森州选举后，罗兰德·科赫取代汉斯·艾歇尔坐上州长宝座，基民盟得票率为 43.4%，勉强与自民党联合执政。1999 年 9 月 5 日基民盟在萨尔州以 45.5% 的得票率（1994 年 38.6%）实现独立执政。由基民盟执政的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分别以 56.9% 和 51% 再次取胜，勃兰登堡州在较低水平基础上得票率也相应提高（从 1994 年的 18.7% 增加到 1999 年的 26.5%）。1999 年 6 月 13 日的欧洲议会选举更是基民盟的一次凯旋：联盟党得票率达 48.7%（1994 年 38.8%）。看上去就像选民因在联邦大选中选了红绿政府，良心受到谴责，这次纷纷投票给联盟党。1999 年取得的突出成就，使联盟党沉湎于具有欺骗性的假相中，认为 1998 年的选举失败是一次政治事故。因此党的高层领导将其他工作搁置一边，集中精力研究联邦大选失败的真正原因，特别是朔伊伯勒不再理会关于他本人应该对大选失利也负有责任的说法。大选纲领继续由他来制定。

不断地宣布好消息对于默克尔总书记的对外形象越来越有利，当总书记的前 12 个月内，她着实有很多事情要做，然而“科尔——基民盟——献金丑闻”的爆出把一切都搅乱了。1999 年 11 月 5 日，奥格斯堡地方法院开始对科尔时期从 1971 年至 1992 年担任财务主管的瓦尔特·莱斯勒·基普发出逮捕令，基普被怀疑 1991 年从不久前逃到加拿大的院外游说者卡尔海茨·施莱伯那里收了

100 万马克贿赂金而且没交税。这笔钱又与向沙特阿拉伯出售装甲车和购买空中客车的生意有关。接受司法调查的还有以下人员：蒂森公司的总经理；潜逃在外、现已抓获的前宪法保卫局局长及前国防部国务秘书霍尔格·普法尔斯；施特劳斯的儿子马可斯·施特劳斯等人。基普拿出证据，100 万马克不是他收的个人佣金，而是作为捐款给了基民盟。接下来献金案的具体细节暴露得越来越多，一个个被揭发出的丑闻像雪崩一样向基民盟袭来，舆论也跟着大造声势。但正是这些坏消息为默克尔创造了重要时刻，使她的个人形象在这种时机得分。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里，她利用每一次集会的麦克风，以铁面无私和一尘不染的身份宣称，要把献金案搞个水落石出，而且矛头对准了她曾尊重的科尔。她首先公布了独立经济调查人关于施莱伯 100 万马克没有进入基民盟帐户的调查结果。科尔日益成为攻击的对象，但他在这时候还是驳回了所有指责。关于他任党主席期间有一个不透明帐户的猜测越来越厉害。1999 年 11 月 26 日，曾在科尔任期内做过多年总书记的海内·盖斯勒的一句话激怒了科尔，他说：“除了联邦一级的正常预算外，党内还有其他帐户。”这一说法使党内同仁大为吃惊。海内·盖斯勒接着说：“这个帐户只由联邦一级党的主席和财务主管负责。”这是第一次由科尔时代级别最高的政治家披露，在党内有一套不公开的帐目。1999 年 12 月 16 日，科尔在接受德国电视二台采访时，承认自己多年来在接受对党的捐款问题上犯了“错误”。从 1993 年至 1998 年他违背政党捐款法而受理的款项达 150 万到 200 万马克，但他拒绝说出捐款人姓名。

致科尔的告别信

“献金案”一事极大震动了基民盟，使该党长达一年之久几乎无力履行反对党应尽的职能，每天都有新的问题被曝光，足见如果党的主席卷入献金丑闻，会使党陷入多么困难的境地。那段时间里，媒体每天都在寻找新的证据，让人神经紧张。如果今天细读一下女总书记当时的表态，不难看出受内部不稳定因素的驱使，她竭尽一切力量向科尔发起挑战。她承诺，要毫无遗漏地查清献金案，这时全党只关注解决自身的问题。1999 年 12 月 22 日她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的署名文章像一颗炸弹爆炸，这篇文章必将载入基民盟的历史。默克尔的文章彻底摧毁了朔伊伯勒与科尔的关系，她的核心观点是，科尔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党必须学会自己走路，学会自信，在将来即便没有像科尔这样的老战马——他经常喜欢这么称自己，也能与政治对手战斗。我们的党要像青春期的少年一样，离开家走自己的路。”默克尔清楚地提到“科尔承认的这些事”给党带来了损失。针对科尔对捐款人承诺的“誓言”，她写道：“如果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对一件合法的事情信守诺言还可以理解，反之就不可思议了。”默克尔要求自己的党从科尔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再看这篇文章是如何见报的，就更有意思了。默克尔在“献金案”被揭露不久与《法兰克福汇报》商议好要发表一篇文章，但整个过程却是：12 月 21 日默克尔亲自给该报柏林议会编辑部二十多年来一直对基民盟进行报道和评论的卡尔·菲尔德迈耶打电话，说她可以就丑闻写一篇文章，也愿意接受采访。考虑到该报很少全文发表采访文章，菲尔德迈耶同意刊登默克尔的署名文章。文章显然是早就写好的，因为电话刚放下 5 分钟，文章就用传真发来了。这一细节说明，这篇深入分析基民盟历史的文章并不是因偶然事件，更不像有人估计的那样是应《法兰克福汇报》约稿写的，而是总书记发自内心主动写的。写这篇文章时，朔伊伯勒接受过至少 10 万马克捐款的事还未公布于众；而她是知道这件事的，也明白这是件十分损害朔伊伯勒名誉的事。朔伊伯勒事后证实：这篇文章是背着她写的，他“完全不知道”。朔伊伯勒说：“我给默克尔打电话，告诉她我很吃惊，而且对她事先不与我打招呼就发表文章感到诧异不解。”科尔对朔伊伯勒的说法不以为然，他认为：“朔伊伯勒说不知道写文章一事，简直不可思议。”默克尔的文章不仅彻底毁坏了朔伊伯勒与科尔的关系，而且导致老总理科尔开始不懈地向朔伊伯勒进行反击。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两位男士展开了战后德国政治生活中从未有过的阵地战。科尔要为他的政治生存和名誉而斗争，他作为统一总理的形象不能因为“一个错误”——他总是称卷入“献金案”只是一个错误——就永远受到损害，作为当代伟大政治家之一的丰碑上不应有无谓的抓痕。施莱伯对朔伊伯勒的攻击主要发表在《世界报》和《星期日世界报》上，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施莱伯从加拿大传来威胁：他将抖搂出全部细节，主要是针对朔伊伯勒而非针对科尔。施莱伯的态度朔伊伯

勒从 1999 年 12 月科尔曾给他看过的一份施莱伯发来的传真中已得知，其内容都是对朔伊伯勒的指责。朔伊伯勒怀疑，为了在政治上整垮他，科尔和施莱伯狼狈为奸。科尔与朔伊伯勒之间的争斗变得越来越荒诞。通过“凤凰新闻”台对朔伊伯勒的采访，可以看出科尔的自卫战对朔伊伯勒情绪的影响。采访是几周前录制完的，到 2000 年 4 月 7 日才播放，这更提高了它的轰动效应。采访中朔伊伯勒说，几周前他还不可想像，有人会如此频繁地与在加拿大的商人施莱伯通电话，电话都是“从这座大楼里打出去的”——没有明说这里指的是在同一座楼办公的前名誉主席科尔，还是前财务主管布利吉特·鲍迈斯特（或同时指两个人），他得出结论：“所以我说，不管属于什么，也许不是权力之争，也许只是一个诡计，但这确实是一个具有刑事犯罪性质的阴谋诡计。大量的不实之词，不断从虚假信息中寻找的蛛丝马迹，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整垮这个担任德国基民盟主席、同时担任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主席的人。”

默克尔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的文章引发的结果是，此前在联邦德国历史上从没有过两个男人，像科尔和朔伊伯勒这样如此公开和不讲任何形式地解除友谊。相比之下，施罗德和卸下社民党主席职务的拉封丹之间的争斗可谓小巫见大巫。科尔和朔伊伯勒之间充满感情色彩的争战，还把两个对手间的敌意带到了德国图书市场。当科尔听说，朔伊伯勒要把他对“献金案”了解的情况出书发表时，马上加紧出版他的《我的日记：1998~2000》。两个昔日莫逆之交朋友间的争论不再从理智出发，而变成尖锐的感情化大论战。可以说，是默克尔的《法兰克福汇报》文章让两位男子如此愤怒地向对方开战，两人都试图将对方拉下马，但由于他们像被一根脐带连在一起，所以必须相互使劲拉扯。2000 年 1 月 18 日，不在现场的科尔得到联邦基民盟理事会和基民盟主席团的通知，要求他在说出捐款人姓名之前，暂时不担任基民盟名誉主席，而他则在当天宣布辞去基民盟名誉主席一职。基民盟由此处于历史的最低潮。

默克尔公开攻击名誉主席科尔，而在这么重要的问题上竟事先不向党主席朔伊伯勒通报，显然是她经过深思熟虑而违反规则的一次行动，说得严重一些，这是一种不忠实的表现。她得知朔伊伯勒接受施莱伯 10 万马克捐款一事时，外界都还不知道这一消息。朔伊伯勒 1999 年 12 月 2 日在联邦议院否认此事，直到 2000 年 1 月 10 日在德国电视一台的采访中，他才承认接受过捐款。默克尔一定很清楚，在“献金案”问题上朔伊伯勒在联邦议院说了谎，他无法再继续担任基民盟主席。她的不忠出于什么动机？这就是她表白的要在基民盟内建立清白形象的道德立场吗？或者她认识到，朔伊伯勒如果倒台自己也要随之下台？因为按惯例，每一位新任党主席都要寻找自己的总书记。默克尔肯定清楚，她在报上发表的文章对科尔和朔伊伯勒的关系势必造成巨大影响。如果她真是这样考虑的，此后几周内情况的发展也果真如此。当朔伊伯勒 2000 年 1 月 31 日在德国电视一台采访时又一次承认，从院外游说人士施莱伯那里还接受过第二次捐款时，舆论一片哗然。朔伊伯勒与当时的财务主管鲍迈斯特的关系也急剧恶化，二人反目的程度令党内人士吃惊。这时的默克尔没有充当党主席的危机处理人，而是扮演着她自己想要的角色：她越来越清楚地显示自己是惟一不受科尔体系牵制的成员，党在政治上的新开端最有可能从她开始。2000 年 2 月 16 日朔伊伯勒终于在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面前提出辞去党主席和议会党团主席职务，并说了一句十分贴切的话：“基民盟处于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中。”

一段时间里党内几乎没有一个具有凝聚力的中心。在领导层发生危机时，按说可以由名誉主席主持工作，但现在党已没有了名誉主席。如果前名誉主席和党主席打成一团，就要求总书记出面。默克尔抓住了一个幸运的时机，由于“献金案”危机，党内计划召开九次“地区联席会议”，后来这样的联席会议成为联邦一级党领导向基层组织通报政策的手段。参加联席会议的人员组合具有偶然性，所以不能做出对党的领导有约束力的决定，但能形成意见。假如是在州党代会上解释联邦政策，那么就可做出对州一级和联邦一级党的领导有约束力的决议。从政治学角度看，这种联席会议更多的是联邦一级党领导施政的工具，而不是州一级党组织和基层组织表达意愿的场合。可是当“安吉”在第一轮联席会议上不断被基层组织要求作为朔伊伯勒的接班人后，其他对此有兴趣的人就再也没有机会被提名了。有趣的是，党内没有要求她再担任议会党团主席一职的呼声，这说明很多人

虽然相信默克尔在危急时刻能担负起党主席一职，却还难以胜任议会党团繁重的日常工作，这一职务交给了弗里德里希·迈尔茨。

默克尔的第二次婚姻

在基民盟“献金案”骚乱之前，谁也想不到的时刻，默克尔第二次结婚了。某些传统人士早就对过着“未婚同居”生活的女人担任基民盟领导职务嗤之以鼻。“据说现任政府里有一位当部长的基督徒还过着未婚同居的生活”，1993年8月大主教约阿希姆·迈斯内就对《图片报》这样说过。为此默克尔专程去拜见科隆大主教对他解释，“为什么我认为谨慎处理是正确的，因为我已结过一次婚。”作为部长或后来的总书记总被问及未婚的原因，1991年在她成为德梅齐埃的继任当上基民盟联邦副主席之前，《图片报》说她在回答再婚问题时，还大声说“不”：“婚我已结过一次了。”后来她对人们直接或间接谈论她与谁都不了解的量子化学家绍尔的共同生活感到厌烦。有传闻说当时的议会党团主席朔伊伯勒劝过默克尔结婚。1998年12月30日默克尔与绍尔成婚。两个自然科学家在柏林中心区结婚登记处正式登记结婚，据《图片报》报道，双方父母都没出席。新闻界的人惊讶地直揉眼睛，事先无一人知道此事。1999年1月2日《法兰克福汇报》上一则非常不起眼、毫无修饰的广告公布了这一消息（我们结婚了。安格拉·默克尔，约阿希姆·绍尔，柏林，1998年12月。）广告仅有烟盒底座般大小（8.4cm×2.4cm）。

绍尔比默克尔大5岁，1949年生于萨克森州的霍耶斯维尔达，父亲是糕点师。绍尔1967年开始在柏林洪堡大学读书，1972年取得化学硕士学位，1973至1976年在洪堡大学从事科研工作，1974年获得博士，1977年进入科学院。1982年民主德国化学协会授予他弗里德里希·维勒奖，1985年他获得教授资格。

绍尔结过一次婚，1969年他曾与同班女生、一位化学硕士结婚，婚后两人育有二子，他的前妻因长年照顾孩子没有工作，后来才当上教师。当时默克尔有时被邀请到绍尔家做客。绍尔1983年从自己家搬出，1985年离婚。绍尔和默克尔是在科学院物理化学中心研究所时进一步相互熟悉的，《五彩》杂志写道，这对夫妻结为百年之好之际，二人已相识17年之久。绍尔的第一次婚姻是因默克尔而破裂的吗？默克尔对此当然不会回答。绍尔在科学院主要研究量子化学，他曾帮助默克尔修改审阅过1986年1月撰写的博士论文，对此默克尔十分感激。绍尔在专业领域——包括柏林以外都享有盛名，尽管不少人说他“生硬”和“爱炫耀优势”。

一直到两德统一前担任物理化学中心研究所领导的奥尔曼，至今谈起他昔日的同事还热情洋溢：“他在理论化学领域是最有能力的科研人员之一，无论他的知识，还是他的分析能力都算得上出类拔萃。”在科学院他以对现存社会主义持批评态度著称，奥尔曼强调说，当时科学院的民主气氛很浓，“当然也有个别人爱动用党的木槌敲打他人。但在科学院内，与国家不一致的观点是允许说的。”据说，绍尔在施密特当总理的最后阶段参与过关于北约增加军备的辩论，他强调，西方有权迈出这一步。国家安全部门在他的住所装窃听器的事实，就足以说明绍尔和他前妻与民主德国当局的距离。

他经常被科学院委派到布拉格出差，使他有机会在海洛夫斯基研究院与著名的捷克科学家鲁道夫·扎拉德尼克一起从事研究工作。绍尔与默克尔有时在布拉格相见，因为默克尔也经常到扎拉德尼克那里。还是在民主德国时期，即1988至1989年间，绍尔被批准前往卡尔斯鲁厄大学物理化学研究所访问，在莱因哈德·阿尔利希斯教授那里从事过6个月的研究工作。他在这个研究所工作期间，1989年11月4日，东柏林举行了盛大游行集会，几十万人涌向亚利山大广场——一部分人还抱着对社会主义进行革命性更新的思想——要求新闻、言论和集会自由以及自由选举，有26位发言人登台，其中有作家施特凡·海姆和克利斯塔·沃尔夫。这时候奥尔曼正好也在卡尔斯鲁厄出差，他与阿尔利希斯、绍尔和默克尔同坐在一张桌上吃晚饭。由于民主德国发生的事件，奥尔曼必须中止在卡尔斯鲁厄的逗留，而绍尔和默克尔则还能继续在这里呆一段时间。那是默克尔的第二次西德之行。两德统一不久，绍尔就获得机会前往美国：1990年至91年他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地耶哥化学工业技术公司担任技术副经理，这期间默克尔去看望过他。1992年绍尔回到柏林洪堡大学担

任马普协会资助的量子化学研究组负责人。自 1993 年以来绍尔是洪堡大学物理和理论化学教授，重点研究量子化学，负责的项目有：量子化学的初始计算，不均匀催化剂（沸石，氧化物）。除了讲授规定内容以外，他还致力于量子力学、物理化学的固体表面催化剂研究，用计算机支持的理论化学和固体及表面的量子力学计算。他属于世界范围很受欢迎的善于演讲的科学家，从维也纳化学-物理协会到佛罗里达的“赛尼伯尔量子理论研讨会”到处都有他的足迹。他成功地从德国科学研究会为洪堡大学争取到 450 万马克的资金，他也是洪堡大学“结构，动力和过渡金属氧化-聚集反应”特殊研究项目的发言人。1994 年他被选入德国科学研究会计算机委员会。

默克尔什么时候开始与在家被称为“阿希姆”的绍尔一起生活，不得而知。引人注意的是绍尔/默克尔夫妇只有很少几张合影照片，最熟悉的是一年一度的拜罗伊特瓦格纳艺术节上或偶尔在萨尔斯堡的合影。默克尔过去的一位同事回忆说，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搞“拜罗伊特的票”，因为她丈夫想去艺术节。从那以后默克尔也成了“瓦格纳迷”。绍尔则在民主德国时期就经常与前妻光顾柏林国家歌剧院。即使在选举之夜绍尔在柏林的基民盟总部也总是远离公众。夫妇二人只有很少几件难以避开的私事见诸报端，如两人在哪里度假，两人都喜欢在山里徒步旅行等。默克尔说“徒步旅行需要体力，因此不可能再一刻不停地去思考政治，在山里远足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有几个小时，打手机也找不到我们了。”绍尔/默克尔经常远足的地方是瑞士彭特希纳的恩嘎丁山，二人也公布过“美好加利福尼亚之行”的消息。默克尔说：“到离家远的地方度假，可以逃避烦事。在度假的四周里我能做到彻底放松。”她还透露，她很喜欢给丈夫做饭：“我特别拿手的菜是，一锅烩、炸猪排，各种方法烹调的鱼肴。我还爱烤蛋糕，谁都说好吃。”她多次接受过女摄影师克贝尔的采访，1993 年她说：“这是我去年最大的进步，我做了两次李子蛋糕，两次都成功！只是蛋糕底有些发白，因为烤得不够火候。我终于烤了李子蛋糕，这是转折后，稳固我生活的一部分。”据亲戚回忆，绍尔这位糕点师的儿子也很会烤蛋糕，而且很着迷。2001 年除夕之夜，默克尔在家烤了一只鹅，配有红菜和盐煮土豆。即便在平时这位基民盟主席也喜欢口味重的饭菜：“我做肉卷也很拿手，还爱做土豆汤和鸡汁汤。”

夫妇二人很重视去滕普林附近乌克马克大自然深处的小屋“达查”小住。默克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还是霍恩瓦尔德这个只有 60 个住户小地方的钓鱼协会成员。在庆祝钓鱼协会成立 50 周年时她的一次讲话记录中这样写道：“比如我，虽然从没自己钓上过一条鱼，却是民主德国钓鱼协会成员，因为在我生活过的乌克马克，只有钓鱼协会成员才允许在附近湖里游船。”钓鱼，捕鱼，冬季钓鱼节她也组织过一、二次。不管怎么说，夫妇二人都努力做到尽量不被外界发觉。今后外界也不用指望看到二人在游泳池内戏水的照片，也不会有做给媒体看的爱抚家畜的场面。默克尔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婚姻都没有孩子，2002 年她说：“我并不是不要孩子，只是没成功。从政时我已经 35 岁，也就不再提要孩子的事了。”还有一个因素，也许是绍尔不想再一次当父亲。默克尔 2000 年时说过，“也许到 70 岁时我会后悔没有孙子，我也说不好。”绍尔与前妻的两个儿子在他们夫妻分手后和母亲一起生活，有时绍尔/默克尔家来客人，两个孩子也来帮忙得到些零花钱。绍尔/默克尔的家在柏林中心区，离贝加蒙博物馆很近，离前总统魏泽克的办公室只几米之遥。在柏林有些人嘲笑默克尔/绍尔（或绍尔/默克尔）夫妇对环境安静的过分苛求，尤其是绍尔。亲友回忆，当时绍尔的两个儿子在家时，必须穿着“毛线织的厚袜子”在地上走，以免出声音。2001 年 8 月 16 日，他住所对面的贝加蒙博物馆外，第二次露天上演完克莱斯特的话剧“阿姆菲特利奥”之后，绍尔向中心区环保局状告喧哗声音过大，结果演出组织者被警告，并要求以后演出时要测试噪音量。

凡认识绍尔的人都认为这位自然科学教授非常“政治”。有“杰出头脑”之称的绍尔可能对默克尔所起的政治影响比外界了解和想像的要多得多。对此默克尔从不否认：“有人说，我丈夫作为政治顾问一点不起作用，这根本不符合事实。”有人观察到，在家里，在最紧密的私人圈内，绍尔总是起着主导作用。在专业领域养成的自信，似乎不可能使他听命于一个女子。有报道说，自民党领袖古伊多·维斯特维勒曾有过一次不可原谅的失礼称呼，他在向这位教授问候时说，“您好，默克尔先生”，“绍尔听到这样的称呼十分生气。”《五彩》杂志曾这样报道。在德国，扮演一个知名并有影响的女政治家之夫的角色是很不寻常的。绍尔竭尽全力，不使自己沦为戴尼斯·撒切尔，那个常

被人嘲笑的著名英国首相铁娘子的丈夫所处的境地。默克尔 2000 年在一本协会的杂志上做了一个惊人的表态：如果她丈夫在南非得到一个教授职位或研究课题，“她将义无反顾地跟着去，把政治撂在一边”。据说这是两个人早就商量好的。真会这样吗？一个德国教授几乎不可能为国外的研究课题离开他稳固的教席。

[禁书网 大陆直连 https://goo.gl/C6xxGf](https://goo.gl/C6xxGf) 看 [禁书禁闻禁文禁网禁片禁歌禁曲](#)

踏着阿登纳和科尔的足迹

“统帅女士，请您接管！”《明星》杂志做了这样一个标题。尽管长期以来该杂志读者所熟悉的是一个带着顺从微笑的东部姑娘，可她有可能是基民盟最后的拯救者。要是在平时，《明星》杂志的这种标题在基民盟一定会起反作用。她是被媒体捧起来的这点，得到了一些有经验的观察家的证实。选举专家、基民盟多年的联邦干事长彼得·拉顿斯基说：“默克尔自从就任党主席以后，对媒体的重视超过对党的重视，是媒体让她当上主席的，这一致胜法宝她牢记在心。”科尔与朔伊伯勒之间的毁灭性争战为默克尔铺平了道路。在争当基民盟主席的道路上只有两个人有可能与她竞争，一位是正处于州议会选举中的北威州党主席吕特格斯，另一位是过去的国防部长吕尔，但吕尔受基民盟“献金案”影响在石荷州选举失利，而吕特格斯正面临北威州基民盟州主席的竞选，也不敢再冒别的风险。对默克尔作为候选人，基民盟的巨头们并不欢欣鼓舞，他们中的大部分在朔伊伯勒退出后都想再等等，直到火药味散了以后再说。第一个表示赞成默克尔的是下萨克森州在野党领导人克里斯蒂安·乌尔夫。2000 年 2 月 27 日，石荷州选举之前的一个星期五，吕尔、迈尔茨和施托伊伯聚集在吕贝克市政厅的地下餐厅，商议着最好由一位州长出任基民盟党主席。他们认为可以选举萨克森州州长比登科普夫在短期内担任过渡党主席，出于类似考虑，他们认为图林根州州长福格尔也合适（或许是福格尔的个人意愿）。当福格尔感觉自己没有希望时，便称：“我不主张让任何人做过过渡主席。”在地区联席会议上，同意默克尔做候选人的呼声十分高涨，其他人选问题根本没有再进行过讨论。这样默克尔在 2000 年 4 月 10 日埃森联邦基民盟党代会上获得 935 张中的 897 张赞成票，当选为基民盟党主席，这是第一次由一位女性担任大党的主席。她的前辈中许多人都是很早就投身于政治，是与基民盟党有机地一起成长起来的，而默克尔的党龄只有十年多一点。“默克尔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阻力，有时大张旗鼓，有时悄然无声。”菲尔德迈耶在《法兰克福汇报》一篇文章中这样总结了默克尔走过的路。时事评论员戴特灵在《日报》提出了默克尔究竟是“清除废墟的妇女还是救世主”的问题，并预言，随着默克尔的当选，“科尔的权力正在毁掉，科尔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

根据默克尔的提名，明斯特地区联邦议员鲁普莱希特·波伦茨以 781 票当选为总书记，一直担任副主席的吕尔、安内特·沙万、乌尔夫继续留任，也曾担任副主席的前部长布吕姆不再任职，由吕特格斯接替。根据默克尔的建议，原德意志银行监事会成员乌利希·卡特里里出任财务主管，事后证明这个人选是一个错误决定，因为他不具备政治经验，他在位不长的时间里，一直不了解党的本质工作是什么。默克尔的前任朔伊伯勒仍为七名主席团成员之一。在埃森党代会上，默克尔对缺席的前前任科尔表示问候，对于科尔来说，这一刻显然十分沉重，这是 40 年以来他第一次远离党的代表大会。“我们知道，最近几周和几个月对他更是沉重有加，因为大家都清楚，为了党的可信度，在澄清献金丑闻的事情上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其他选择。”

困难的起步和阻力

连默克尔自己也不敢说新的启程是顺利的。其中一个因素是，2000 年 5 月 14 日异常重要的北威州议会选举中基民盟只得到 37% 的选票（与 1995 年相比略微减少 0.7%），因而不能与以莫勒曼为首的自民党联合执政，尽管自民党得票率达 9.8%，增加了 5.8%。社民党的选票虽然也有一定幅度的减少，但仍实现了红绿联合执政。参加投票人数从 64% 降到 56.7%，很可能是因为科尔“献金案”造成的影响依然存在，使一部分基民盟的忠实选民放弃参加投票。默克尔在埃森党代会上取得的胜利远没有给选举带来安慰作用。

此外，默克尔当上主席还不足百天，联盟党在税收改革问题上低估了联邦总理施罗德和财政部长艾歇尔的技巧策略，出现了最大的偏差。至此联盟党内原有的乐观主义气氛不复存在。在联邦参议院内，联盟党执政的州席位虽然占多数，但一些州被联邦政府收买导致税收改革方案通过，《时代》周刊将整个过程讥讽为“联邦制的贿赂闹剧”。施罗德和艾歇尔向基民盟新参与执政的联邦州（不莱梅、柏林、勃兰登堡州）作了专门承诺，致使这些州从拒绝税收改革的立场转变为支持的态度。在由社民党/民社党执政的梅前州和以社民党/自民党联合执政的莱法州，尽管存在不少顾虑，也对税收改革表示了同意。显然联邦基民盟领导、议会党团领导、以及在税收改革上为“联盟党执政州”说话的巴伐利亚州长施托伊伯，都没有估计到政府在财政上的诱惑使个别州改变了原来的立场。几个特别依赖联邦财政支持的州，尤其是柏林（市长迪普根）和勃兰登堡州（副州长顺博恩），更是难以转回到基民盟的立场，（在不莱梅，作为联合执政一方的基民盟早就表示会让步）。正是在税收改革这种基本决策方面，反对党在策略上采取什么特殊方式显得十分重要。如果改革取得成就，功劳将归于政府；如果改革失败，反对党就有“搞封锁政策”之嫌。加之艾歇尔的方案基本符合魏格尔 1995 年和 1997 年提出的改革计划，因此反对党几乎找不到令人信服的拒绝理由，经济界对减税政策也非常欢迎。

不久暴露了默克尔与议会党团主席迈尔茨的关系已恶化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其中联盟党在战略分析上的重大失误也是一个原因。本来联盟党的战略是，用联邦参议院内的表决失败给政府点颜色看看，但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共同组成的调解委员会于 2000 年 7 月 14 日联邦参议院表决前已作出决议。默克尔作为党主席，在税收改革问题上能起的作用很有限，因为政策的实际执行由议会党团主席负责，内容上在州一级进行协调是巴伐利亚州长施托伊伯的事。默克尔更倾向采取与政府合作的战略，但如果基社盟持强烈反对态度、联邦议会党团又进行阻挠，党主席也无力抗拒。在这件事上默克尔曾对迈尔茨有过很不客气的训斥，这使迈尔茨怒火中烧。后来默克尔还责备说，如果我们想取得成果，商议好的事就要坚持下去。针对迈尔茨采取的策略和行动默克尔还提出警告，“基民盟在今后应特别注意正确估价自己的力量，不要再因为使错了劲而受伤”。默克尔想以此摆脱对税改问题负有的责任，但她的领导能力明显受到影响。勃兰登堡州的顺博恩在《世界报》上撰文指出：新的基民盟领导“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权威不可能从天而降，而要靠努力争取”。2003 年还是在税收改革问题上联盟党内部产生了严重的矛盾。

早在 2000 年 10 月，默克尔就与上任 5 个月的总书记波伦茨分手，默克尔事先没打招呼，就把波伦茨叫到办公室向他宣布了辞退决定。波伦茨感到很吃惊但还是接受了这个决定。辞职后波伦茨感到轻松许多，他在总书记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也没有想要像海内·盖斯勒那样引发人们的意见分歧。正因为他不擅长论战，他在选区明斯特的得票率反倒遥遥领先，选民们总是把第一张选票投给他，第二张选票投给党。当初默克尔请他出任总书记时，他就说过，他不是那种攻击类型的人。一开始默克尔对他说的这些话并没在意。其实默克尔也并不欣赏“盖斯勒类型”的人，而想要一个在实质问题上与她完全保持一致、又不太影响到她个人风格的人。另外，由于她与北威州州党主席吕特格斯关系一般，因此她想从北威州找一个合适的人当总书记，这样身边就有了一个监督着北威州这个基民盟最大的州一级党组织的人。“当默克尔女士请我承担这一重要任务时，正值没人想沾基民盟边的时候，我不愿让人说我临阵逃脱。”波伦茨今天如是说。默克尔由于本人担任过总书记，了解这一职务具有的实权，所以她想党内找一个绝对忠实可靠的人作为自己的第一同事。在她升为党主席时，把当总书记时的全套秘书处班子一起带走了，波伦茨上任后不得不十分吃力地重新组建整个总书记的秘书处系统。对政治做秀波伦茨显然很陌生，这位为人处事受到许多柏林记者爱戴的波伦茨，可以说是从高高在上的总书记位置上体面地离去。女记者苏萨娜·赫尔这样评价波伦茨：“善于思考的波伦茨不是好斗的人，不会在各种形式的政治做秀中赢得什么，但相比之下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总书记。”波伦茨说他至今与默克尔关系很好，他并没有生默克尔的气。波伦茨在当总书记时就是德国电视二台理事会成员，他被解除基民盟总书记职务以后，被一致推选为德国电视二台理事会主席。默克尔十分赞赏波伦茨能以忠诚的态度对待被解除总书记一事。劳伦茨·迈尔和人们的烦愁

默克尔动员波伦茨退位正值巴符州州议会选举之前，基民盟准备在 2000 年 11 月 20 日在斯图加特召开党的联邦委员会会议。只有这种“小型党代会”可以临时委任总书记并让其工作到下一届联邦党代会召开。默克尔将目光瞄准劳伦茨·迈尔作波伦茨的接班人，迈尔当时正在杜塞尔多夫担任北威州副州长，此前他曾担任过北威州州议会党团主席，但在吕特格斯成了北威州反对党领袖后，迈尔必须让位于他。在斯图加特会议上迈尔获得 100 票中的 99 票。默克尔又一次把从北威州地方党组织选人作为挑选总书记的标准。默克尔人选的意外之处在于，她不想让一个有实力的联邦政治家坐到这个位置上。生于帕德博恩附近萨尔茨寇特的迈尔，上任后开始的几周内非常活跃，进攻性很强。这位北威州人在斯图加特开会时强有力的发言引人注目，显示出他与带着鲜花辞职的前任波伦茨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迈尔呼吁“必须解除人们的忧愁”，他形容红绿联合政府在“欺负百姓”。他强调，“我们不必跟着酒馆里的那些人说一样的话，但我们必须让这些人理解我们的话”。为了使党内朋友兴奋起来，他最后说道：“老百姓可不愿意总是看到一些愁眉苦脸的人。”这句名言十分适合于他做总书记时期的个人生活作风。2000 年 10 月 23 日迈尔上任做自我介绍时，针对党主席默克尔说的一句话着实令在座的人目瞪口呆：“您可招架不住第二次失策了。”在马上道过歉后，他带着任命后的满心喜悦试图把胳膊搭在党主席的肩膀上，但向来与人保持身体距离的默克尔不喜欢这种举动，就像不喜欢别人议论她的外观一样。迈尔在位四年，他是第一位因丑闻下台的基民盟总书记。他因领取曾供职过的德国电力公司的佣金和补贴而于 2004 年 12 月 22 日下台。

迈尔很快就感觉到，在“联邦甲级队”搞政治比在州一级队难多了，他在州里任职时可以说是驾轻就熟。当上总书记的第一步，他本想让基民盟与民社党解除那种“扭曲的关系”，但结果却在基民盟党内引起愤怒，他感到自己被误解，以报道失误为由驳回了对他的所有指责。迈尔很快懂得，作为总书记每说一句话都须字斟句酌。他曾因一则标语词选择不当，引起舆论一片哗然。那是 2001 年 1 月 23 日，他为基民盟设计了一幅风格类似通缉令的标语，标语上指责联邦总理施罗德搞了“一系列养老金骗局”，这不但惹恼了联合执政的红绿政府，也遭致本党和自民党的谴责。在一片反对声起之后，特别是来自正酝酿议会选举的巴符州 1 的抗议，这条标语被迫在挂出的第二天被收回。迈尔茨当时说：迈尔搞过一系列好的活动，“但这次有些过头了，然而一位总书记犯一次错误也是允许的”。标语事件后，迈尔的好斗兴头大为收敛。尽管迈尔承担了标语事件的责任，但真正的始作俑者却是默克尔。

发明新的社会经济

作为新上任的基民盟主席，默克尔不久就遭到指责，说她缺乏鲜明的施政特点。默克尔正想成为基民盟历史上的改革者，所以她 2000 年 11 月 18 日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的社会——关于新社会市场经济的必要性”的文章，提出了“新社会市场经济”的概念。她认为，在社会市场经济必要的转型过程中存在的最大问题：一是雇主与员工之间的劳动关系应适合当前全球化的要求；二是社会保障体系须建立在平衡的财政基础之上；三是德国市场经济和社会政治的视角应超越本民族的范围，以能够在紧密相连的世界经济中长久生存。文章指出：“社会市场经济解决了工业社会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但劳动性质在知识社会发生了变化，故要求对劳资双方伙伴关系的准则进行变更。德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仅仅是将附加工资与劳动成本费用相挂钩，因此有必要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面对新经济的国际特性，我们除了要考虑建立本国的还应考虑建立国际的行为准则，本民族的规定在许多方面显然已经不够用了。”

在具体解释其立场时她主张，企业员工可以选择股份形式更多地参与企业生产资本；扩大交通、能源、电讯领域的私有化程度；开发更加自由的劳动力市场。默克尔还主张把自愿的、收支平衡的预防保险作为法律养老保险的补充支柱，主张拓展医疗领域各种保险选择的可能，但她没有进一步细化这些想法实施的可能性和财力保障的可能性。她要求加大对德国教育系统的投入，对社会弱势家庭提供补贴。但默克尔的设想仍缺乏如何在财政上得以实现的具体措施。这里有时候让人感觉，施罗德——布莱尔于 1999 年签署的文件对默克尔也有影响，她说：“在制定财政政策、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时，我们需要持续性，只有这样，今后几代人才能过上与我们相比更理想的生活”。默

克尔坚持认为，她的提法既不是布莱尔代表的“第三条道路”方案，也不是 1998 年施罗德在大选之年为解决德国福利国家的现实问题而提出的“新中间道路”纲领。虽然默克尔的论据是出自政党策略的一种巧妙选择，但在这个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草案还处于粗线条框架的时候，人们就会提出疑问，2000 年 11 月默克尔何以确信，“只有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让时代的变化为人服务的有效制度”。默克尔把联邦德国民众熟悉并极为崇尚的“社会市场经济”概念改称为“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做法从传媒策略上看也不巧妙，因为“新”并不一定让人直接感到是好的东西或有支持价值，也可能会唤起威胁和恐惧感。在党内，有人担心默克尔要抛弃社会市场经济这个联邦德国国家理念的基本原则和基民盟的纲领，并以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名义，从内容上重新制定基民盟的经济和社会福利政策。在接下来的 2001 年，为了不受任何干扰维护这一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案，默克尔成立了以她为首的基民盟理事委员会。在 2002 年联邦大选前一年，即 2001 年 8 月 27 日，内容广泛的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讨论稿出笼。讨论稿在公布 3 个月后没做什么原则性修改，于 2001 年 12 月基民盟德累斯顿党代会上被通过，并正式作为基民盟纲领的一部分，但默克尔未能在党代会准备阶段使基民盟内部一致同意基民盟理事委员会的这个讨论稿。从巴伐利亚州姊妹党基社盟那里，也传来担心传统的社会市场经济被拍卖的批评声。基社盟秘书长托马斯·戈佩尔为了缓和姊妹党之间的关系解释说，默克尔负责的这个讨论稿，目的不是发明新的市场经济，恰恰相反，是在社会市场经济基本原则上新增加新的、具有现实意义的元素，这个讨论稿的正确表述应为“新补充的社会市场经济”。

2001 年 3 月 25 日巴符州和莱法州的地方选举并没给联邦基民盟带来突破性进展。虽然基民盟在巴符州取得了得票率 44.8% 的好成绩，增长了 3.5%，这是“献金案”丑闻以来基民盟难得的进帐，但实际上成绩主要归功于备受爱戴和信任的州长艾尔温·托伊费尔个人。莱法州的选举也不能使人感到对联邦基民盟有所推动。政绩平平、在日常工作中主张强硬处事哲学的基民盟候选人克里斯多夫·博尔，与受公众欢迎、潇洒开放的州长库尔德·贝克（社民党）相比，在参选人数减少的情况下显得大为逊色。这个昔日基民盟老巢、科尔曾担任领导多年的莱法州，基民盟得票率仅为 35.3%（1996 年：38.7%）。几个月后，2001 年 6 月 16 日，迪普根及其柏林基民盟由于社民党、绿党和民社党提出的不信任案而退出柏林市政府，新的选举定于 2001 年 10 月 21 日举行。在党内酝酿参选柏林议会候选人时，默克尔再次受挫，她经过再三考虑正式提名朔伊伯勒为候选人，却因为施莱伯“献金案”问题遭到柏林州基民盟的反对。默克尔本想将朔伊伯勒调到柏林市工作，使他在联邦一级的政治舞台上再也无法捣乱。同时默克尔也知道，巴登人朔伊伯勒在联邦共和国这个最大的地方选举中是一个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另外还有一个人阻挠了默克尔如意算盘的实现——这就是科尔。科尔在幕后操纵，使柏林企业家弗兰克·施泰弗成了候选人，从而阻止了朔伊伯勒的提名。2001 年 10 月 21 日，基民盟在柏林的选举减少了 17 个百分点，降至 23.8%，这一毁灭性的打击对默克尔来说真是祸不单行。

总理候选人

在其他方面 2001 年对于默克尔来说也不是政治上值得欢呼的一年。她作为总理候选人的问题，成了所有决策中都离不开的话题。当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主席迈尔茨 2001 年 2 月 1 日表示，除了默克尔和施托伊伯以外他也可能作为总理候选人（议会党团主席作为这一候选人是很自然的）时，党内人士都感到不知所措。紧接着，联盟党在 2001 年 5 月 11 日联邦参议院中再次受挫，像税收改革一样，红绿政府借助社民党/基民盟联合执政的州，如柏林和勃兰登堡州一级参议院的力量，通过了养老金改革方案。默克尔试图强调与联邦政府完全不同的立场，2001 年 5 月 10 日基民盟/基社盟共同提出一个移民草案；2001 年 6 月 7 日，基民盟作为第一个大党通过了萨尔州长彼得·米勒起草的外国人政策草案；2001 年 8 月 27 日基民盟最高领导层批准了前述“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草案。

联邦议院有关德国是否出兵马其顿的一次表决使基民盟争取获得更佳形象、获得对公众更有说服力成果的努力半途而废。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族武装部队与当地安全部队之间发生武力冲突，欧盟和欧安组织进行调解之后这一地区才开始进入和平进程。2001 年 8 月 29 日联盟党议会党团出现

分歧：68 名议员违背联盟党领导的意愿拒绝同意对马其顿进行武装干预，尽管议会党团主席迈尔茨与默克尔同心协力阻止，但这些议员并没有改变投票立场。默克尔还背上了致使意见不一的罪名，因为默克尔接受联邦总理的邀请参加了高层领导人会谈，对此议会党团强烈批评默克尔干预议会党团事务。报纸上提出了“谁还支持默克尔？”的问题，迈尔茨作为议会党团主席越来越自信地表示：“议会党团的主要作用是帮助党处理具体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议会党团是职权部门，是全党的发动机。”

只要 2002 年联邦大选的总理候选人不定下来，联盟党内就会对此争论不休。党主席默克尔在 2001 年 10 月 22 日瓦尔斯罗德一次党的地方会议上对党内批评她的人进行过威胁，并在 2001 年 11 月 10 日鲁斯特的巴伐利亚州党代会上发表了一番带有火药味的讲话，默克尔在这里进一步强调了她的领导权意识，但这些举动对于局面的好转无济于事。可以认为，在那几个月里党主席面对党的基层组织和议会党团的大多数表现得不够高明，对此媒体也有报道。基民盟一些重量级人物看到他们从一开始就对默克尔产生的怀疑得到了各方证实。迈尔茨与默克尔日益尖锐的矛盾，虽然对迈尔茨不利，但对默克尔更不利，她作为总理候选人本应抓住的信任正在消失。

企图政变之前的早餐

基民盟/基社盟为 2002 年 9 月 22 日联邦大选共同推举总理候选人的过程就像一部政治恐怖电影。大家一开始都知道，默克尔争当总理候选人，而这场角逐中另一个不为人熟悉的竞争对手，是巴伐利亚州长施托伊伯。长期以来他一直暗示拒绝做候选人。1999 年 1 月 16 日，在解除魏格尔多年担任巴伐利亚州基社盟党主席职务的那次党代会上，施托伊伯宣布要争做总理候选人，但他当时说这个问题不急，他曾用足球比赛的语言表述：这场比赛要到 2002 年才开哨，在这种问题上比赛结束前的几分钟才是关键。在后来几个月里，施托伊伯与当时的基社盟秘书长戈佩尔反复表示，要到 2002 年联邦大选前几个月才会做出最后人选决定。施托伊伯这样做主要出于以下两个考虑：一是联盟党内相传，施罗德 1998 年大选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社民党在大选前约半年才提名施罗德为总理候选人，致使联盟党没有足够的时间“搅黄”施罗德的候选人资格，所以联盟党政治家越早被提名为候选人，在今天新闻自由的大环境下越要冒着“被搅局”的危险；二是基社盟出于私利的策略，认为联盟党共同提名的候选人公布越晚，越能保证基社盟有更大的影响。施托伊伯不愿过早被提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自己也不清楚，他准备做什么。政治家们通常都是不到最后一刻不会对哪种可能性表态，特别是对那些由媒体搞出的民意测验倾向的候选人更持这种态度。巴伐利亚州几个重要政治家都劝施托伊伯尽快确定候选人资格，因为一旦施托伊伯当选总理，巴伐利亚州的权力分配就要重新洗牌，几名准备接州长班的人业已摩拳擦掌。施托伊伯早就预料到这些因素，特别是在自己的接班人问题上他不容别人与他分庭抗礼。

到 2000 年 11 月的时候，施托伊伯还坚决否认要做联盟党的总理候选人：“你们知道我不想当这个候选人，因为我是州长，如果我 2003 年继续连任，我还会在州里呆一段时间。”因此各方传出的消息，包括基民盟，都说候选人将在 2002 年春季才决定。2001 年 10 月 12~13 日施托伊伯在纽伦堡基社盟党代会上以 96.6% 的得票率当选为基社盟州主席，这次会上关于施托伊伯是否做候选人的意图仍不明朗。他的基民盟同事默克尔作为嘉宾应邀出席此次基社盟党代会，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甚至可以说受到不友好的礼遇。2001 年 10 月 12 日基社盟秘书长戈佩尔接受西南电台采访时说，默克尔的问题“不在于她没有足够的能力，而在于她的周围没有凝聚一批人”。当基社盟表现出协调一致的信心时，默克尔却没能力把基民盟领导层的政治家团结在自己周围。一部分人在观望着这盘散沙如何发展。科尔在任时的政府发言人弗里德海姆·奥斯特评价默克尔不具备强有力的特性。一些议员已经试探着劝默克尔辞职，另有议员认为一个州的州长当总理候选人要比一个没有政府公职的党主席更有利。其实默克尔曾做过 8 年联邦部长，可此时这段经历也不再起作用。2001 年 10 月基民盟在柏林议会选举中的惨败，更使候选人提名的时间无法确定。要求联盟两党迅速做出决定的呼声日趋强烈。

正当候选人问题处于不明朗状态时，狡猾的格罗斯掏出一张牌，这位联邦议会基社盟州小组主席提议，除了默克尔和施托伊伯，朔伊伯勒也可做总理候选人：“我认为可以考虑朔伊伯勒，但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参选。”柏林的记者们都认为，格罗斯的想法只有得到施托伊伯的首肯才会说出来，因此就开始了以“鹬蚌相争，……”为主题的讨论。一向友善报道朔伊伯勒的海里伯特·普兰特在《南德意志报》上写道：“施托伊伯的出路是朔伊伯勒。”格罗斯提议朔伊伯勒担任候选人问题时，正值检察院刚中止对朔伊伯勒围绕商人施莱伯捐款 10 万马克一事提供不实证词而进行的调查。朔伊伯勒本人在回答如何看待被提名为候选人的问题时说：“这不算最恶劣的侮辱。”了解朔伊伯勒这种冷幽默的人，能品出他的回答中隐含着内心对被提名为候选人的满足感。至于是否准备参加竞选，他既不表示肯定，也不表示否定，但不管怎样，格罗斯对他的提名使他感到自己受到尊重。加之巴符州州议会的基民盟议会党团主席君特·沃伊廷厄也认为朔伊伯勒是合适人选。种种迹象表明，朔伊伯勒的救助部队都赶来帮忙了，可是基社盟秘书长戈佩尔声明，格罗斯的意见不代表基社盟，“他至多能代表议会里的基社盟州小组”。实际上格罗斯走了巧妙的一招棋，其用意是最终动员施托伊伯出任总理候选人，同时他想用基民盟内部的两个候选人提名削弱默克尔的力量。

他到底干还是不干？在以后几周里，关于施托伊伯真正意向的讨论扩展开来，是他必须做出决定的时候了。首先是一些州长，他们均公开支持巴伐利亚州长参选。托伊费尔领导的巴符州基民盟和当时的总书记弗尔克·考德尔早就为施托伊伯竞选进行宣传鼓动。公开的权力之争并没有反映在 2001 年 12 月初基民盟德累斯顿党代会上。《新苏黎士报》写道，这次党代会弥漫着一种怪现象：导演不愿意让大家就 2002 年谁与施罗德竞选问题进行辩论。会上公开讨论的题目对于党和公众都没有任何触动，党代会上当然也开展了多次有关问题的对话，默克尔对第一天的会议情况感到满意。

《南德意志报》标题为“她还是很行的”文章写道，默克尔使德累斯顿会议的代表们着迷地鼓掌。第二天施托伊伯的祝词就像一封求职书，也掌声不断。表面上看，候选人问题在党代会上不是主题——按说这极不正常，因为联邦党代会是基民盟最高一级党组织召开的会议，而此次上千名出席会议的代表在候选人的问题上只扮演了跑龙套的角色。直到党代会结束以后，关于候选人问题的辩论才激烈展开。此时施托伊伯也向联盟党其他高层领导人表示准备接受候选人提名。但他不愿冒风险，只有当他确信所有州长——通常这些州长也是基民盟州主席，一致支持他时，他才准备宣布参加竞选。

萨尔州长米勒在一次与记者进行的背景谈话时表示，许多基民盟领导人都想劝默克尔放弃争当候选人，这话被捅了出来，接下来的几天里这次谈话内容得到证实。默克尔给米勒打电话大声谴责他，并向外界公布了这一指责，让人觉得米勒是一个不忠诚、不可靠的政治家，但后来他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当时联邦议会党团副主席沃尔夫冈·博斯巴赫说，联盟党应该高兴“同时有两个合适的候选人”。关于政变的说法他反驳道：“这是无稽之谈，如果米勒和其他人毫不隐晦地认为施托伊伯是更合适的候选人，这就不是针对默克尔的政变，这是一种明确的态度，支持最有可能成功的候选人参加联邦大选。”很明显，这些政治家在联邦党代会上对默克尔采取了一致的策略。虽然议会党团内部的意见越来越倾向施托伊伯，但默克尔不为所动，她的策略显然是想等待，施托伊伯也许会屈服，因为施托伊伯一直拒绝公开对此问题表态。默克尔令人难以置信的坚韧态度，在很长时间内让人怀疑施托伊伯是否会真地参选。“我准备当总理候选人”，2002 年 1 月 6 日默克尔在《星期日世界报》上向读者这样透露，她当然希望借此促使施托伊伯放弃与其竞争。施托伊伯总想让别人端着银盘子把候选人资格送到手里，默克尔打破了他的如意算盘。

基民盟主席团和基民盟联邦理事会在 2002 年 1 月 11 日马格德堡“男人客栈”饭店开会，与会者强烈要求做出有关总理候选人的决定。首先是州长们，从科赫到托伊费尔，甚至乌尔夫和副州长顺博恩都要求原则上做出支持施托伊伯为候选人的决定。这样事态的发展一下子比以前快多了。另外一个重要信号是，一直反感默克尔的黑森州州长科赫，为了赶来参加会议，中断了早已计划好的休假。毫无疑问，这几个人的行动很像在针对默克尔搞政变。党内高层只有少数人仍坚持让自己的基民盟党主席作为候选人，而不可一世的联邦州诸侯们——北威州反对党领袖吕特格斯除外，都同意施托伊伯做总理候选人。这个政变是早已计划好的，对此默克尔心里很清楚。她不能再坚持

“闭上眼睛坚持到底”的战略，她在其他理事会成员不知不晓的情况下采取了紧急刹车。她与施托伊伯商定，第二天前往巴伐利亚的沃尔夫拉特豪森，在施托伊伯的私人官邸与其共进早餐。施托伊伯对这个突然来访显得有些激动。默克尔于前一天晚上乘汉萨公司航班从杜塞尔多夫飞往慕尼黑，以保证第二天一早赶到施托伊伯家中。默克尔放弃争当候选人的打算使茫然的巴伐利亚人施托伊伯感到十分惊讶。随后默克尔又赶回马格德堡参加基民盟年会，并向与会人宣布：“我一直说，联盟党的候选人应让最有希望获胜的人担当，而最有希望的标准是什么呢？除了被党内推荐和本人意愿之外，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条是团结一致。我相信，基民盟会与总理候选人施托伊伯建立高度的团结一致。”在会议的第二天施托伊伯也短暂地露了一下面。

默克尔在最后一刻以著名的沃尔夫拉特豪森早餐挽救了自己。如果不是默克尔自己提出，而是党违背默克尔的意愿，推举施托伊伯成为总理候选人，党内就会形成对主席的不信任案，败在自己阵营的基民盟主席势必辞职。经过这次早餐，默克尔又争取到了一定的回旋余地，大多数人都为能避免了一次痛苦的决择而高兴。在一定意义上默克尔重复了科尔的做法：当初这位莱法州州长以48.6%的支持率成为1976年联邦大选的基民盟总理候选人，这也是基民盟历史上出现的第二好结果，但时任巴伐利亚州州长约瑟夫·施特劳斯却对基民盟候选人的反映不积极。在接下来的1980年选举时，科尔放弃自己的候选人机会，而让下萨克森州州长埃恩斯特·阿尔布莱希特作为联盟党内部与施特劳斯争夺候选人的代表，最后阿尔布莱希特在基民盟/基社盟联邦议会党团表决中失败。可以预料，如果科尔与施特劳斯在候选人问题上一争高低，一旦失利，就不可能再继续担任基民盟主席。施特劳斯在1980年的联邦大选中遭到毁灭性失败，科尔前面走的这一步为后来竞争总理铺平了道路。

“联盟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兴旺”

“男人客栈”会议所发生的事对默克尔来说无疑是一次政治上的失败，但她及时将坏事变为好事，她的转向使全党都感到轻松。当时还是图林根州长的福格尔，以老寿星的身份在马格德堡会议上表达了大家如释重负的心情：默克尔是一位自信的女性，进行了有尊严的战斗。有评论说，默克尔的形象继续得到改善，因为她有勇气，在这次年会上做出这一决定并将其公布于众。在基民盟内大家都看到了，默克尔直到最后一刻都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冷静的头脑，坚持要当总理候选人，就在不久前还让北威州提名她做候选人，但她闪电般地改变战术，从实用主义出发，巧妙地与施托伊伯达成一致意见。马格德堡会议后她转败为胜，她说：“我一点愁眉苦脸的感觉都没有，我在这次决定候选人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这对于我是一次很重要的经验。现在我们一心要夺取大选胜利，这是一个新的目标。”在这之后，她全力以赴支持总理候选人施托伊伯。在2002年6月17日的法兰克福基民盟党代会上，默克尔宣告“联盟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兴旺”，随之开始进入竞选的白热化阶段。默克尔本人和总理候选人施托伊伯都受到党代会的拥戴。党内处处充满着从未有过的胜利信心，基民盟把此次党代会看作是新时代的开端，尽管默克尔时刻提醒大家不要忘乎所以。在党代会上默克尔表示反对与社民党大联合，这使施托伊伯的竞选班子很恼火，并小心地暗示默克尔不要这样表态。党代会上发生的另一件事是：科尔回来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又回到了基民盟大家庭。6月17日召开党代会的时间选得很合适，科尔可以借机在他30分钟的讲话里突出他对德国政策所做的贡献。默克尔的导演很成功：科尔回来了，给予他的掌声既没使总理候选人施托伊伯，也没使党主席默克尔的形象黯然失色，是适中得体的掌声。默克尔让科尔重返党内，并以这种方式为“献金案”问题划上一个句号，但科尔已不再是党的名誉主席了。

随着施托伊伯候选人资格的确定，联盟党的提名活动终止，大选获胜的前提条件似已具备。但以联邦总理施罗德为首的红绿联合执政党在前所未有的难分伯仲的态势下最终还是取得了大选胜利。直到2002年夏天，民意调查结果还显示，施托伊伯有希望把只执政了四年的施罗德政府赶下台，如果是这样，将意味着德国人选举行为的一次政治革命。根据以往经验，谁一旦当上联邦总理，一般情况下都至少要执政两届，因为选民在具有决定性的换届选举中不会草率行事，错投选票。施罗德和他的副手菲舍尔显然没料到会重新当选。让我们回顾一下权威的民意测验结果，凡对大选具

有重要意义的领域，联盟党都遥遥领先于社民党：50%的人相信联盟党有能力推动德国经济向前发展，而只有 31%的人相信社民党有同样能力。这里还必须考虑到，2002 年 9 月 85%的民意调查对象都把解决失业作为头等重要的政治问题。如果把待解决的问题进行分类，43%的人在“保障和创造就业岗位”问题上支持联盟党，明显领先于 32%的社民党支持率；更为悬殊的比例在“打击刑事犯罪”问题上，联盟党支持率为 48%，社民党只有 29%；甚至在“教育政策”问题上联盟党也以 41%的支持率领先于社民党的 31%。到 2002 年 9 月大选前夜，社民党的支持率则在其他几个方面优于联盟党，选民在“社会公正”方面更信任社民党，支持率为 48%对 25%；在参加“维和行动”上社民党以 37%对 23%大大超出；“洪水之后受灾地区重建”方面社民党为 53%，联盟党为 25%；可靠的“外交政策”方面社民党为 36%，联盟党为 29%，绿党为 19%。整个大选直到最后一刻都扣人心弦，谁都难以预料，哪一类问题是最大的杀手锏。

根据研究，选举获胜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政党的普遍形象，这主要靠选民尤其是铁杆选民的长期估价。与它的竞争对手相比，联盟党的得分点主要集中在经济政策、国家债务和内部安全几个方面，而过去是德国统一、与西方联合和欧洲政策方面。尽管联盟党没有像社民党那样由于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丢失选民那么惨重，但铁杆选民还是丢了不少，特别是绿党的崛起，极大地影响了联盟党传统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选民阵营，选民改变选举对象率超过 50%；第二个因素是，越来越多的选民在快要投票时才根据个人利益，而不是受家庭或政治环境的传统约束做出最后抉择；第三个也是作用越来越大的一个因素，是政治中简称为“美国化”的个人魅力因素，当施罗德和施托伊伯电视辩论播放以后，根据独立观察员的评价，选择施罗德的人为多，特别是在第二次辩论时，施罗德以攻取胜，使施托伊伯颇显“老朽”，当两个人分别谈到他们的妻子时，施罗德充分展示了其夫人现代女性的一面，博得大多数年轻妇女的好评，而施托伊伯却无言以对。联盟党在大选中最终失利，施罗德尽管在政治上争议很大，仍被视作较为现代的总理候选人。

必须把三个因素综合起来进行分析。不仅施托伊伯，而且默克尔也对选举结果感到失望，在 2002 年 9 月 22 日的大选中，尽管联盟党得票率增加了 3.4%，但整个得票率只有 38.5%。而科尔 1998 年的竞选结果与 1994 年相比，失票率达 6.3%，联盟党至少应在这次选举中争回那些失去的百分点。此次大选结果是 1949 年以来联盟党第三差结果，在两德统一前联盟党的支持率一直为 44%。大选中社民党虽然失去 2 个百分点，但得票率达到 38.5%，仅比它的主要竞争对手联盟党多获得 6027 张选票，这样社民党就可与百分点增加了 1.9、得票率达 8.9%的绿党继续联合执政。民社党在此次选举中未达到 5%进入议会的最低标准。联盟党曾认为，重新组合的老联合政府几个月后就会崩溃，但这种幻想很快破灭了。

在 2002 年的大选中，基民盟全力支持施托伊伯，与 1980 年施特劳斯作为联盟党共同候选人参选时的情景完全不同，那时 44.5%的选举结果被看作是相当寒酸的结果，施特劳斯和他当时最密切的同事、基社盟秘书长施托伊伯随即找借口指责联盟党的北德部分和党内左翼没有全力站在共同候选人一边。在 2002 年大选中，开始时施托伊伯也担心会重演当年施特劳斯的遭遇，但 2002 年毕竟不是 1980 年，默克尔已经具有让全党一致支持大选候选人的个人权威，在这一点上，默克尔是在效仿 1980 年科尔的角色。毫无疑问，大选前 8 月份易北河的洪水灾害，也是帮助政府转为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像遇到任何一次危机一样，政府总是比只能处于观望地位的反对党要主动得多。伊拉克战争问题也逐渐发展为对国内政策起到重要影响的另外一个因素。联邦政府明确拒绝支持美国攻打伊拉克，使联盟党处于被动地位。虽然基民盟向来与大西洋彼岸国家关系友善，但其立场并不明确。施罗德在暗示华盛顿向联邦政府正式发出参战请求（实际德方并未收到正式请求）的同时表示，民众特别是东德民众，对联盟党想把德国拉入战争深渊感到非常恐惧。施罗德的这一举动，在经历过二战轰炸之夜的老一代人身上起了很大作用。上述两个意外因素，使原本在国内政治中占主导地位的失业问题暂时退居次要位置。据选举研究部门的民意测验显示，对施罗德本人有好感的人占 63%，而施托伊伯只得到 17%选民的认可；61%的公民认为，施罗德胜出的可能性大，只有 13%的人认为施托伊伯会取胜；在解决经济问题方面，施托伊伯以 33%的支持率明显强于施罗德的 24%，在创造就业岗位问题上甚至为 33%比 18%，但施托伊伯最终还是败下阵来。

此次选举联盟党的支持率有所增加的原因，几乎全要归功于动员起来的巴伐利亚选民，因为基社盟增加了 10.9 个百分点，占联盟党所有增加票数的 86%！但施托伊伯的影响力只限于德国南部和巴符州，在黑森州和莱法州虽然有影响但很有限。联盟党在城市（南部大城市斯图加特、慕尼黑和纽伦堡除外）的发展日渐微弱，在汉堡、不莱梅、汉诺威、科隆以及莱比锡的支持率与 1998 年相比甚至出现倒退。基民盟领导最初反复谈到过上述失败的原因，但它并不是实质问题，只是为了转移外界对自身问题的视线。在大城市里，什么类型的人、怎样选举、无疑对当地的选举结果十分重要，但从整体统计看，各年龄层次人的选举行为起着决定作用。仔细分析一下，联盟党正是在他们最忠实的选民即年长选民（估计也是由于伊拉克战争）那里丢了分，对这个问题进行统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 2002 年大选中，60 岁以上选民占了所有选民的三分之一，即 32%。丢失年长选民选票的现象在 1998 年就已出现过，这种现象 2002 年又一次重现。对于联盟党来说这一至关重要的选民群，已经很难再重新动员起来。同时联盟党也失去了许多年轻人和妇女的选票以及德国东部的选票。

联盟党内透过对候选人施托伊伯的分析，曾含蓄地提出一个问题，默克尔个人的因素是否会在选民中留下持久的印象。根据联邦统计局对大选的分析，男子投联盟党票的为多；妇女则偏于选社民党，占到 40.2%，比联盟党多 2.4 个百分点。联盟党在 60 岁以上男性选民那里的得票率居第二，为 46.4%，最差的选票结果体现在 18 至 24 岁年龄段的年轻妇女，为 30.7%。“东德人”默克尔对新联邦州如勃兰登堡州和柏林东部的选举行为并没有太多影响：在这些选区社民党的支持率为 39.7%，基民盟仅为 28.3%，民社党为 16.9%。联盟党在东部地区妇女那里的得票率为 27.2%。

就在大选的当天晚上，这位被《焦点》杂志讥讽为“不宽容的女头头”默克尔还在进行奋战。她知道，要想保住自己的权力，必须夺得由迈尔茨占据的联邦议会党团主席一职，尽管有人好言相劝：鉴于反对党只有不多的几个重要位置，最好由多一些担任这些职位的领导，这样对外影响较为有利，默克尔却对这些话听而不闻。不仅默克尔与迈尔茨的关系紧张起来，议会党团中对默克尔持怀疑态度的人也越来越多。但另一方面，随着新的联邦议会党团的组成，议员年轻化程度非常高，几乎三分之一是新人。默克尔知道自己在议会党团的支持率不高，因此在联邦大选前就开始格外关心即将接班的年轻议员。她很清楚，她不仅要控制住全党，而且还要掌握联邦议会党团。她的第一个目标是，把迈尔茨挤下台，但迈尔茨在议会党团内是个很受欢迎的人，议会党团的人员组合也比基民盟党内“保守”，同时在联邦基民盟内，对以默克尔为首的所谓左翼势力持保留意见的人也不在少数。

按照联邦议会党团的规定，要由联盟两党的主席共同提出建议，谁将被选为议会党团主席。开始时迈尔茨坚决不同意把他解职。在统计选票时，迈尔茨、默克尔和施托伊伯已开始在基民盟总部 6 层楼讨论议会党团的主席问题。这时候第一轮民意调查结果已经得出，它与人们预料的选举结果相符。迈尔茨得知后坚持自己的任职要求。选举后的星期一早晨，基民盟主席团开会，默克尔得到了主席团其他领导成员对她作为议会党团主席的首肯。这次会议的与会者至今还能回忆起默克尔那西伯利亚式的冷酷态度。迈尔茨不仅继续主张党主席和议会党团主席分开的原则，而且还对默克尔领导议会党团的能力提出质疑。黑森州州长科赫试图建议，为迈尔茨在议会党团中设立“第一副主席”的位置，以起到桥梁作用。之后会议休会，后来从慕尼黑赶来的施托伊伯参加了基民盟的讨论，并建议默克尔担任议会党团主席，这使她冲破了最后一道防线。

对迈尔茨来说，这是痛苦的一刻，他一定会认为，默克尔早在沃尔夫拉特豪森那次早餐上，就把施托伊伯同意她当议会党团主席作为让出候选人的交换条件，而且施托伊伯也同意了这个条件。几个月后，迈尔茨指控默克尔（包括施托伊伯）没有遵守 2002 年 5 月达成的一致意见，即一旦大选失败，议会党团主席问题要在协商一致的前提下解决。按照当时商定的意见，不在事先做出任何决定，而是在大选之后，三个人坐在一起共同商量，所作的决定不能违背三人其中一位的意愿。但党主席在大选前几周，几乎与所有州一级的基民盟主席谈了解除议会党团主席职位的问题。最初，迈尔茨拒绝出任议会党团副主席一职，经过反复考虑，他还是承担了主管经济、社会 and 财政这几个重要领域的副主席。迈尔茨一直认为，默克尔本意是不想要他这个副主席的，只是无奈于施托伊伯

和格罗斯的压力才同意了。显然议会党团领导层缺乏和谐的基础，这在以后还将反映出来。几天以后，新老议会党团领导在柏林“海洋饭店”的节日大厅聚会，新的议会党团主席与聚斯穆特、科尔、长年担任过部长的赛特斯、魏格特、弗里德里希·伯尔以及卡尔-迪特·施普朗厄话别。当默克尔就基民盟党以及科尔和德国统一问题侃侃而谈时，议员迈尔茨则坐在另一位失意者朔伊伯勒的桌子旁。

默克尔没有多少时间可以休息。联邦大选刚过 7 周，基民盟就于 2002 年 11 月 11/12 日在汉诺威召开联邦党代会。会上默克尔面临重新当选的问题，而开会时间是默克尔在联邦大选前有意定下来的，因为大选刚刚结束时党的领导班子的领导班子对她会更加忠心耿耿。根据党章规定，联邦基民盟理事会每两年就须重新选举（总书记例外，可以每四年选一次），埃森会议上默克尔当选时，正值基民盟处于“特殊状态”，这次会议则要稳固默克尔的权力。但整个党代会显得苍白，没看到在哪些问题上有所突破。参加党代会的每个人都明白，议会党团主席的职务进一步加强了默克尔的地位，但也没有人对解除迈尔茨的职务欢欣鼓舞。代表们虽然对默克尔显得很尊重，但不是发自内心的爱戴。评论家菲尔德迈耶对此次党代会这样评论道，一个政治家必须准备并有能力“回答公民提出的如何塑造国家未来的问题，按说默克尔应该利用汉诺威会议的机会，在讲话里提及这些问题，但她没有利用这一机会”。《日报》也评论道，患了流感的默克尔发表了一次少有的不鼓舞人心的讲话。但默克尔还是以相当高的票数重新当选基民盟党主席，她获得了 796 票中的 746 票，得票率达 93.7%。而出席会议的实际代表为 978 人，据说来自不莱梅的大会执行主席贝尔恩德·诺伊曼没有留出足够的时间，让所有代表进入大厅，投票时很多代表并没回到投票大厅，当时有些代表正在参加同时举行的与外国客人在一起的活动，有些代表还在休息厅喝咖啡。被选为基民盟副主席的有斯图加特的文化部长沙万、下萨克森州州长乌尔夫、北莱茵州反对党领袖吕特格斯和莱法州的伯尔。在选举基民盟主席团其他成员时，迈尔茨以 93.6%（876 赞成票）的得票率获最佳选举结果，其次是科赫。

为巩固党主席的地位，默克尔用了两年时间不断奋争着，现在她可以在正常环境下潜心党主席的日常工作了。她经受了总理候选人失败的打击，经历了施托伊伯的竞选失败，现在她终于抓住了议会党团主席这第二顶桂冠。疑惑、迟疑曾不断地折磨过她，可当初科尔不是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吗？刚选过党主席不久，党内是不会出现反叛行径的，也不用担心黑森州的科赫会有什么动作，他在几个月后，即 2003 年 2 月 2 日面临着再次争得州选举胜利的问题。由于黑森州基民盟也卷入“献金案”，科赫的处境很困难，这就要求他具有特别的耐力。默克尔要抓紧利用整个大气候，稳扎稳打，她的目标是以她的名义更新基民盟的纲领，她知道别人说她缺乏纲领。而她很懂“权力”这一点，至此已用事实作了充分的证明。

2002 年红绿政府以微弱多数在大选中获胜后，即面临着十分困难的一年。相反，默克尔的阵营在 2003 年却不断进账。2003 年 2 月 2 日，基民盟欢欣鼓舞，科赫在黑森州以绝对多数再次当选；此外在被称为“施罗德州”的下萨克森州，以乌尔夫为首的基民盟获胜，与自民党组成联合政府，取代了原来由社民党和绿党联合执政的州政府。乌尔夫慢慢却稳健地成为基民盟内一颗升起的新星，他对默克尔有过失望，但始终抱着支持的态度，他成为默克尔政治上竞争对手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不莱梅的州议会选举对于基民盟来说是一次特殊选举，因为它虽属地方选举，但选举规则与其他州不同。受人爱戴的市长亨宁·舍尔夫（社民党）在选举中获胜。虽然基民盟选票有所损失，绿党票数增多，但社民党与基民盟实现了两大党联合执政。9 月 21 日巴伐利亚举行州选举，基社盟获得了从未有过的三分之二的州议会议席。

默克尔与美国

默克尔 2003 年 2 月的美国之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联邦议院大选后，美国攻打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不仅分裂了欧盟，也使人们对联邦德国的政策产生分歧。支持美国布什政府军事打击伊拉克的欧洲国家除了英国外，还有丹麦、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波兰、匈牙利和捷克等国家。而以法国和德国（甚至与俄罗斯和中国结为同盟）为首的国家构成了坚决反对美国军事入侵的阵线。2002 年联邦大选期间和 2003 年初，伊拉克战争问题进入外交冲突的白热化阶段，德国总理施罗德被视

为反战立场最坚定的代表。德国与法国在后来事态发展中仍不属于那些“自愿者联盟”，那些国家于 2003 年 3 月试图在有争议的国际法基础上找到用武力进攻伊拉克的依据。不能忽略的是，由美国和大多数欧洲国家 2002 年 11 月 8 日通过的联合国第 1441 号决议曾向伊拉克发出警告，如果伊拉克在联合国武器核查小组调查大面积杀伤武器的工作中采取不合作态度，必将面临严重后果。如果说施罗德以排除任何参与军事进攻伊拉克的政策赢得了大部分德国人的赞同，那么，他的政策在外交上导致了德美传统友好关系的严重破裂。默克尔在德国内部辩论伊拉克问题时总是在这一点上谴责施罗德。默克尔指责的核心问题是，施罗德片面的决策从一开始就阻碍了对萨达姆形成一致的威慑，使欧盟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四分五裂的形象进一步扭曲，造成军事打击伊拉克的可能性增加。由于欧洲不能用一个声音说话，那么对华盛顿当然不会产生影响。

不久默克尔就被赐予拜访美国政府的机会。2003 年 2 月默克尔在美国首都受到高规格接待，但此时美国总统自己无暇会见基民盟主席，默克尔只能与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副部长沃尔弗维茨、以及当时的总统安全顾问现任国务卿赖斯进行会谈。小布什在 2005 年 2 月德国之行时才在美因兹与默克尔相见。一个在野党领袖到华盛顿访问历来是一宗特别的政治事件，尤其是能否拜见美国总统，对于提高威望非常重要。陪同默克尔出访的是议会党团外交与安全政策发言人普弗吕格尔，他是典型的大西洋派，因此对默克尔在美国访问时的立场有很大影响。引人注意的是，默克尔的副手朔伊伯勒没有出现在华盛顿之行的行列中。他在议会党团内要求与美国保持距离，但普弗吕格尔明确的路线征服了默克尔。朔伊伯勒必然把默克尔带普弗吕格尔出访一事视为是对自己的侮辱。很明显，默克尔借此清楚地向朔伊伯勒表明了对伊拉克政策的规定权在她。在出访的前几天，默克尔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题为“施罗德并不代表全体德国人”的文章，她攻击德国总理在伊拉克问题上走了一条特别的道路，损害了德国人的利益，影响了与美国良好的大西洋两岸关系。默克尔的文章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欢心和认可。而社民党则认为，默克尔的文章破坏了德国一条不成文的法律，即在国外不能公开批评自己政府的政策。社民党秘书长欧拉夫·朔尔茨抗议说，默克尔的举止使德国的形象在国外受到损坏。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弗兰茨·明特菲林甚至谴责默克尔对美国政府卑躬屈膝。默克尔到现在还坚持认为，总体上说欧洲人，特别是联邦总理施罗德没有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尽管人们在伊拉克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这一事实并没有动摇基民盟主席的立场。美国人在战后重建伊拉克民主秩序中判断有失误，但默克尔一直对伊拉克的政治形势给予温和的评价。她的解释是，“显然人们对军事干预能够天衣无缝地转变为民主，对萨达姆和伊拉克稳定之间就不会有其他障碍了表现得过于乐观”。针对美国士兵在伊拉克虐待俘虏的报道，默克尔联系到对伊拉克输入民主的问题还是予以坚决的谴责。

默克尔认为欧洲一些国家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判断是有误的，她的基本思想是，在国际政治中至少不能也不允许完全排除用武力作为解决冲突的最后手段，以防止更严重后果的产生。2003 年初默克尔在论述二十一世纪的外交与安全政策时，第一次明确地联系到德国历史和科索沃战争：“回顾自己的历史我们得出的警示是，维护和平、全力以赴避免战争冲突是最珍贵的财富，对同一历史的回顾也警示我们，错误理解的、激进的和平主义也会导致灾难，以至无法避免地使用武力，尽管很痛苦，但这是为了防止更大灾难的出现。欧洲现代史也证明，用战争推翻专制制度是最后的手段，科索沃战争结束了塞尔维亚暴君米洛舍维奇灾难性的行为。在科索沃战争中‘自愿者联盟’使用武力防止了更大的灾祸，阻止了对科索沃穆斯林种族灭绝的屠杀。”基于这一认识，默克尔的结论是：“美国人说过，我们想把二战后带给德国人的民主也带到伊拉克，但伊拉克没有这样的民主传统，它与战后德国不一样。尽管如此，我不能接受，有些人或有的国家不适合民主制度的说法，这是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实现人权标准和反对威胁保持稳定完全可以成为军事干预的目标。”

胜利之年

2003 年 3 月 3 日就业联盟的失利标志着，联邦政府在内政上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施罗德 2003 年 3 月 14 日宣布的 2010 改革计划导致工会继续与社民党作对。推迟原计划 2003 年 7 月 31 日启动的卡车收费制给政府制造了不少麻烦（直到 2005 年 1 月卡车收费的技术条件才成熟），为此联

邦政府一个月就损失 1.56 亿欧元的收入。由联盟党执政的联邦州在联邦参议院虽然获得多数，在政治战略上却暴露出不足。联盟两党已间接成为与政府共同承担责任的秘密伙伴，而各州——二年前的税收改革更能说明问题——却更多地关注着自己的利益，自信的“各州君主”不允许联盟党根据整体战略任意“摆弄”州一级事务。他们有时借口其他活动，不参加协调这些问题的核心会议，以逃避应共同承担的责任。2003 年 9 月 30 日黑森州长科赫与北威州同事施泰因布吕克单独拿出一份削减补贴的单子，使北威州在野党领袖吕特格斯大为不快，他认为这是给北威州长一次不必要的出彩机会。基民盟党主席也有些无所适从，因为她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起一个主持人的作用。默克尔面临的危险是，联邦总理会对此在政治上表示热烈拥护，其重要目的是，迫使在野党在一些不受舆论欢迎的决策中共同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如果采取拉封丹 1997~98 年对科尔政府经常使用的那种封锁改革的政策，只能使基民盟这种“国家支柱”型反对党更加不令人信服。因此，默克尔十分重视与曾是总理候选人的施托伊伯协调立场。施托伊伯作为总理候选人的作用对默克尔确实很有利，他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体现了两党融合的形象，而不再向默克尔和姊妹党开枪放炮。默克尔与施托伊伯绑在一起也能与基民盟州长们的势力抗衡。

在 2003 年 12 月基民盟联邦党代会召开前的半年里，充满了戏剧性的政治事件，特别是施罗德推动的税收改革几乎发展成一座政治陷阱。鉴于德国整个经济的恶劣形势，施罗德在 2003 年初决定把 2000 年通过的税收改革第三阶段步骤从 2005 年提前到 2004 年实行。默克尔并不打算对提前实施减税计划加以阻挠，另一方面她也不愿意为施罗德在税收问题上取得积极成果而铺平道路。当然假如红绿政府像 2000 年那样，利用在野党成员之间的矛盾从中渔利，就必须立即制止。

默克尔与施托伊伯在 2003 年 7 月 1 日给施罗德的信中发出信号，同意尽快落实降低税收的计划，但他们拒绝政府准备用贷款来支付税收改革的方案。但黑森州长科赫却不同意减税的思路，他担心这样做国家债务将会继续攀升，为此他遭到来自巴伐利亚州的生硬斥责。政府和反对党在 2003 年 8 月 21 日至 22 日就共同承担的医疗改革草案达成一致。为争取在 2003 年 9 月 26 日的议会上得到自己党内多数的支持，施罗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此时联邦政府的处境十分危险，执政两党都很紧张。按照《法兰克福评论报》的说法，社民党已接近绝望境地。医疗卫生改革、失业金、解约保护和劳动时间等方面的变革方案虽然在议会表决中得以通过，但在社民党行列中有 6 人反对，一名绿党成员弃权。这样执政两党票数勉强构成多数，而在野党是投了同意票的。迈尔茨为难的是，如何处理他与基社盟人士赫斯特·泽霍夫反复协商的妥协方案，该方案 10 月 17 日在联邦参议院被属于联盟党的各州州长所接受。妥协方案本身已经预示着冲突的爆发，这一冲突体现在 2004 年基民盟与基社盟的关系中。泽霍夫坚持一种“全民保险”模式，他认为，自由职业者和公务员也必须加入保险。在整个改革进程中，医疗领域的改革不能是惟一的一项改革。在联邦参议院多数联盟党执政的联邦州——联盟党占 16 个州长中的 9 个——的强迫下，2003 年 11 月 13 日，协调政府与反对党立场的仲裁委员会开始了关于其他方面改革的谈判。这样联盟党也要共同对不受欢迎的改革，主要指对所谓的“哈尔茨 IV”方案承担责任。联邦议院和联盟党占多数的联邦参议院经过马拉松式投票程序终于在圣诞节前通过一系列诸如税收、劳动市场和退休金制度等全面的改革法律。

默克尔的战略在 2003 年 12 月浮出水面。仲裁委员会开了几天几夜的会议，红绿政府与联盟党在税收上虽然达成妥协，但这一结果并没有让人得出印象，施罗德是一个有实施能力、劲头十足的改革者，更多的感觉是，作为总理他在重要问题上总是屈服于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的固执立场，受制于对方的谈判技巧。基民盟与基社盟这一次没有四分五裂，而表现出高度的一致。默克尔因此成了谈判游戏中无声的胜利者，她用有说服力但并非得意忘形的论据告诫联邦总理施罗德，必须接受当前权力对比的现实。2003 年 12 月的税收改革妥协方案，由于力度微不足道反而对在野党更为有利。人们在仲裁委员会上一致同意减税 78 亿欧元，这样舆论就不会再指责默克尔对联邦政府实行封锁政策了。另外现在提前进行的减税额度比施罗德最初计划的 156 亿欧元少了很多，所以这一改革根本谈不上是政府在促进经济繁荣方面取得了成就。

2003 年默克尔要在竞争最佳改革方案中拿出最好的、即便与基社民相比也是最杰出的方案。在莱比锡基民盟党代会召开前的几个月，默克尔于 2003 年 10 月 1 日发表了“德国向何处去？”

的演讲，显示了一个信心十足的主席形象。她在讲话开始时重复了一个记者的提问：如果默克尔没有进入政治舞台，您认为基民盟缺少什么。默克尔最初只是简短地回答了一个“我”字。她用这个例子作为演讲的开场白并用：“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表述，显示着她个人的特性和领导力量。这是默克尔的一次重要讲话，是阿登纳基金会邀请她在柏林德国历史博物馆的一次论坛上发表的演讲。为了这篇讲稿，工作人员做了长时间的准备，她自己 also 花了大量时间。联盟党内很多权贵都在认真聆听他们主席的讲演，此时大多数人已经把她视为 2006 年最有可能的总理候选人。默克尔的讲话回击了施罗德的批评，并强调联盟党不会在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采取封锁政策。联盟党不会拒绝所有面临的改革题目，也不惧怕意见分歧。默克尔还对勃兰特大加赞扬，“是阿登纳、勃兰特和科尔的政策使德国统一成为现实”。默克尔试图通过这次讲话回答她到底主张什么的问题。她不仅阐述了对德国统一的评价，而且还在自由、公正和团结这三个基本价值观的基础上推崇一种“现代效率公正”。“我们的共同天性需要这三种价值观”，她进一步说到，“但事实是，共同的天性要求我们对三种价值观重新调正，就是一切都应保证自由这个前提，或者换言之，为了使团结和公正能够长存，必须把自由从价值观等级中提到最重要的位置。”这就是基民盟主席的信条。

默克尔在此次讲演中提到的各类改革计划是 2003 年 12 月 1 日至 2 日莱比锡基民盟党代会的主要议题。党代会上基民盟决定实行彻底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的方针，用保费模式取代全民保险。这一改革是由前联邦总统赫尔佐克领导下的委员会准备的。党代会上还通过了迈尔茨的新税收模式，受到赞扬最少的恐怕是施托伊伯，上千名代表对来自慕尼黑的客人只给了 90 秒钟的掌声，而他去年在基民盟的讲话赢得长达几分钟暴风骤雨般的掌声。施托伊伯可能意识到，党代会对他的反响一定来自上边的间接暗示。实际上基民盟中许多人对基社盟和施托伊伯很不满意，特别是泽霍夫对基民盟社会政策和赫尔佐格委员会的批评更让基民盟人感到恼火。大家都知道，泽霍夫被邀请参加赫尔佐格委员会会议，但他却不接受。《明镜》周刊把基民盟稀薄的掌声称为对施托伊伯的侮辱。基社盟秘书长马库斯·泽德尔也把基民盟接待施托伊伯的行为斥责为“太幼稚”。赫里博特·普兰特勒更进一步，他认为，这种不友好的接待是对“沃尔夫拉特豪森早餐的报复”。其实事情并非如此，要是让与会代表 2001 年 12 月在德累斯顿党代会上表决，他们大多数都会投施托伊伯的票。普兰特勒的分析是正确的，基民盟代表是要让巴伐利亚人感觉到，他作为总理候选人的角色已经寿终正寝。实际上在党代会之前默克尔的地位就已在党内被视为与联邦总理施罗德并驾齐驱了。媒体此时大肆渲染，“以前人们认为，默克尔驾驭不了这个党，现在基民盟各州君主的担忧已经消失。”默克尔在这次党代会上要实现的目标是，让基民盟以一个纲领全新的政党面貌出现，这一点她做到了。媒体报道，她以基民盟无可争议的第一号人物喜形于色，“默克尔突然成了居高临下的人物”。在过去基社盟一直对制定纲领和路线起着先导作用，现在他们开始明白，基社盟毕竟规模小，代表的社会阶层较少，虽然决策过程简便，但他们的设想已经趋于落后。这种分歧局面将继续笼罩着下一个年度 2004 年。

此次党代会召开前 4 周发生的一起事件引起了各方的激烈争论，但没有对党代会产生多大影响。只是在基民盟历史上第一次开除了议员。来自福尔达的联邦议员马丁·霍曼在后来才公布于众的 2003 年 10 月 3 日的讲话中，不仅反对德国人是“犯罪民族”的提法，而且还和犹太人做了比较：他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与纳粹主义之间有一定的内在相联，它是反宗教并鼓吹无神论的。因此，不论是德国人，还是犹太人都不是“犯罪民族”。人们有理由认为，那些带有邪恶思想的无神论者才是上一个血腥世纪的“犯罪民族”。同时霍曼还提出疑问，“通常被看作是受害人的犹太民族难道在近代史时上就没有过黑暗的一页吗？或者说犹太人完全是承受苦难的受害者吗？”他指出，犹太人对俄国 1917 年革命有过强大和持久的影响，因此应该允许提出犹太人的罪行问题。基民盟领导层为这种粗暴言论所震惊，霍曼事件使默克尔面临严峻的考验。首先她要求这位属于议会党团内赫尔纳教区的福尔达天主教徒与他的言论划清界限，并对此作出道歉。同时她还宣布，霍曼应该放弃联邦议院内政委员会的职务，停止他对纳粹时期劳工赔偿的报道权。

尽管霍曼向议会党团领导承诺将保持沉默，但他还是接受了德国电视二台记者弗里德里希·库尔茨“面对 21”专栏的采访。他在这里不仅重复了那番讲话，而且由于记者的问题尖锐细致，他

只好出示了一些对他表示赞同的信件。摄像机镜头对准了联邦军将军赖因哈特·京策尔的一封对他表示赞同的信。京策尔马上被国防部长施特鲁克斥为“糊涂将军”，并令其提前退休。这样霍曼一案就成了新的政治事件，默克尔被迫改变了她与其他同事相比较为谨慎的态度。霍曼由于他的个性在议会党团中常被人说成是“爱钻牛角尖”，但通常情况下他还是一个不错的同事，但这次没有同事支持他的观点。关于对霍曼的处理方式引起了强烈的批评，特别是议员们不理解，什么原因促使默克尔改变态度，要求将霍曼开除出议会党团，而不是开除出基民盟党。联邦议院副议长诺伯特·拉莫特告知，他将驳回基民盟主席的申请。他认为，一名联邦议院的议员是基民盟党员，却不是议会党团成员，这太奇怪了。不得已默克尔只好改变主意并通知，她将提出开除霍曼出党的申请。默克尔的党内对头科赫也感到棘手，霍曼出自他所管辖的黑森州。他对外宣称：“人们应该认真考虑，在具体情况下如何行事。默克尔现在自己抓着决定权，她会得到黑森州方面的支持。”这样科赫把所有责任都推到默克尔身上。本以为全体议会党团会一致站在默克尔一边，但结果并非如此。党内有五分之一的人不同意她提交的开除申请，其中 195 人赞成，28 人反对，16 人弃权，还有 4 票作废。在这一事件上默克尔一直没有明确的方针。“她首先想保留黄牌警告的态度”，原社民党政治家拉封丹在《图片报》上这样认为。默克尔在霍曼事件上改变立场的主要原因是，她曾低估了公开和非公开的压力。后来阿克塞尔·施普林格出版集团的大股东弗利德·施普林格女士对默克尔施加了很大的影响。施普林格是默克尔的朋友，她是出版业大亨施普林格的第五任、也是最后一任夫人，她继承了丈夫的遗产。她丈夫施普林格一向积极反对任何形式的反犹行为。

莱比锡党代会是默克尔在政治上取得的最大成就，她个人的魅力和她的主张也得到真正的承认。但党代会上通过的税收和社会福利政策在 2004 年使基民盟与基社盟两个伙伴党分歧加剧。首当其冲的是税收方面的决议。基民盟在莱比锡开会时宣布，要建立一种新的、简单的三级税收模式，取消减免纳税的例外条款，用采取这一措施所得的资金收入支持上述税收模式。莱比锡会议召开几周后媒体就发现，基民盟与基社盟是一个怯弱联盟，它们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在税收政策上进行赌博。在基民盟莱比锡党代会后，基社盟推出了自己的税收方案，这一方案实际上是红绿政府财政政策的继续。联盟两党 2004 年 3 月 7 日就共同的税收模式达成一致，这是在基民盟迈尔茨与基社盟库尔特·法尔特豪森两个税收方案基础上形成的模式，而迈尔茨在莱比锡党代会上提出的税收计划原则上被推翻。迈尔茨的方案当时只局限于专业人员范围，所以公众并不知道矛盾的内幕真相，而下半年社会福利政策的争论就不是这样了。基民盟在莱比锡党代会上先抛出了两个方面的方案，事先却没有与基社盟通气。基民盟最初的税收方案是，在中期阶段实行三级税收制，税率统一为 12.24% 和 36%。个人所得税与法人所得税应该相互协调。通过在中期阶段确定的三个统一而简单的税率，以及将所得税税项从 7 种减少到 4 种，从而进一步简化现行税法。而在基民盟与基社盟的妥协方案中这种分级税收模式几乎不见踪影，只是被视为中长期的设想。这一加了水分的税收方案使迈尔茨深感失望，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默克尔又把他撇在一边。2004——基民盟双重转变的一年

2004 年从政党政治的角度来说对于默克尔和基民盟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社民党在选民心目中的声誉继续下降。相反基民盟乐观地看到许多州一级、地方一级的选举以及欧盟选举对他们十分有利。社民党政治家弗洛里安·格尔斯特被解除职务意味着，曾对格尔斯特改革联邦劳动局的计划寄予很大希望的联邦政府未能遵守大幅度减少失业人数的诺言。还在 1998 年 12 月第一次联邦大选获胜后施罗德就说过：“如果我们不能把失业率明显降低，那么我们以后就没有资格再当选。”2004 年 2 月 6 日施罗德由于社民党选民急剧减少不得不采取措施，宣布辞去担任了 5 年之久的社民党主席的职务，以便专心致力于联邦总理的工作。2004 年 3 月 21 日明特菲林当选为社民党主席。2 月 29 日汉堡的基民盟在冯·博伊斯特领导下在古老的汉萨城市汉堡一举夺魁，成为单独执政的政党，取得历史上第一次基民盟选票增加近 20% 的好成绩。看来，联盟党的上升已势不可挡。科勒当选为新一届联邦总统更预示着联邦德国将面临政权更换。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科勒与社民党总统候选人格希纳·施万展开了紧张而公开的角逐，最后科勒在联邦大会第一轮选举中就获胜当选。

科勒当选是默克尔的杰作

联邦总统选举一向具有政治上的战略意义。它预示着联邦层面未来政治结构的组合。联盟两党与自民党共同推选总统候选人就清楚表明了 2006 年联邦议院大选后政党联合的趋势。对于自民党主席维斯特维勒来说风险很大，自民党内谁主张推举本党的总统候选人，就意味着想削弱维斯特维勒的力量，同时也使 2006 年与谁联合执政的问题悬而不决。

毫无疑问，总统候选人问题是默克尔的一大杰作，但对她的前任朔伊伯勒犹如伤口上撒盐。早在 2003 年 10 月人们就谈到朔伊伯勒可能成为联邦总统劳的继任人问题。2004 年 1 月基社盟曾邀请朔伊伯勒前往维尔德巴德克劳特参加党内年会，会上基社盟做出了有利于朔伊伯勒的决定。几个月来柏林政坛提到了好几个人的名字，其中还有福格尔，他使尽浑身解数，试图进入候选人行列。福格尔在图林根州为继任迪特·阿尔特豪斯腾出了位置，并迫使默克尔许诺他再次担任阿登纳基金会主席。如果他真的当上总统，那么他在任期的第五年就将 77 岁了。最初的状况对默克尔十分不利，两个联盟党与自民党在联邦大会上占有多数，但自民党并不情愿接受联盟两党推选出的候选人。老总理科尔也拿出了他的方案：最好在总统候选人问题上让自民党一步，以使它对与联盟党联合执政有一种义务感。科尔建议的另一目的是，阻止朔伊伯勒当候选人。自民党在汉堡选举中败北使该党在联盟党面前收敛多了，从此不再提推选自己候选人一事。但维斯特维勒必须向本党证明，自民党不是默克尔的执行机构。在几个党主席开会时，施托伊伯首先被推举担任联邦总统候选人——很有可能早就知道他会拒绝。推举施托伊伯的理由是，如果三个政党中某个政党主席参加总统竞选，他应该有优先权。对此自民党特别是维斯特维勒也会表示接受。但施托伊伯本人却不愿意，“我是全心全意的州长，我领导着德国的第三大党，我不会放弃党主席这项伟大的任务”。施托伊伯明显偏爱朔伊伯勒，“我很敬重他的智慧力量。他有勇气为面临巨大变化的国家指明道路”。施托伊伯对《五彩》杂志说过，朔伊伯勒是所有竞选人中最出色的。朔伊伯勒完全相信施托伊伯实现目标的能力，一场关于总统候选人的讨论广为开展起来。

科勒的名字最初无人知晓。2004 年 1 月人们就在猜测，前环保部长特普费尔在基民盟总部研讨会上露面是默克尔有意安排的，目的是测试一下人们对他的接受程度。还有两位女性也有希望成为总统候选人，她们是下萨克森州的社会部长冯·莱恩女士和默克尔的心腹、巴符州文化部长沙万女士。但很多人推测，如果一位女子成为联邦总统，这将减少默克尔自己竞争总理的机会，所以默克尔是不会让女性担任总统的。有人断言，两位女性成为国家领导人在德国是行不通的。但默克尔的策略更聪明。实际上默克尔心里还是愿意看到另一位女性当上国家首脑的，特别是她对下萨克森州社会部长和巴符州文化部长很有好感。她的考虑是，一位女总统会在支持女性担任最高领导职务方面做出贡献。与此同时朔伊伯勒正在越来越不耐烦地等待着他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默克尔在党内的对手，主要是科赫和迈尔茨很早以前就坚持让朔伊伯勒作为总统候选人，因此朔伊伯勒几个星期以来一直认为，（这也是他今天抑郁不振的原因）他在党内的重要性加上基社盟的支持会形成足够的压力，迫使默克尔不可能绕过他而另作其他打算。在那几周里，朔伊伯勒徒劳地等待着与默克尔单独谈话的可能，这种等待使他极为恼火。默克尔竟能够在 2004 年 2 月与朔伊伯勒共同出访土耳其时不和他谈一句话，而他在时时刻刻盼着这个谈话时机。随同两位政治家前往土耳其的《图片报》记者分析得很对，他们写道，“朔伊伯勒希望私下把事情讲清楚”，但他却得不到机会。默克尔不想对朔伊伯勒做没有回旋余地的许诺。

默克尔从过去与维斯特维勒的谈话中就知道，自民党不会赞同朔伊伯勒当总统候选人，因为他曾接受了院外游说人士施莱伯至少 10 万马克捐款，而且还向议会说过谎，仅这两条自民党就不能同意他当总统。但朔伊伯勒认为，检察院已做出停止调查的决定，说明此事已得到完全平反。但检察官的行文却是，他们认为当事人的陈述不可信。如果分析一下这段文字，人们对朔伊伯勒在这个问题上的愚昧无不感到惊讶。

默克尔较早就决定支持科勒。但她在修辞上却选择了另一种表述。2004 年 3 月 2 日，基社盟方面先传出信息，默克尔与施托伊伯在朔伊伯勒作为候选人问题上达成共识，但默克尔后来予以否认。在与维斯特维勒会晤前的晚上，默克尔与施托伊伯确实提出朔伊伯勒作为两党共同的总统候选

人，但遭到维斯特维勒的拒绝。3月3日夜到3月4日凌晨基民盟理事会一片争吵声。在总统选举这场牌局中，强硬派科赫、迈尔茨和米尔布拉特要求推举朔伊伯勒，后者因还有基社盟的支持也认为自己希望无限。会议开始时科赫在众多电视镜头前吼到：“我太不满意了。整个程序都乱了套。”包括朔伊伯勒在内的反对一方认为让自民党做决定是个严重的错误。但默克尔也有一批支持者，其中有来自北威州的联邦议院副主席拉莫尔特。他提醒说，由于“献金案”丑闻，朔伊伯勒在自己党内都不会保证拿到全票。州长乌尔夫、阿尔特豪斯和主席团成员米勒都支持默克尔的立场。汉堡市长冯·博伊斯特也主张给默克尔在与其他两党协商时留有一定的余地，不能把宝押在一个候选人身上。与此同时基社盟和自民党也在开会，他们急切地等待着基民盟的辩论结果。

默克尔与他的支持者对此次会议做了充分的准备，因为她知道，如果推举朔伊伯勒就会与自民党发生分歧，同时自民党也会认为默克尔输给了党内的对手。经过长时间的争论，最后大家认识到，朔伊伯勒在自己阵营内不会获得多数同意。朔伊伯勒本人在当晚22点30分离开会议室，这已是个明显的信号。默克尔在与主席团其他成员商讨后确定了一个三人名单，朔伊伯勒的名字根本就没有出现。第一候选人是特普费尔，排在第二位的是沙万，科勒是最后一个人选。据柏林流传的一种说法，默克尔耍了一个花招让基社盟主席施托伊伯上了当，她表面上好像是在推举沙万，但此人与特普费尔一样使施托伊伯难以接受，特普费尔更是自民党的眼中钉，因为自民党认为他有绿党倾向，而绿党又是自民党的主要竞争对手，自民党对他自然投了否决票。这样施托伊伯除了同意推举科勒以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默克尔在当夜就打电话给施托伊伯，此时其他两党的领导层会议早已中断，因为他们无法预料，基民盟要争吵到什么时候。施托伊伯第一个得知三人名单，并与默克尔在推举科勒为候选人的问题上取得共识，这使他有可能对外表明，推举科勒是他的建议。自民党高层领导在星期四早上8点就对联盟两党共同推举的候选人表示同意。

有意思的是，各大报刊，尤其是自由派的《南德意志报》，借评论员普兰特的文章以不同寻常的尖锐口气对默克尔推举科勒进行了批评。他在文章中把默克尔称为“安吉·马基雅维里”，把联邦大会（当时还未最后确定）的结果称为是有失体面、玩世不恭的结论，他在联系到马基雅维里的文章“谬误、狡诈与欺骗”时评论到，默克尔处于一场“笨拙的魔鬼游戏”的中心，她的前任、正在争夺德国联邦总统职位的朔伊伯勒被卷入这场游戏中。“人们不禁要问，这是否是基民盟女掌门人默克尔蓄谋已久的结果，她从一开始就打算把智力超人的竞争对手排挤出局”。她使用“肆无忌惮和玩世不恭的手段实现了她的目标，而一点不顾及朔伊伯勒的脸面”。她“如此卑鄙、如此不诚实地对待朔伊伯勒，以致于党内那些并非属于朔伊伯勒迷的人也在较长时间内对默克尔耿耿于怀”。人们都知道，早在科尔时期，如果朔伊伯勒需要把一些秘密或信息捅到政治界，他的首选就是《南德意志报》。普兰特与朔伊伯勒一样都是法律专业出身，他十分尊重朔伊伯勒。这篇评论透彻地反映出朔伊伯勒的内心世界。

为什么推举科勒为候选人使默克尔受到尊重？首先，正如俗话所说，一通百通，一了百了。科勒得以在第一轮就胜出并非是不言而喻的事，特别是他还要面对联邦大会中女性成员的专门宣传活动，而其中一些成员又不受党派约束。默克尔做到了与自民党共同推举他们的候选人，否则正如联盟党所担心的，如果选举程序经过第二轮甚至第三轮，事态就难以控制了。第二，默克尔借此制止了党内最危险的对手朔伊伯勒。默克尔支持科勒还考虑到，科勒不仅是与前任总统劳完全不同类型的人，而且他虽然是基民盟党员，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家，他曾当过财政部国务秘书和总部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属于专业人士。而其他人在担任总统前都是政府高级官员，与政党组织密不可分。（在某种意义上赫尔佐克也是如此，尽管他担任过联邦宪法法院院长，但政治上一直是中立的。）推举科勒是个正确的选择，在国际事务中担任过重要职位的科勒给人的印象与行将退休人的形象确实不同。默克尔在联邦总统选举上达到了她声誉的最高峰。她受到了从《时代》周刊到《世界报》等媒体的高度评价，《时代》的文章称，“科尔基民盟已经转换成了默克尔基民盟，现在该轮到中间这一代人掌权了”。《世界报》的文章称：“联盟党内没有人可以绕开默克尔了。”

随着 2004 年 6 月 13 日欧洲议会选举，联盟党的威望在选民中开始下滑。在这次选举中联盟党虽然达到 44.5% 的理想结果，但比 1999 年少了 4 个百分点，那时联盟党得票达 48.7%。好在社民党损失更严重，联盟党选票的下降就显得不足为奇了。社民党得票率从过去的 30.7% 下降到 21.5%。在同一天举行的图林根州议会选举中基民盟虽然获得绝对多数，但丢掉了 8 个百分点，得票率为 43%，社民党也输得很惨，失去了 4 个百分点，只得到了 14.5%。而民社党的选票却剧增到 26.1%。9 月 5 日在萨尔州议会选举中联盟党很幸运，选票增加到 47.5%，比上届增长了 2%，并在议会重新获得绝对多数席位。社民党的选票从 44.4% 跌到 30.8%。在萨克森州，基民盟曾一直遥遥领先，2004 年 9 月 19 日的州选举中却遭到重创，从原来的 56.9% 降到 41.1%。社民党从 10.7% 降到 9.8%，这次社民党选票的下降幅度不足以使联盟党得到安慰。另外三个政党，自民党、绿党和右翼激进的国家民主党也得到进入议会的足够选票，这样一种态势就给政党联合组阁造成困难。两个遭受损失的大党决定联合执政，因为基民盟与自民党联合不能构成绝对多数。尽管萨克森州从统计数字上看——这与州长米尔布兰特曾是财政部长的成就有关——是东部各州在财政和经济方面发展最好的，但萨克森的选民却不买这个账。萨克森州选举遭受损失的主要原因在于联邦一级政治的失误，特别是基民盟与基社盟在社会保障政策方面发生的争执所致。经验证明，州一级选举是体现联邦政治的晴雨表。同一天在勃兰登堡州进行的选举中基民盟也遭到损失，得票只达 19.4%，这是一个难以忍受的失败，五年前基民盟在这里还达到过 26.5% 的得票率。1994 年社民党的施托尔帕在勃兰登堡州曾经有过获得 54.1% 选票的辉煌，而此次社民党的普拉策克只得到了 31.9% 的选票，比上届少了 7.4 个百分点。以普拉策克为首的社民党与以舍恩伯姆为首的基民盟只好在勃兰登堡州继续联合执政。迈尔茨 —— 地震波及全党

萨克森州选举之后，迈尔茨在 2004 年 10 月 12 日发表了一封给默克尔的信，信中宣布将辞去党内和议会党团的领导职务。这再一次证明，迈尔茨的政治生活与默克尔无法融合。提出的政治原因是他起草的税改方案在莱比锡党代会上通过时被掺水变形，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迈尔茨的辞职也可以理解为对默克尔毫不掩饰的挑衅与宣战。默克尔不得不让这个最有经验和能力的财政问题专家离她而去。此后基民盟和基社盟议会党团的财政与税收政策双重任务由黑森州数学硕士米歇尔·迈斯特和莱茵地区律师罗纳尔德·波法拉担任，但他们很难填补迈尔茨在专业能力和知名度方面的空缺。波法拉一上台就有成功之举，他提出了一个“德国条约”的建议。这个意外的举动逼着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2005 年 3 月施罗德被迫与联盟党领袖一起召开了“就业峰会”。总理施罗德、副总理菲舍尔与联盟党默克尔和施托伊伯的会谈推动了一项共同措施的出台。默克尔最初想动员朔伊伯勒接替迈尔茨的职务，别人都猜测，他一定会接受这个职务，但经过几天的考虑朔伊伯勒婉言拒绝了。这里也有这样一个问题，负责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议会党团副主席朔伊伯勒迄今为止没有能够让最受欢迎的德国政治家、外交部长菲舍尔相形见绌，那么他在经济政策这个“多功能武器”方面又能有多大作为。以后有一种议论说，迈尔茨的辞职、朔伊伯勒的拒绝任职以及基社盟社会福利问题专家泽霍夫接受采访是否是一起阴谋。图林根州长阿尔特豪斯是有这种怀疑的。梅前州在野党领导人雷贝格在接受北德电台采访时也表示了同样的猜测：他们反对默克尔的原因是“无法忍受一个来自新联邦州的女人登上一个大党主席的宝座”。基民盟联邦议员伦茨费尔德在联邦议会党团中对迈尔茨的辞职提出批评，她对《法兰克福汇报》谈到：“如果基民盟主席团成员匿名发表意见说，一个来自东部的女人在西部行不通，这是十分有害的。”这位过去的民权人士继续说，“默克尔在民主德国专制下表现得公道正派，不知道这些批评她的人自己在一个专制制度下会是如何表现。”由此可见，默克尔有能力为自己争取到一些东部的支持者。

失败的一年

为什么 2004 年秋政治风向逆转直下？这里可以提及两个原因，一是联盟党也被拖进不受欢迎的哈尔茨法规的责任圈中，施罗德成功地将精力集中在联邦总理的职责上，越来越多地从政党争执中解脱出来。他在寻找其他题目强化个人形象，避开缩减福利的社会保障法。他诱导人们产生一个概念：如果默克尔上台，一个由她领导的政府将会采取比社民党和绿党更加强硬的措施。默克尔被

她的对手描绘成一个对社会弱小群体没有同情心的女政治家。此时德国各地无数反对缩减福利、反对将失业金与社会救济金合并的星期一大游行此起彼伏。拉封丹 2004 年 8 月要求施罗德辞去政府总理职务，并威胁道，如果施罗德还坚持目前的政策，他将建立一个新的左派党。

第二个原因是基民盟自己闹事。几个月来，联盟两党一直对社会福利政策争吵不休。基社盟特别是基社盟副主席泽霍夫认为，2003 年 12 月莱比锡基民盟党代会的决定是对基社盟决策权的严重侵犯。他批评默克尔在莱比锡通过的税收与社会福利两个决策相互矛盾，而且财政上无法实现。基社盟与基民盟之间展开了一场两党之间不常有的、真正的原则问题争论。开始时人们感到这一分歧无法解决。泽霍夫坚持不改变被基民盟否定的全民保险方案，态度之坚决，使施托伊伯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小心行事，他几乎没有任何回旋余地。联盟党关于医疗政策的争论一直延续到 2004 年 12 月基民盟杜塞尔多夫党代会前，才算有了突破并取得结果。这是因为即将召开的党代会迫在眉睫，联盟两党屈于时间上的压力才于 2004 年 11 月中旬就保费模式问题最后达成一致，结束了这场政治戏剧。分析联盟党在医疗政策上从决定到妥协的过程更加证明，当两个姊妹党面临具体问题不得不达成一致时，双方都拖延时间，以使本党尽可能少地做出让步。

在如何正确制定法定医疗保险问题上反映出来的有时甚至是十分尖锐的分歧，也是因为有不同的改革意见。基民盟由于陶醉于赢得几个州议会大选的胜利，在 2003 年底莱比锡讨论改革的党代会上做出决议，对法定医疗保险进行全面的体制变更。默克尔作为对改革起重要作用的人物决定把该党的医疗改革模式在 2004 年初就大力进行推广。基民盟模式的核心是将交纳医疗保险金与劳动工资脱钩，取而代之是基民盟开始时公开宣称的一种统一的、不取决于工资收入的“人头费”，在后来的辩论中改称为“互助医保费”，以此在财政上支撑法定医疗保险。基民盟设想的这种对法定医疗保险进行激进变革的措施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在联盟党内部达成统一。仅“人头费”这一说法就是信息传递上的一种灾难性表述，它使人们想起英国 1980 年末撒切尔夫人推行的“人头税”。这也给施罗德政府提供了谴责在野党的把柄，即基民盟在默克尔的带领下将告别法定医疗保险共同负责的财政体制，而给收入少的百姓阶层造成负担。这种表述上的错误给这一改革模式造成的声誉损失之大，致使后来再怎样改变说法也让人难以抹掉这段记忆。再加上默克尔在制定这一模式时的作法有些独断专行，只考虑到大部分专业人士的认可，没有把规模小、但权力和地位意识极强的姊妹党包容进来。此外，泽霍夫虽因社会福利政策而“越轨”，但他毕竟还是基社盟州副主席，他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医疗保费制。他的观点在政治上更接近社民党的社会福利部长乌拉·施密特而不是默克尔。而被称为最能理解小人物的施托伊伯，不能使自己显得比副手更不注重社会福利问题。默克尔应该知道，在巴伐利亚领导着占有三分之二多数议席的州长施托伊伯不会在医疗改革这样重要的问题上听从自己的安排。

施托伊伯在基社盟社会福利问题专家泽霍夫的坚定支持下，针对基民盟的模式提出了基社盟自己的方案，不主张对法定医疗保险体系进行彻底的变动。基社盟的设想在联盟党之间的辩论中越来越被视为更具有社会良心，基社盟也借此收益不小。长时间以来大家都觉得基社盟不会在这方面有任何让步，最后在 2004 年 11 月，两党分别召开党代会之前，终于在医疗保险上达成妥协。妥协方案试图将两党的设想掺和在一起。实际上谁都知道，这种妥协方案对于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是无法实施的。联盟党的威信由此在选民中受到极大损失，也使从 2004 年初的形势看几乎不可能振作的红绿政府再次强大起来。从联盟党达成妥协方案的内容来说，默克尔比施托伊伯占了上风。尽管施托伊伯设想的结算方式被纳入妥协方案而保全了个人脸面，但他的代价是牺牲了泽霍夫这个党内最受重视、最有影响的健康问题专家。泽霍夫拒绝了这一妥协方案并辞去了基民盟/基社盟联邦议会党团的所有职务。默克尔在对法定医疗保险的财政体系进行改革上取得了成功，因为在基民盟和基社盟的妥协方案中核心内容是引进互助医保费体制。如果这一决议能付诸实施，旧的财政体系将进一步被打破，默克尔所主张的每个投保人交纳同等保险金的原则也将得以贯彻。鉴于上述情况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这个妥协方案不能早一点达成，而非要进行几个月的不利于联盟党声誉的争论。而且关键问题是，即便有了妥协方案，一些棘手的问题仍没得到解决。

不管怎样，联盟两党能够达成一致还是很有意义的。默克尔在妥协方案中虽然胜了施托伊伯一筹，但后者却直率地说道：“遗憾的是，我们所决定的一切先要存在抽屉里。”当年基民盟曾庆祝莱比锡党代会在内容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一年后人们发现，基社盟使默克尔改变税收体系的努力付诸东流。税收改革的模式在莱比锡党代会几个月后就走了样，社会福利政策方面的争论成了两个联盟党的超级隐患。杜塞尔多夫党代会的结果让默克尔高兴不起来，大家选她虽然被称为是“真诚的”，但却不能理解为是对她的全力支持。默克尔仅获得了 88.4% 的选票，比 2002 年减少了 5.3 个百分点。恰在此时出版的《明镜》周刊刊登了对朔伊伯勒的采访，他认为，这是两个联盟党失败的一年。朔伊伯勒仅剩不多的几个追随者抱怨道，党主席在总结报告中赞扬了许多党内同事，可对朔伊伯勒只字未提。

针对此次党代会而传播的一则消息给会议罩上了一层阴影：基民盟主席团的社会福利问题代表海尔曼-约瑟夫·阿伦茨，在担任基民盟社会福利委员会主席期间有不劳而获和用电不交钱的行为。他在基民盟党代会选举主席团时落选，因此辞去一切职务并在北威州州长候选人吕特格斯的压力下不再参加 2005 年 5 月的州议会竞选。会议代表和默克尔都还不知道，这一丑闻将进一步扩大。12 月 11 日基民盟总书记迈尔享受德国电力公司优惠电价的消息被捅出。迈尔的情况与阿伦茨不同的是，前者从 1975 年至 1999 年一直在多特蒙特电力公司任职，曾担任过部门主任，该公司 2000 年 10 月被埃森能源集团吞并。最初默克尔还一直为迈尔撑腰，到圣诞节前她开始疏远迈尔，因为最后又查出，迈尔不仅受用了优惠电能，还接受了原工作单位提供的贷款和有争议的一笔款项。《星期日图片报》报道，迈尔受到议会党团副主席波法拉的监督。这篇报道引人注意的是参加紧急会议的人名单，因为从中可以看出谁在给默克尔出主意。除了迈尔以外参加会议的有辛茨、萨尔州的彼得·阿尔特迈尔、冯·克兰登、考德尔和波法拉。迈尔承认自己犯了错误，默克尔出人意料地让他先保留职务，后来抗议呼声越来越大，特别是正待选举的石荷州和北威州基民盟的呼声促使迈尔在 2004 年 12 月 22 日宣布辞职。

2004 年对于基民盟主席不利的事情仍然不断。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使基民盟愈加清楚，联盟两党在批评政府时提出的改革内容并未被接受，而人事方面更是问题成堆。迈尔的辞职暴露了基民盟人事上的危机，而朔伊伯勒拒绝接迈尔的班显然是对党主席的不恭。迈尔的辞职在党内震动很大，但一批新人也为赢回信任带来了机会。新上任的总书记考德尔代表了社会保守阵营。工作勤勤恳恳的巴符州人考德尔曾担任过联邦议会党团第一干事长，他不像前几任那样善于言词，但他的忠诚和政治经验将成为默克尔在党内的后盾。考德尔的上任还有一点引人注目，当年他在巴符州基民盟时不是支持默克尔，而是极力主张施托伊伯竞选联邦总理。接替考德尔议会党团工作的是原议会党团法律问题新闻发言人诺伯特·勒特根，这位莱茵人在司法领域和联邦制改革委员会的工作极为出色，受到联邦和州一级的普遍好评，而且也很受施托伊伯的信任。

第七章 默克尔体系

帕西法尔的异父姐妹

巴塞尔歌剧院院长辛德赫尔姆是默克尔在东柏林科学院工作时多年的同事。他惊讶不已地谈到：“一个 15 年来以不同角色出现在联邦政治舞台上的女人，人们并不真正认识她。”默克尔对他来说简直是个“谜”。他的解释很有意思：“她可能是帕西法尔的异父姐妹，穿行在男人占统治地位并布满障碍物的政治跑道上，正因为她不懂得危险和引诱，才幸运地通过了阴暗的德国政治森林。”很多当年的同学、老师、科学院的管理人员或同事都难以识别现在这个公众人物“安吉”。辛德赫尔姆把默克尔比作帕西法尔，却没有看到她天才的一面：她的学习和接受能力。现在默克尔对危险和引诱了如指掌，她在理智地思考后——也是在自我欺骗和自我怀疑的经历后——准备攻占基民盟的世界，并开始一步一步地接近目标。在这一点上她又与帕西法尔很相近，后者被阿尔图斯伦德接收，在他逐渐达到执掌权力的道德水平后，终于成为格拉尔斯堡的国王。默克尔肯定自己也没有想到，统一后她有一天会成为总理候选人，但是她懂得一步一步地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在从政

初期她可能还有一些被辛德赫尔姆称之为成功条件的天真质朴，她被人忽略过，也被支持过，她得到过各方的帮助。有利的环境造就了默克尔，她胸有成竹地利用了这些机会。早在进入基民盟前，即在统一初期她就准确地选择了能使自己在政治上跨进基民盟大门的道路。但她多年来从内心里反感那些看不清新时代意义的基民盟老家伙。她没有进行反抗，而是等待有利时机获得新的地位。不获权力不罢休

人们很晚才意识到默克尔有明显的权力欲望。她是一步一步地奋斗并取得成功的。她迫使从前提拔她的人退位交权并取而代之。首当其冲的就是德梅齐埃，他一直热情地称默克尔为“我的安吉”。当有人揭露德梅齐埃曾以假名斯泽尔尼为东德安全部门工作过时，他灰溜溜地离开了波恩政治舞台。默克尔在 1991 年德累斯顿党代会上接替了德梅齐埃基民盟副主席的职务，之后在 1993 年 7 月 20 日又接任了辞职的交通部长克劳泽梅前州基民盟主席的职务。克劳泽因雇用一名长期失业者作女佣并私拿了政府给的附加补贴而不得不离开政坛。《图片报》为此大肆渲染“女佣”丑闻。当时谣言四起，说这场“倒克运动”是总理府挑起的，因为科尔一直认为，克劳泽的交通政策是错误的。克劳泽自己则认为，他曾是两德统一谈判的直接参与者，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默克尔不动声色地看着曾经帮自己得到联邦议员职务并给予她大力支持的克劳泽被人搞下去。丢下自己过去的扶持者不管当然与默克尔对他的评价有关，她认为克劳泽已经成了联邦政府的一大麻烦。这一来默克尔的地位一下子重要多了。

后来默克尔一箭双雕把她的政治养父科尔和朔伊伯勒打倒。她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署名文章，使两个老战友相互残杀，并分道扬镳。编年史作者 2001 年曾写道：“她割下来的还带着头发的头皮数量可观。”后来又加上了不少，其中包括让迈尔茨在 2002 年联邦大选后放弃议会党团主席的职务，2004 年 10 月又迫使他丢掉议会党团副主席的位置，迈尔茨是基民盟党内少有的专业知识过人、具有个人魅力的人物。

默克尔与老总理之比较

科尔，特别是后期的科尔是默克尔的扶持者、偶像和政治导师。正因为默克尔的政治道路是从对她影响极大又有历史分量的大人物科尔手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因此值得把两个人的政治风格进行比较。两个人有时在某些方面有惊人的一致。默克尔向科尔学到了争取权力的顽强意志，她的权力欲可以与科尔同日而语。只要担任一个新职，马上就会表明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意愿。她无所顾忌的行为方式虽然不能使她得到朋友，却能得到必要的尊重。获得权力对她来说是至高无上的。只要是保权需要，她可以不理睬党主席团的意见。2002 年党内推举施托伊伯作总理候选人属于常规中的例外。实际上默克尔的权力本能在与基社盟主席较量的最后时刻告诉她，在当时的情况下她必输无疑。她从科尔那里还学到了，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联合执政战略，她曾有过试验一下黑-绿联盟可能性的想法，这使自民党非常不安。联盟党只是 1957 年在联邦范围内达到过议会绝对多数。

科尔和默克尔都不注重经过推敲、优美和有深度的语言。但人们从他们讲话的方式中也可看出科尔与默克尔在政治风格上的巨大区别。科尔喜欢用一种云山雾罩的语言，总的说来他是一个拙劣的演说家。他当上莱法州基民盟议会党团主席的第一次讲话，就让人感觉那是修辞学上的一次灾难。在联邦议院也经常出现此类事情。他的讲话往往始于一句让人难以理解的句子，其内容又经常不符合逻辑规律。他甚至以自己的演讲方式把精明的执笔人为他准备好的稿子弄得面目全非。但他在内容表述上有一种特别的本领，他可以让听众听到他们想听的内容。他这样讲话有一种好处，很多人信任他正是因为他的语言风格，人们会想，讲话如此笨拙的人，一定很真诚。民众在他身上发现了他们自己的语言。默克尔相反，她的讲话言简意赅，这种风格与现在所有政治家都不同，这当然要归结于她自然科学出身的思维方式。她的讲话风格使她容易与记者啮合，对于科尔的讲话记者们通常总是迷惑不解。默克尔会告诉听众，她想做什么，在给科尔的告别信——《法兰克福汇报》的文章中表现的最明确。科尔与默克尔的共同之处是，他们自己都隐藏在讲话的背后。如果默克尔谈论基本价值问题，那么她就会以一种特有的方式，使得没人敢问她的这一想法在政治现实中是否可行。她要求政治上有方向，意在回避自己的方向问题。科尔也是如此，他总是谴责政党滥用职权的

现象，实际上他想借此分散别人对他的注意力，因为他本人光从外表上看就是一个大官僚统治者的形象，在发展党内民主合作方面犯了不少错误。

未完待续

尽管默克尔十分感激科尔在她政治生涯中提供的帮助，但她对当时的扶植者早已失去友谊的感觉，她对科尔的干扰能力太了解了。科尔目前还有不少支持者（主要是老一代党员），他为基民盟争取捐款的“错误”已经越来越淡化。在基民盟内，随着在野时间的延长，人们对科尔执政时代滋生出一种怀念和神往之感。面对这种感觉默克尔难以有所作为。虽然默克尔一直在强调，她在科尔身边和从科尔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但在回答是否应该感谢科尔的问题时，她却说得很勉强：“我在很多方面感谢科尔，但我觉得感谢这个词在一定情况下并不太合适，因为我也付出了很多，没有人白白送给我什么。”这番话中的冷酷无情科尔不会忘记，1999年12月22日默克尔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文章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二人相互不说一句话。

2000年是科尔最痛苦的一年。被迫辞去基民盟名誉主席一事对他打击很大。众所周知，科尔在权力之争的问题上有超人的记忆。科尔会在接受采访时回忆到默克尔断然拒绝他在基民盟内继续发挥作用的问题。“如同阿登纳一样，科尔永远属于基民盟。可是我们——默克尔和迈尔茨——新一代人要塑造基民盟的未来，我们一定会向科尔请教一些问题，但是他作为活跃政治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新一代人应该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默克尔在2000年8月，当党内要求科尔回到基民盟“家”里来的呼声越来越高时说的话。科尔被继续流放在历史的舞台上。在党内和议会党团内反复协商后，科尔终于被允许在两场活动中发表演讲，一次是在正式纪念德国统一10周年大会上，根据与政府的协商此次庆祝大会在萨克森州举行。可是州长比登科普夫却没有安排科尔发表演说。为此默克尔不得不在2000年10月1日在柏林又单独组织一场活动，尽管阿登纳基金会已经邀请科尔来柏林参加了9月27日和28日的大型庆祝活动，科尔也作了关于德国统一与欧洲联合之间关系的报告。10月1日这场活动简直可以说是强迫默克尔做的。当时的基民盟总书记波伦茨只好找机会表明，安排科尔参加统一日庆祝活动并没有削弱默克尔在党内的地位。波伦茨表示，如果认为基民盟与科尔现已“重归于好”那是不对的。颇有影响的年轻联邦议员普弗吕格尔，在一本2000年出版的书中要求“实事求是地处理”科尔事件，这里指的不仅是“黑账户和黑钱”问题，还涉及对党内民主造成损失的科尔统治体系问题，以及由此导致基民盟失去权力范围和活力的后果。一直到现在，这种要求算总账的批评声音仍然没有停止。《法兰克福汇报》出版人之一的冈特·诺恩马赫在一书中也提醒说，“除了法律规定外，还需要有政治家必须遵守的道德标准”。科尔不得不忍受这种评判。两年多后他才再次出现在基民盟党代会上。会议恰巧选在2002年6月17日在法兰克福举行，这样科尔可以就不太伤脑筋的题目发表演说，他讲演的题目是：从1953年6月17日到2000年6月17日——从人民起义到欧洲联合。

发现了默克尔的科尔只有在自己的亲信面前才对他的后继人流露出不满和蔑视。在公开场合非常克制，他对默克尔把自己搞下台的怨恨将永远留在心中。但有一点科尔忽略了，只有惟一个人有能力让他垮台，这个人就是他自己。在“弗里克事件”后，科尔第二次成为政党献金丑闻的中心人物，这一次他不论从政治上还是从做人的角度都失败了。科尔的生活世界与比自己年轻25岁的现任基民盟主席的视野是格格不入的。科尔所著《我的日记：1998~2000年》以日记形式追述了往事，重点对朔伊伯勒《人生》一书中的自我辩解作了回应。科尔的书里一句都没有提到默克尔，通过这种省略来表达蔑视。即使谈及2000年4月的埃森党代会，他对默克尔也只是一带而过：“在没有其他竞争候选人的情况下默克尔获得了95%以上的选票，成为第一位女主席。“科尔在书中详细讲述了他与朔伊伯勒的分歧，”把自己描述成他与我之间权力之争的牺牲品，这是对朔伊伯勒作为党主席和议会党团主席之所以失败的原因进行了错误分析得出的结论。”科尔甚至宣称：“我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阴谋诡计。”科尔撰写此书的策略显而易见，他恢复名誉的努力需要这个刚出炉的基民盟主席，所以他不能刺激默克尔。但需要多长时间呢？实际上科尔早已回到他的党内，他无法摆脱出席各种活动的邀请。为了彻底恢复名誉，他内心深处的一个愿望就是再次成为基民盟名誉主

席。但只要默克尔对此加以阻拦，他们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就无从谈起。庆祝科尔的亲信、基民盟不莱梅州主席诺伊曼 60 周岁生日的活动很重要，在这里科尔与默克尔躲在一间小屋里第一次进行了私下交谈。他们两人有时会打个电话，但默克尔会认为这是个负担，她完全是为了策略上的考虑才这样做的，这一点科尔也感觉到了。科尔认为，他指望不上默克尔为他恢复名誉了，特别是不指望默克尔让他再度出山担任基民盟名誉主席。

2005 年 4 月科尔 75 岁生日的庆典也不是由基民盟组织的，而是由阿登纳基金会安排了一次带有研讨内容的大型庆祝会。尽管先后当过莱法州和图林根州州长的福格尔是基金会的真正主席，但科尔却被大家开玩笑地称为是这个亲基民盟的基金会的“秘密主席”。实际交往中，福格尔总处于一个过去的部长面对自己过去上司的局面——福格尔曾是科尔执政时期的莱法州州长，即使现在，他对科尔也像下级对待上级。此外在基金会理事会中有好几个科尔的亲信，他们是原来的总理府部长普法伊弗尔和原德国工商大会干事长、财务主管弗兰茨·朔泽。因此，默克尔如果想向阿登纳基金会施加影响会有一定困难。几十年来，科尔一直在这个基金会理事会中任职，担任联邦总理的时候也不例外，现在他仍然被选为理事会成员。他积极利用了这个基金会，他比基民盟党主席更需要这个基金会。一方面科尔想借此维护他的历史遗产，作为历史学家科尔一直想对历史书籍的内容施加影响，正如他自己经常强调的，他作为“统一总理”的作用不能让“社会主义者改写”。因此阿登纳基金会是科尔特别重要的工具。另一方面基金会为老总理提供了从事国际活动的重要场所。科尔的华盛顿、北京或欧洲一些首都之行也是由这个公益基金会提供组织和物质上的支持。在国外，身背历史硕果的科尔始终受到最友好的接待。默克尔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她后来才慢慢地开始试图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基金会的理事会中。尽管每年有 1 亿欧元预算的阿登纳基金会在德国和世界范围内政治影响很大，但默克尔不想在这里与自己的前任进行权力斗争。愤世嫉俗的朔伊伯勒

与科尔一样，默克尔的前任朔伊伯勒也在寻求恢复名誉，虽然他是议会党团负责外交事务的副主席，并对议会党团的工作有较大的影响，但他在这方面的权限要分给外交与安全问题发言人普弗吕格尔一半。由于接受商人施莱伯的献金而在联邦议院说谎，使他不得不辞去基民盟党和议会党团主席的职务。此后不久，朔伊伯勒就开始与继任默克尔龃龉不断。他经常觉得自己被默克尔所背弃。不仅对默克尔 1999 年 12 月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文章不满，而且还对至少以下三件事不满：第一，他很想当阿登纳基金会的主席。朔伊伯勒能力强，会给基金会带来一些动力和生气。当然朔伊伯勒一直否认，这是他自己的愿望，“我没有到处求职，让我去阿登纳基金会工作是很多人，包括默克尔本人的意思，我本人从来没说要去。这会让人感到有一种告老还乡的味道。另外，那里又会爆发旧日的冲突”。谈到后面这一点，他的想法是对的，因为科尔还在基金会理事会任职。但默克尔是不是因为朔伊伯勒与科尔的问题才没有作出这样的安排呢？其实朔伊伯勒还是很愿意接受这个吸引人、收入高的工作的。当有人说，朔伊伯勒在“找工作，并想当基金会主席”时，他马上猜到，他的愿望是被人有目的地泄露出来的。由于他只与默克尔提过此事，愈加怀疑泄露秘密的源头是谁了。他很生气默克尔没让他，而是让图林根州前州长福格尔担任了基金会主席，因为福格尔在 2000 年 9 月还宣布，“我是图林根的州长，以后也不会变化”。《图林根汇报》2001 年 3 月 30 日对福格尔的选择报道说，“他的后路有了保障”。福格尔纠缠着默克尔，他一定要第二次坐上基金会主席的交椅，而且科尔也主张让他原来的莱法州文化部长担任此职。另外默克尔也想借此让福格尔在图林根议会选举前为他的继任阿尔特豪斯让出位置。第二，朔伊伯勒很想成为竞选柏林市长的候选人。默克尔在犹豫了一段时间后表示支持（与其说主动支持，不如说是被迫行事）。但默克尔清楚地知道，她柏林的同事不会允许“外人”插进来。再加上科尔也动用了一切力量，对朔伊伯勒的企图加以阻止。在这个问题上朔伊伯勒抱怨默克尔没有给予他足够的支持。特别使他愤愤不满的是第三件事，朔伊伯勒希望 2004 年争当联邦总统。如果默克尔仅仅想息事宁人减少矛盾而满足朔伊伯勒的愿望，那么不可能第一轮选举联盟党总统候选人就胜出。默克尔知道，自民党是抵制朔伊伯勒的。科勒在联邦大会上仅以一票之多当选的事实说明默克尔的做法是正确的。

朔伊伯勒看不到还有其他更好的恢复名誉的机会，他与默克尔关系的恶化已不可逆转。于是他试图借助基社盟、科赫和迈尔茨结成一个反默克尔联盟，但随着迈尔茨 2004 年底失去议会党团副主席职务，朔伊伯勒与议会党团内部的反对派受到孤立。朔伊伯勒明白这一点，但他仍不放过任何或多或少与他的继任作对的机会。

联邦总理施罗德公开宣布德国要争取在联合国安理会担任常任理事国以后，默克尔也要求把“争常”作为近期目标，朔伊伯勒的回应是：这种要求是一种“过时的思维”，联邦政府，加上默克尔在安理会争取一个有否决权的席位是“错误”的，是“一种矛盾的、后退的行为。实际上这仅仅是为了内政问题而做的努力”。他反复强调这一点并有意识地显示与党主席政治立场的鲜明对立。他主张“欧洲在安理会中获得一个席位”。2004 年 10 月，当默克尔意外地同意了格罗斯关于开展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签名活动的建议时，默克尔的副手朔伊伯勒是第一批对此提出批评的人。他没有在采访中，而是在一篇题为“辩论应该在议会中进行”的署名文章中发表了意见。他虽然振振有词地为黑森州基民盟就反对双重国籍举行的类似签名活动进行了辩解（那次活动导致了红绿联盟竞选失败），但他最后写道：“鉴于欧洲理事会即将做出决策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所以不能搞签名活动，而是应该在联邦议院进行辩论和决策。”朔伊伯勒意在提出论据保护他的老朋友科赫不受伤害，将矛头指向他的党主席。默克尔迫于来自基民盟各方面的抗议，不久就放弃了与格罗斯联合的企图。默克尔所发现的与格罗斯之间的共同点实际上是一个策略，即分散人们就社会福利争执而造成的混乱感觉，2004 年秋天默克尔与基社盟，主要是与泽霍夫在这方面一直有分歧。

朔伊伯勒拒绝与默克尔合作的高峰是 2004 年 10 月迈尔茨宣布辞去议会党团副主席职务的时候。默克尔为朔伊伯勒提供一个负责经济、税收、财政及政府预算政策的位置，那时正在白俄罗斯访问的朔伊伯勒知道，公众一定以为他会接受这个职位，他让基民盟主席等了整个一个周末才作答复。“朔伊伯勒是一个希望让别人给自己加担子的人，但不是让现在的基民盟和议会党团主席，”《南德意志报》概括地写道，“他在政党和议会党团问题上是一只老狐狸，他知道政治界会如何评价他拒绝默克尔这件事。他不想当那个先被扫地出门，然后还要承担义务的黑人。”这是朔伊伯勒的原话。

《明镜》周刊在 2004 年 12 月杜塞尔多夫基民盟党代会前及时地登出了对朔伊伯勒的采访文章，采访中朔伊伯勒把过去这一年称之为“失败的年度”，充分证明了他与默克尔关系的彻底破裂。朔伊伯勒曾对自己最亲近的人谈到，这个党还会怀念科尔时代的。想想他与科尔关系的破裂程度，就知道世界上不会有比朔伊伯勒这番自虐更高明的指桑骂槐了。迈尔茨撂挑子不干

迈尔茨 2004 年 10 月给“尊敬的主席女士”的一封信，使党内经历了一场地震。迈尔茨写道，他在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在 2004 年 12 月基民盟党代会上不再竞选主席团成员，并于年底辞去联邦议会党团副主席一职。他将一如既往地以最大的努力支持默克尔，以便共同实施莱比锡党代会通过的社会保障方面的改革决议。信中还说，“根据我的看法，如果没有具体人事问题的干扰，这项任务会完成得更好。”“难道幸运之神离默克尔而去？”《图片报》担心地问道，“有些日子，比如说昨天，真是让基民盟主席默克尔感到绝望：一早是对土耳其问题辩论的灾难性报道；接着是医疗卫生的争论达不成妥协；正在默克尔愤怒之极的时候，超级财政专家迈尔茨又撂挑子不干了。”默克尔在几天中陷入极大危机。《柏林每日镜报》的标题新闻是：“她突然失去了所有竞争者”。据说，默克尔是从《图片报》上看到迈尔茨辞职消息的。迈尔茨可能事先只告诉了朔伊伯勒和科赫他打算辞职的事。基社盟州主席格罗斯此时正在国外访问。这个时候失去迈尔茨对党的形象非常不利。当时默克尔正在参加一个地区性会议，在这封信公开发表前，她与迈尔茨只能通个电话。很多人都一下子明白过来，迈尔茨的辞职本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可这对默克尔却很突然，她对此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整个联盟党——包括基社盟都对迈尔茨的决定感到特别遗憾。从基社盟中传出不少批评基民盟主席的声音，有人评论说：“把迈尔茨这样一个好找麻烦、但有棱角、有独到见解的人更好地团结在党内应该是默克尔的任务。”是什么原因促使迈尔茨主动提交辞呈的？自从默克尔和施托伊伯共同把曾支持过巴伐利亚州长作为总理候选人的迈尔茨从议会党团主席的位置上挤下台后，迈尔茨与默克尔的关系就一直不好，在他们之间根本不可能再建立起相互信任。迈尔茨感到他被默克尔和施托伊伯耍弄了。另一个使他辞职的原因是，基民盟的改革政策在他看来已经无法实施，特别

是与基社盟共同出台的、打了很大折扣的改革模式已经把莱比锡党代会有关税收政策的决议埋葬了，这激起了迈尔茨的不满。他不再想负责经济、税收、预算和财政等领域的工作，因为一旦大选胜利，曾经有潜力的总理候选人施托伊伯如果愿意进入默克尔内阁，那么这个领域的工作就会交给“超级部长”施托伊伯，而不是他迈尔茨。在公开场合默克尔宣称，他对于迈尔茨的决定感到十分遗憾，对此她“也有些悲伤”。她是否真的悲伤暂且不谈，但迈尔茨的辞职反倒给默克尔一个机会，她启用自己的两个亲信取代了迈尔茨。经济政策由权威的区主席、法学家波法拉负责，他作为联邦议会党团的法律顾问是联邦议会党团理事会成员。另一位是议会党团财政问题发言人迈斯特尔，他是黑森州议员、数学硕士，他被提升为负责财政政策方面的议会党团副主席。在默克尔看来，她虽然失去了一个能舌战群儒、善于辞令和自信十足的迈尔茨，但通过两位新的继任，自己在议会党团高层的权力地位得到了加强，此前默克尔在议会党团的势力一直不是很强的。当同样好找麻烦的泽霍夫也辞去了议会党团副主席的职务并由善于妥协的基社盟政治家沃尔夫冈·措勒尔接任后，默克尔更加如鱼得水。

“安迪诺协约”——男人联盟

从默克尔的生平看，她不具备几十年政党社会化的经验，这无疑是她政治生涯上的一个缺陷。了解政党的灵魂——她作为党主席始终在表现这个灵魂，不是机械性的行为，而是几十年锻炼的结果，在困难的政治条件下它给人以安全感。基民盟内部有一场秘密的“文化斗争”，这是一场东部信仰基督教的默克尔与越来越多进入基民盟领导层的西部同龄人之间的争斗。后者是指青年基民盟内年长起来的头头们组成的一个男士俱乐部，这些人在 70 年代有幸经常陪伴当时的联邦青年基民盟党主席维斯曼四处周游。这个非正式的俱乐部建于 1979 年 7 月，是当时几个年轻政治家待在拉美时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如果人们看一下“安迪诺协约”的名单，谁在过去和后来参加过空中和地面的聚会，就会知道编织“网络”的重要性，而这种编织网络的方法是当时基督教民主党青年政治家从科尔那里偷偷学到手的。对于这个还任命了不伦瑞克经济律师贝尔恩德·胡克为秘书长的协约组织，党主席默克尔在很长时间内一无所知。当她得知这个组织成员的名字后，终于明白了一些事情有后台牵线的背景。在她发现这个俱乐部时，三个州的州长都是该俱乐部成员，他们是科赫、乌尔夫和米勒，2005 年 5 月当选的巴符州州长沃伊廷厄后来也加入了。联邦议会党团中属于这一圈的人除了维斯曼外，还有外交政策发言人普弗吕格尔，另外莱法州基民盟主席、议会党团副主席伯尔以及黑森州的两位政治家福尔克·鲍菲尔(州内政部长)和州议会党团主席弗兰茨-约瑟夫·容等人也在名单之中。这个男人圈子的实际政治影响虽然有可能被默克尔估计过高，但 25 年来产生的相互信任，特别是在每年国外旅行时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信任，对参与者来说具有不可低估的政治价值。尽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但这个“混合旅行团”在党内和党外的交往中相互照应。这里涉及的是一个群体，他们相互之间比起别人更为熟悉，因此他们能较好地解决分歧，这对于参与者来说无疑是一大资本。科赫就深有体会，当他由于黑森州基民盟“献金案”受到强大压力时，他的同盟朋友就伸出了友谊之手。

这个知名人士俱乐部首先使科赫受益匪浅。他是这个圈子中第一个当上州长的，他也是州长中最有影响的对默克尔持怀疑和批评态度的人。2004 年 7 月在医疗政策改革的辩论中他与默克尔的分歧明显暴露出来，这种分歧并不是针对具体问题，而是指向默克尔的行为方式。在许多问题上特别是在经济政策方面默克尔和科赫区别并不大。科赫不能容忍默克尔总是强调党内团结，这也是科尔当时常用的一种手段，就是说把党内团结作为价值观来要求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能靠行政命令或忠实顺从，而是要通过激烈的争论和思想上的交锋”，科赫在《汉诺威新闻报》上回击基民盟主席默克尔时这样写道。但从 2004 年秋天起科赫在公开批评自己党主席方面开始有所收敛，他在杜塞尔多夫联邦党代会前接受《焦点》杂志采访时说，默克尔是“党内明确的一号人物”。在这次接受采访中他还谈到政治上遇到的基本问题：记者们都试图“把每个在党内具体讨论的问题理解为人事安排和权力问题，并以此作为卖点”，这是“媒体神经质”，是“德国政治发挥创造性的最大障碍之一”。

自乌尔夫成为下萨克森州首脑后，在这个男人圈子里形成了竞争局面。2005年1月乌尔夫在民意调查中成为最受欢迎的德国政治家，把外交部长菲舍尔挤出了第一把交椅。如果默克尔在争当总理候选人中失败，那么乌尔夫一定会成为这个角色呼声最高的候补人选，因为一个像基民盟这样的资产阶级政党要想获得成功主要取决于候选人的机会，而并不一定是他的政治影响。传记作家哈约·舒马赫把科赫描述为德国政治的施瓦辛格。科赫在人们眼中比自由派的乌尔夫显得更为保守，科赫自己认为他也是合适的总理候选人，虽然他在《斯图加特新闻报》组织的一次活动中装腔作势地说，他不愿意成为施罗德的挑战者，默克尔是最合适的总理候选人。“她比别人更长期关注此事，她会做得更好。我缺乏争取权力的意志。”了解科赫的人都知道，这句话带有狡猾的缩水成分，但这番话却赢得了好评。科赫是科尔的秘密宠儿，他与默克尔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有过争斗。科赫对默克尔的攻击使她得出印象，科赫是个极端的进攻者，而乌尔夫却精明、和善得多。默克尔虽然对乌尔夫做的某些事也有过失望，但他在关键时刻总是能站在默克尔一边。尽管乌尔夫在竞选总理的问题上持拒绝态度，但他仍被视为最有潜力的总理候选人之一，他精密地记录着默克尔在党内所处的状况。总之，这个“安迪诺协约”式的团体绝不是纯粹的理论 and 旅游俱乐部，俱乐部成员目前仍在每次议会开会前聚集一起，交流思想，这使一个政党主席感到有些可怕。

基民盟/基社盟联邦议会党团中的维斯曼和普弗吕格尔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他们主张让默克尔知道这个圈子的存在，但其他成员如科赫却不太愿意。这些人认为，只有这个圈子不被看作是一个有政治意义的事物，它才能发挥作用。当维斯曼邀请默克尔出席一次他们的会议时，科赫这些人很不愉快。直到今天，这个注重保守秘密的圈子里的人仍在猜疑，是谁把它的存在透露给了《明镜》周刊。乌尔夫推测，是默克尔干的，因为她想让这个圈子失去作用，因为如果人们认为，这个圈子的作用只是在政治上互通信息并有时相互协调，那么“安迪诺协约”的影响不过如此。对这一所谓泄密目的的推测，默克尔坚决予以否认。

新的人际网络

不管怎么说，“安迪诺协约”联盟显示了这种结构发展的价值，但默克尔却难以掺和进去。这个联盟有时候对党主席来说是一种心灵上的创伤，她认真地把所有、包括在其他场合的对话或背景谈话中的话题和做过的事情一一记录下来。她试图把每一个阴谋都尽快消灭在萌芽之中。默克尔经常打电话给联盟中的某个人，想从中获取些信息，这个方法是她控制联盟党实践经验的一部分。默克尔知道自己的空白，也开始着手建立起一个自己亲信的圈子。一颗“新星”就是来自柯尼斯温特尔的联邦议员、法学人士勒特根，自从2005年1月当上议会党团干事长后，勒特根就成了默克尔的“左膀右臂”。他在议会党团所有战略性问题上紧密地与默克尔站在一起。除了他以外议会党团中还有一批特别忠于默克尔的年轻议员。他们是来自萨尔州的彼得·阿尔特迈尔，此君既是法律顾问同时也是议会党团中最有头脑的精英；还有签证调查委员会联盟党发言人冯·克兰登；经济专家波法拉和前基民盟总书记、欧洲政治家辛茨，他也当过默克尔的第一个议会国务秘书。这后两个人是年轻的默克尔任部长时“陪伴她走上联邦政坛的第一批牦牛”，《法兰克福汇报》一篇以“天才智库”为题的文章这样报道。忠实于默克尔的还应算上博斯巴赫，他是议会党团主管内政问题的副主席，还在迈尔茨时期他就负责这个领域的工作。引人注目的是，这些议员很多来自北威州。来自下萨克森州的普弗吕格尔在外交政策上也为默克尔出谋划策，这当然不会使朔伊伯勒感到高兴。普弗吕格尔在以后的时间里将会超过级别上高于他的朔伊伯勒。

考德尔是默克尔任职不长时间里的第三任总书记，他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他是一个与前任迈尔茨完全不同类型的人。考德尔有长年的议员资格和经验，他不属于那种能从长远思考问题的天才知识分子类型，但他是一个直爽的党员，一个有广泛经历和最有经验的议员。考德尔不仅长年担任过巴符州基民盟总书记，还是联邦议院及联邦参议院仲裁委员会有斗争经验的成员。他不是那么自负，作为保守派在党内和议会党团中根基较深。在默克尔接任了议会党团主席的职位后，基民盟总部的对外影响明显削弱，人们正以极大兴趣关注着，考德尔能否使位于柏林克林格尔霍夫大街的基民盟办公大楼重现辉煌。

当然，联盟党议会党团第一副主席、基社盟州小组主席格罗斯也有很大影响。他不受默克尔制约。他本人没有公开表示是否争取政府部长职位。如果他有这个愿望，基社盟作为独立的政党可以决定。他同时也是默克尔与施托伊伯之间关系的晴雨表。他善于巧妙地维护着基社盟与巴伐利亚政府及施托伊伯的利益。格罗斯具有一种挑衅式的表述能力，他不断在向议会党团主席表明他的地位所在。

默克尔在女政治家阵营中最新的重要发现是下萨克森州的女部长赖恩。她是下萨克森州前州长阿尔布莱希特的女儿，现在乌尔夫内阁担任社会、妇女、家庭和卫生部长。她曾被考虑推荐为联邦总统的候选人。她的职业是医生，是7个孩子的母亲。她具备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无子女单身女人所没有的气质。如果默克尔组阁，她在家庭与社会问题领域任职是最理想的，因为她作为“家庭型妇女”是积极意义上的保守型妇女，这对媒体有很大吸引力。默克尔对她担任基民盟妇女委员会主席很信任。自2004年12月起她已是基民盟主席团成员。党主席的人事牌中另一个中心人物是巴符州的文化部长沙万，如果默克尔成为总理，她可能获得负责科技方面的要职。沙万当初虽然暗中受到默克尔的支持，但在巴符州州长的竞争中还是败北。她对于默克尔十分重要的另一个特殊原因是：沙万是德国天主教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她把守着天主教的一个侧翼，这对于基督教徒默克尔极为重要。另一位默克尔十分信赖的支持者是联邦议员米勒，他在默克尔导演的人事舞台上也会得到一个角色。默克尔在联邦议会党团中的重要支柱有来自威斯特法伦的联邦议员莱因哈特·戈纳尔，他同时是德国联邦雇主联盟总干事长，是默克尔与经济界联系的桥梁人物。来自波鸿的联邦议院副主席拉莫特从1996年起担任北威州很有影响的基民盟主席，他是默克尔人际网中的杰出人物，他在默克尔手下会继续起到重要作用。对前联邦议员塔妮亚·戈纳尔也不能小视，她目前是沃伊廷厄内阁的环保部长。但在沃伊廷厄竞争州长的斗争中戈纳尔曾全力支持过沃伊廷厄的竞争对手沙万。默克尔有可能把这位女法学家调到柏林。将发挥重要作用的默克尔的年轻妇女支持者有：来自波茨坦的科研政策发言人卡特琳·赖歇，来自巴符州巴林根地区的医疗政策发言人阿耐特·威特曼·茂茨，来自施塔德的下萨克森基民盟副主席玛蒂娜·克罗格曼和来自科隆的北威州基民盟副主席乌苏拉·海纳。默克尔十分尊重不莱梅基民盟州主席诺伊曼的建议，他从1987年以来就是联邦议员，在一定程度上是议会党团的支柱。科尔在最艰难的时期诺伊曼曾给予他大力支持，因此他也是默克尔与老总理之间的桥梁人物。

对基民盟情况消息灵通的《图片报》早在2005年4月就设想了默克尔如果上台谁是内阁成员，其设想令人惊讶地合乎逻辑。2002年在联盟党内部与默克尔争斗的施托伊伯应该是经济、财政超级部长，作为基社盟主席他是内阁中的第二号人物。默克尔在议会党团的第一副主席格罗斯可能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从礼宾上看，这个职务对于基社盟州小组主席是相应的。名单中的巴伐利亚州内政部长贝克施泰因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张作点的王牌，他接替施托伊伯也是有可能的。自民党2005年5月在科隆召开党代会，格哈德在会上关于外交政策的讲话受到热烈欢呼，引人注意的是，在讲话前就传出沃尔夫冈·格哈德而不是自民党主席维斯特维勒有可能出任外交部长一职。根据《图片报》的内阁成员名单，维斯特维勒将得到自民党传统的司法管辖权。这对他来说可能是过渡到高层的一个中转站。从年龄上看，他在晚些时候会升入外交部。维斯特维勒的亲信西尔瓦纳·科赫-梅林在名单中是欧洲部长，这对维斯特威勒暂时放弃外交部长一职是一个宽慰。在基民盟的政治家队伍中被称为万能武器的总书记考德尔将成为总理府部长，这个工作他胜任无疑。基民盟前总书记，现任妇女、青年部议会国务秘书辛茨也是默克尔的亲信，他将担任发展部部长。巴符州部长沙万将调任为联邦教育部长，这样她可以避开在沃伊廷厄州内阁的尴尬处境。默克尔在下萨克森州发现的赖恩会给内阁带来热烈的家庭气氛，这位医生将担任卫生与家庭部长。默克尔打算争取富有成效的萨尔州州长米勒到她的内阁中负责劳动与社会保障工作。在梅前州和萨克森州不同内阁工作过、能力和影响突出的托马斯·德梅齐埃将被提名为交通与东部建设部长。谁有可能在默克尔担任总理后成为议会党团主席还是个谜，议会党团副主席博斯巴赫和波法拉可能是被考虑的人选，默克尔的议会总干事长勒特根，或者默克尔的帮手、能应付各种困难的考德尔也不排除当选。

鲍曼及其他人物

如果谈到鲍曼对默克尔令人难以置信的实际影响，大家普遍认为，“这俩人真是气味相投”。鲍曼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所有默克尔的顾问。1963 年生于奥斯纳布吕克的鲍曼，毕业于明斯特大学英国语言文学和日尔曼学专业，之后她在剑桥大学进修了一年。她毕业论文的题目是：《德语中的时间连词》。80 年代中期她在家乡奥斯纳布吕克参加了基民盟并结识了乌尔夫，从此开始了她的政治生涯。有一段时间她曾是青年基民盟下萨克森州和奥斯纳布吕克-埃姆斯兰特区理事会成员。1992 年 1 月的一天，乌尔夫打电话给鲍曼，告诉她默克尔在基民盟总部大楼 9 层办公室需要一个从事临时性辅助工作的帮手。默克尔在 1991 年 12 月被选为基民盟惟一的女副主席，从而成了科尔的副手。原计划这项工作也就需要半年时间，鲍曼签了一个短期工作合同，打算以后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当默克尔 1993 年 4 月向她提出，希望她成为自己的私人助理后，鲍曼决定放弃学习计划。从 1995 年起鲍曼作为勒斯根的继任成为默克尔部长办公室主任。鲍曼现在还表示，她其实很愿意留在环保部，但当默克尔意外地被推选为基民盟总书记时，她不能对默克尔想带她走的愿望不加以理睬。鲍曼现在已经成了默克尔不可缺少的帮手。随着默克尔高升为基民盟主席，鲍曼也成了党主席办公室主任。在一段时间里她经历了相当紧张的时刻，她一人必须身兼多职，她被任命为“竞选、政策规划及战略研究指挥部”负责人，这一机构是为协调基民盟、基社盟和设在阿登纳大楼的“施托伊伯竞选班子”之间的关系、保证有效合作而建立的。该办公室的主要工作是在默克尔与施托伊伯之间进行联系和沟通，施托伊伯竞选班子则负责将总理候选人推向社会。2002 年联邦议院选举时，基民盟与基社盟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摩擦，而且两个政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980 年施特劳斯作为基社盟成员被推举为两党共同总理候选人时远没有达到这么和谐的状况。这个竞选指挥部直接受基民盟党主席和总书记的领导，而实际上却意味着总书记迈尔的部分权力被剥夺了。鲍曼面临的一个新挑战是，默克尔担任议会党团主席后，她也接过了议会党团主席办公室的领导，同时还指挥着基民盟总部党主席办公室的工作。如果用所谓“灰色内阁”概念来形容在后台发挥作用并有影响的鲍曼是再合适不过了。当然鲍曼本人不敢接受这一说法，但确实没有谁能像鲍曼那样能对默克尔施加如此大的影响。她无所不做，却始终躲在幕后。鲍曼与默克尔之间也时而大声争吵，因为鲍曼对自己上司的形象设计过于细腻。她对于默克尔来说是不可替代的，她懂得如何安排领导的各项活动，甚至提示默克尔应采取的讲话风格和表达形式。阿登纳大楼的同事们戏称她是“表情翻译家”。在默克尔当上总书记后，如果她出席记者招待会一类的公开活动，总要下意识地看一眼最亲密的同事鲍曼，后者用表情和手势提示她应该注意的地方。有时默克尔与鲍曼两人还共同组织内部会议，就一些政治内容进行讨论和决策。鲍曼是议会党团和党总部同事之间重要的、也是令人畏惧的联系人。

埃娃·克里斯蒂安森也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她最初是基民盟的发言人，现在是议会党团的发言人。克里斯蒂安森是默克尔处理媒体问题最重要的亲信。她的强项在于能够正确地揣摩记者，并把默克尔的思想有效地传给外界。随着默克尔接手议会党团主席的工作，克里斯蒂安森也马上把她的工作重点转移到议会党团方面。基民盟的媒体宣传办公室改由克劳斯·齐默克主持，但克里斯蒂安森仍兼任基民盟主席的发言人。默克尔、鲍曼和克里斯蒂安森三人被媒体称为“少妇阵营”，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战斗集体，也许是亚马逊女骑士没落后最强中的一个。

基民盟干事长约翰内斯·冯·塔登、内部管理与竞选事务负责人克劳斯·许勒尔、主管政策规划与分析的海纳尔·卢埃格、主管市场和内部沟通的斯特凡·海尼韦希、处理突发事件与后勤方面的负责人乌尔夫·莱斯纳尔、以及主管政策研究的米歇尔·蒂伦等人都是基民盟总部的重要工作人员，但他们通常只有通过鲍曼的“过滤”才能接触到主席默克尔。除了在联邦基民盟总部工作了 30 多年、同时是基民盟副总干事长的卢埃格外，其他幕僚都是默克尔挑选的，没有一个属于科尔的原班人马。属于基民盟党中央核心人物的还有总书记办公室主任凯·舍勒尔，他是考德尔从议会党团办公室带过来的。长年担任干事长的豪斯曼被默克尔委予特殊任务，负责地方选举和政策宣传方面的咨询工作。

默克尔具有一套从自然科学经验中得来的政治工作作风。她把课堂搬到了学校以外。默克尔试图根据具体的政治经验得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她有一个基本上不是由政治家而是由经济、科学等不同领域的专家组成的顾问委员会。这个被冠名为“2020”的顾问小组成员经常在周末聚会柏林，并就人口发展学和社会安全保障等领域的根本问题进行研讨。这个顾问圈子有：巴符州社会部长塔妮亚·戈纳尔、《世代高尔夫》杂志的时事评论员弗洛里安·伊里斯、麦肯锡咨询公司德国分公司总裁于尔根·克卢格、联邦议员和基民盟主席团成员希尔德加德·米勒、曾效力于麦肯锡咨询公司，现在是汉堡-曼海姆保险公司的董事乌尔夫·雷坦茨、前国务秘书和柏林市政委员克里斯塔·托本以及波恩经济与社会问题研究所的斯特凡尼·瓦尔。

麦肯锡咨询公司德国分公司负责人克卢格对默克尔有很大影响。他与默克尔一样都是化学专业出身。他和公司其他工作人员在赫尔佐克委员会筹备莱比锡党代会时起了关键作用，因为麦肯锡公司为这一社会福利草案提供了很多数据。“谁掌握了数据，谁就可以决定内容”，曾在赫尔佐克委员会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基社盟社会福利问题专家泽霍夫带着批评的口吻评论说，“这样下去，政治顾问的作用将逐渐减少，总有一天我们要问自己，政治到底是干什么的？”实际上政党通过诸如麦肯锡这样的企业在政治问题上进行咨询还是个新鲜事物，是默克尔用科学方法接触政治的一大特征。当然默克尔也还向其他人进行咨询，如柏林舒尔茨